

炎黃春秋

5

第 期

2014年

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

“历史虚无主义”笔谈

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

毛家湾林彪琐事

俄国记忆版图上的竞争

目 录

春秋笔

- 1 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 尹曙生
 6 我国法治之路的政党维度 严存生

求实篇

- 12 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 洪振快

一家言

- 23 历史虚无主义的来龙去脉 马龙闪
 29 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 尹保云
 35 历史虚无主义的实与虚 郭世佑

访谈录

- 41 保健护士谈江青 (续)
 周淑英、赵柳恩口述 阎长贵、李宇锋整理

往事录

- 47 “李世农反党集团”冤案始末 董忠义
 54 顾准《商城日记》的背后 李素立 王晓林

亲历记

- 59 毛家湾林彪琐事 李根清
 65 随卫中央领导人的经历 华方治
 70 我知道的三反与肃反 晏乐斌

怀人篇

- 73 父亲汤用彤的矛盾心态 汤一介
 76 “红色福尔摩斯”布鲁的遭遇 吕璜

古今谈

- 81 中外历史上的改革困境与成败周期 章立凡

海外事

- 84 俄国记忆版图上的竞争 吴思

顾 问

杜润生 李 锐

编 委 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蠡	李大同
李冰封	李步云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陈 敏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胡德华
赵德润	保育钧	钟沛璋	郭道晖	资中筠
凌 云	展 江	徐小岩	秦 昕	袁 鹰
袁伟时	高 放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治和	萧蔚彬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鲁 谦	雷 颀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 常务社长 吴 思

副社长 杨继绳 李 晨

社长助理 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编 辑 吴 思

副总编辑 徐庆全

执行主编 洪振快 黄 钟

总 经 球 李 晨

副 总 经 球 兼网络总监 张晓鸥

财 务 总 监 胡竞成

发 行 部 孔 屏(主任)

办 公 室 王海印(主任)

理 事 长 杜导正

李 琼

副理事 长 莊其環

秘 书 长 吴 思

副秘书 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秉赵阁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 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编 辑 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68539058

财 务 部 010-68525374

办 公 室 010-68522852 (兼传真)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京 西 工 商 广 字 0296 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 本 定 价 10 元 全 年 定 价 120 元

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

○ 尹曙生

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公安部一共召开过14次全国公安会议。这些会议大都是在毛泽东亲自关心、指导下召开的。尤其是1951年5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更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倾注了他非常大的精力。会议通过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初稿是由彭真、罗瑞卿主持起草,但是毛泽东看了以后很不满意,亲自修改了四遍,把原稿改得面目全非,所以这个决议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写的。

公安部原来计划于1951年6、7月间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汇报、总结自“双十”指示下达以来,全国各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情况,总结、交流经验,布置第二阶段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任务。但是,在5月初,毛泽东把罗瑞卿叫去,明确告诉他,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必须马上紧急召开,不能等到6、7月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提前于5月10日召开了,会议通过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决议,要求“全党全军均必须坚决地完全地照此实行”。

1958年,罗瑞卿在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总结建国以来9年公安工作时说:“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是我们公安工作历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对于巩固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成绩,防止和及时纠正错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对于整个肃反斗争来说,我们所以能在短时间内,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势力,而又没有犯扩大化错误,这次会议也是一个决定的关键”。

罗瑞卿如此高度评价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是因为和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内容直接有关。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决议”的主要内容,就能一目了然。

“决议”明确要求: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

紧急加以收缩、休整,在四个月时间之内,除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及时捕、办外,暂停捕人、杀人;杀反革命分子的数量要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即占总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左右,最高不能突破千分之二;将捕人批准权由县一级,收归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由地委、专署一级收回至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并且规定,今后捕人、杀人要遵照以下原则:凡是界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是界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杀反革命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有其他严重的罪行(如强奸妇女等)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严重地损

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特殊情况必须超过者,须经中央局批准,并报中央备案,但亦不应超过太多。西北方面根据那里的情况规定杀人不超过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这也是正确的。在城市中杀反革命,一般应低于人口的千分之一,以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例如北京二百万人口,已杀六百多,准备再杀三百多,共杀一千人左右也就够了。这里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特别是对于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清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其余十分之八九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此,才能获得社会的同情;才能避免我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才能分化和瓦解敌人,有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有利于国家的生产建设。同时,在处决反革命问题上,乡村已达人口千分之一(在西北地区为千分之零点五)、城市已达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者,应即停止大批地杀人。此外还应明确地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决议”特别要求对于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清理出来的应当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其余十分之八、九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决议”还布置了清理积案,组织对罪犯劳动改造,为国家创造财富等其他内容。

“决议”为什么要对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紧急刹车呢?那是因为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已经逮捕了200多万人,杀了50多万人。进入5月份,大规模捕人、杀人还在继续进行,其势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而领导镇反运动的各级党、政、军干部中,特别是地专和县以下干部,普遍弥漫着多捕、多杀的情绪,草率捕人、杀人,不少地方已经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人(据调查均约占三分之一左右),甚至错捕、错杀了一些人。如不紧急刹车,将会有更多的人被错捕、错杀,后果将不堪设想。

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捕人、杀人数据,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个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杀掉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人,教育释放38000余名。徐子荣说的是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捕人、杀人总的数据。而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了3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年10月至1951年9月;第二阶段为1951年10月至1952年9月;第三阶段为1952年10月至1953年底。根据公安部门统计,第一阶段杀人数量约占整个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杀人数量的75%,按712000人计算,即有543000多人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阶段、主要是在1951年2、3、4、5几个月内被处决的。因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阶段从“双十”指示下发起,有一个传达贯彻、组织实施的过程,实际执行时间是从1951

年1月开始,而高潮在2、3、4、5四个月,在1951年1月份之前只捕、杀了少数人,6、7、8、9四个月是收缩、休整期,要求暂停捕人、杀人(现行除外)。所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阶段被处决的50多万人,主要是在2、3、4、5那四个月。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杀了50多万人,超过国、共双方在内战中三大战役(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中在战场上战死的人数总和,实在令人震惊(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解放战争四年间,我军阵亡约30万,国民党军队阵亡40万,国共相加大约70万。其中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国共双方战死人数为40多万人)。当时全国党、政、军领导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将会出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指挥镇反运动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弥漫着左的情绪,要求多捕人,多杀人,如果不及时纠正这种思想倾向,镇压反革命运动就会走向邪路。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指出:“杀人不能太多,杀得太多了,丧失社会同情,丧失了劳动力”。

那么,草率从事,大捕、大杀,错捕、错杀这一股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呢?从根本上讲是中央。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初期一些领导人束手束脚,对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打击不力,毛泽东批评了“宽大无边”这一倾向。中共中央在《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同时,“双十”指示也明确指出,为了防止“左”的倾向,必须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防止逼供信,严禁肉刑。

在如何开展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保证运动健康发展问题上,中央和毛泽东都没有提出过操作性很强的有效措施,仍然采用革命战争时期打仗的办法、群众运动的办法来代替运用法律的办法。中共中央在1949年初,就宣布废除“六法全书”,而此后又没有制定新的法律加以替代,政务院稍后虽然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但那都是些实体性的不易掌握的原则规定,没有任何程序性的规定,所以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上处于无

法可依的状态,完全靠中央文件和最高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而毛泽东在具体领导镇反运动上,仍然沿袭革命战争年代指挥战争的办法,在捕、杀人问题上,下指标、定任务、定时间,主观臆断,急于求成,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必须杀多少人。虽然“双十指示”要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要“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但是在毛泽东指定的时间、任务、指标面前,这些规定都不可能执行,而捕人、杀人批准权限也被最高领导毛泽东给下放了。

下面让我们来具体看看中央、主要是毛泽东是如何下命令指导镇反的:

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在接到中南局转来的驻扎在湘西27军的镇反报告,该报告说,在湘西21个县,仅仅驻军部队就已经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准备由地方政府再杀一批。毛泽东批示道:“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并强调“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要求“各地务必抓紧照此办理”。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3、4千人”,“今年可以杀8、9千人为目标”。1月29日,公安部对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说湖北省已经逮捕19823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160人。公安部在报告上批注:“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毛泽东看了以后,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2月5日,中央西北局报告说:“两个月已经逮捕5000多人,杀了500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是执行镇反计划一定要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这是“双十”指示的要求——笔者)”。毛泽东看后批示道:“对判死刑者,轻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上行下效。很多地方把杀人批准权由专署一级进一步下放到县一级。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对判处死刑的人,不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罪行来定罪量刑,确定该不该杀,而是根据人口比例,要求某地、某市必须杀多少人,这是最大的荒谬之处。毛泽东最初要求,杀人比例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五,严重的地方,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一;以后他

又说个别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过千分之一点五,最多不要超过千分之二。

1951年2月中旬,毛泽东直接电告上海、南京两市委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1500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妥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0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0余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1951年2月2日,政务院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毛泽东立即指示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及各省会城市,说这些地方“是反革命组织的重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2月17日,北京市在罗瑞卿的直接领导、指挥下,一夜之间逮捕675人,第二天(2月18日)公开枪决58人;3月7日夜又逮捕1050人,25

转发黄敬⁽¹⁾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的批语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大中市委,省委,区党委:

各大中城市的镇反工作,过去几个月一般劲头很小。这主要是由于领导机关对反革命的严重性及镇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而来。从二月起,先有北京市,现在又有天津重庆两市动起来了,这是好现象。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领导机关潜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对付,必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下面是天津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

日公开枪决199人。毛泽东充分肯定北京的做法。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3月初天津市委上报说在已经处决了150人的基础上,拟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说:“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大杀几批反革命”的一再督促、指示,向中央报告说:“上海决心在已经逮捕了1068人、处死100多人的基础上,再放手逮捕10000人,杀3000人,关4000人,管(制)3000人。”毛泽东对上海市委纠正正在捕、杀人问题上谨慎慎微的态度,准备大捕、大杀的计划,给予充分肯定。他立即致电上海市委:“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地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你们注意在逮捕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该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于是,上海市委在4月27日一天逮捕8359人,仅隔3天,4月30日一天就处决285人,5月9日再处决28人。“决议”发布后,由于惯性作用,上海大规模捕人、杀人没有能立即停止下来,6月15日一天又处决了284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五十名。

由于毛泽东的督促、鼓动,捕、杀人出现失控状况,有的地方要求突破中央提出的捕人、杀人控制指标,尤其是杀人指标。贵州省委提出杀人数应达到总人口千分之三才能解决问题。西南、华南也要求突破指标。到1951年5月初,广东、广西两省已经逮捕188679人,处决了57032人,其中广东4月1个月即处决10488人。到四月底,华东地区共逮捕了358000余人,处决了108400余人,占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七八;中南地区到五月上旬,杀人超过20万,接近人口总数千分之一点五。

这种捕、杀无序的情况,引起一些地方党委的注意。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前夕,中共山东分局即下发通知,规定,“山东无论在农村,无论在城市,镇反杀的比例数,均应低于千分之一为妥”。(因为山东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土改中已经杀了不少地主、恶霸,加起来早已超过千分之一的指标——笔者)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3月23日向中共

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说:“目前已个别发生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且现已开始牵涉内部(地下党、企业、政府、机关),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更需要精细”,“我们拟即收缩——捕杀范围加以限制,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他是最早提出镇反收缩、限制捕杀范围的省委领导。但是毛泽东没有理睬。接着,中南局在四月中旬命令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停止大捕、大杀,并把处决人犯批准权收归省委。但是,收效甚微。命令下达后,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从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中南局这四个省又处死了5万多人,且大多数没有经过省委批准。由此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要纠正大捕、大杀的无序状况,还得毛泽东亲自出马,发指示纠正才能见效。

毛泽东对杀人越来越多而且已经失控的状况开始感到担忧。4月20日,他致电各中央局书记,要求控制杀人比例:“虽然2月中央会议决定先规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是现在西南已达到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亦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方已超过。一般地看来,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超过太多似乎不妥。柳州专区要杀千分之五,显然是错误的。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我也感觉多了。我有这样一种想法,即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但不要超过的太多,不要规定一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而(应)将许多犯人列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例如西南区准备再杀的六万人,杀掉三万左右以平民愤,而将其余的三万人左右分批集中生产”,“如果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计算,西南、中南、华东三区就有15万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就是说,如果这三区按原来计划杀人比例控制在千分之零点五,就可以少杀15万人以上,而实际上都超过千分之一,如果达到千分之一点五,则多杀30万人——笔者),“贵州省委要求再杀二万二千至二万五千,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一万多一点,留下一万多不杀,已经超过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贵州这样的特殊情况办事,已经算得准和狠了”(以特殊情况为由,允许贵州突破千分之二的比例指标,那么就意味着其他地方突破指标多杀也没有关系,

纠正错误不坚决——笔者）。接着，他电告华南分局领导人：“根据华南已杀五万七千多，现押犯人尚有十六万多的情况，华南两省一市（广东、广西和广州市——笔者）和豫、鄂、湘、赣一样，从六月一日起，停止捕人四个月，集中力量清理积案，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由于允许贵州突破指标，他的这一指示，华南两省一市也不会坚决执行。

毛泽东这时感到光有他的批示、电报还不足以制止这一股强劲的捕人、杀人风，必须立即开会，把地方“诸侯”找来，当面亲自布置刹车，否则将会有更多的人头落地。

“决议”一出台，中央立即转发，电告各地，大规模的捕人、杀人风，才得到初步遏制。但是，由于惯性作用，会后有些地方仍然捕、杀了一些不应该捕、杀的人。如华东地区1951年5月统计共拘捕人犯358000名，杀了100840名；到了1951年10月份统计数字是：捕了468385名，杀了139435名，这就意味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后几个月里又逮捕了110000人，处决了40000人，所谓停止捕人、杀人四个月，打了一个大折扣。但是，随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逐步贯彻，各地捕、杀人的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全国实际捕、杀人数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二、第三阶段两年时间里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总数只有1951年初那几个月捕人、杀人的四分之一左右，显然，“决议”起到的作用是肯定无疑的。

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过去60年，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经过多年的战争，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新政权建立后，当政者应该采取宽容的政策，尽量弥合社会裂痕，赢得社会各界的拥护和支持，除非是非杀不可的人，不要轻易杀掉。日本侵华战争中遗留下来的1107名战犯，他们每个人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他们在战犯管理所，受到良好待遇，几年后就被特赦回国，而国内那些普通反革命，如果没有血债，没有严重现行破坏活动，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一条活路，非要杀掉呢？！如贵州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81个县的县长，在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时，有的起义、有的投诚，有的被捕后释放，个别的还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大多数人已经做了处理。可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片喊杀声中，被全部杀掉。难道他们的罪行比

日本战犯罪行还大？对判处死刑的人，为什么要那么草率？安徽省桐城县拟将16名反革命处死，报安庆地委审批，地委审查全部否决，退回来。县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为同意，竟没有拆开看批文内容，将16人拉到刑场枪决。这16人中有5个伪保长，4个三青团区分部委员，3个宪兵，2个一贯道坛主，6个地主。16个人没有一个人有血债、没有强奸妇女的行为。事后检查，有11个人连逮捕条件都不够，必须立即释放。阜阳专区在枪毙几个恶霸地主时，把同他们睡过觉的几个“破鞋”也给枪毙了，其罪行是“不争气，给劳动人民丢了脸”。还有那些被错杀的无辜的人，如很多从事地下工作的人，提着脑袋干革命，躲过国民党特务无数次追杀幸存下来，却被自己人给杀了，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由于没有认真总结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在以后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再重复这些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过后，接着是内部肃反，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公安部门根据中央要求，都要布置对敌斗争的内容，把镇压反革命作为推动这些政治运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所以1976年前，我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直没有真正停止过，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出台“公安六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专案审查等，还在继续镇压反革命，同样，都不按任何法律程序办事，完全是无法无天，使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受到极大的摧残与伤害。■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责任编辑 黄 钟）

启 事

本社现有少量2011年、2012年2013年合订本，欲购从速。每年定价120元，不另收邮费。

有需要的读者请汇款至：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 款 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咨询电话：010-68532048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我国法治之路的政党维度

○ 严存生

清末以来我国法治之路的历史回顾

从戊戌变法提出宪政问题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在为建立法治国家而努力,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情况怎么样?成就和进步不能说没有,但总的情况不容乐观,这突出表现在我国法律的至上权威尚未在人们心目中牢固确立,社会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法律,而是党的政策和领导人的指示,以及形形色色的潜规则。为什么会这样的曲折和艰难,其中有什么经验教训?

(一)从法治观念的角度看,清末以来,我国人民一直把建立法治社会与实现宪政视为一件事,并且把制定一部成文宪法作为实现宪政的标志,因而一直围绕着成文宪法的制定和修改开展斗争,爆发了一系列的宪政运动,直到现在我国许多学者在谈法治国建设时仍然聚焦于宪政问题,这一切说明我国大部分人对法治的理解还很狭隘,还没有把宪政与法治区分开来。

宪政是以人民争得普选权并建立自己的代议制机关制定宪法为起点的,但达到这一点只是法治的起始,并不等于法治的真正实现。法治要求民主的高度发达,即已经制度化、法律化,要求在宪法的基础上再产生一套比较系统的法律和法规,从而能做到人们的主要活动有法可依,而且要求这些法律和法规实际上被人们所遵守。这意味着宪政还只是法治的初级阶段,也意味着我国一百年来始终停留于法治社会的初创阶段——围绕着宪法的制定开展活动,目标是制定一部表达民意的宪法,并与之相配套的成文法体系。这一目标从我国现在来说仍有差距,因为我们现有的法律不是真正通过民主方法产生,不能真实表达民意和符合我国国情,从而得不到人民的全面认可和遵守。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真正科学

的完整的法律体系,应该包括成文法、习惯法、判例法和学理法几种形式或几种渊源。这几种法律的同时存在,互相补充与互相转化,才能使一个国家的法律有一个合理的结构,并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而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只有成文法或只承认成文法的唯一性,不去研究和发展其他法的形式,从而使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不完整,残缺不全,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出现上述情况,与我国这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法律观和法治观有关。这种法律观只承认成文法或国家制定法为“法”,他们把法制建设工作只是理解为立法工作,把有法可依只是理解为有成文法可依,把依法办事只是理解为按成文法办事。要使法治国家建设健康地发展,要克服法律自身的不科学状态,就必须改变现有的法律观和法治观,以新的更科学的法律观和法治观武装我们和指导我国的法治国家建设。

这种新的法律观和法治观不仅认为国家的成文制定法为法,而且认为被国家认可的判例、学理和习惯为法;不仅认为被国家认可的规则、规章、原则是法,而且认为通行于亚国家或市民社会、超国家领域的规则、规章、原则也是法。因而法治社会所依之法绝不限于国家制定法,而应是所有的法;“依法办事”原则也决不能理解为按法律规则,特别是正式的规则办事,也应理解为按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办事。所谓按法律精神办事,对现代民主社会而言就是从形式上做到严格照章办事,从实际上讲就是尊重民意和追求正义,因为真正的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和公意的正式表达,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一套制度和技术。正因为如此,新的法治观是与形式法治观念有巨大区别的,它决不是只要求人们守法,而且要求所守之法必须是良法,即表达公意和追求正义之法;它不仅要求人们守已有的成文法,而且要求守一切之法,包括随着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新事物之法。而这种法是需要执法者从对该事物的

认识中去寻找的事物之理。因此,这种法治观并不要求执法者死守成规和不给他们任何的自由裁量权,恰好相反,它允许他们适当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适用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法律人就不应该仅仅是谙熟法条者,还应该是深解法理者,是有高尚的社会理想和道德情操者,因为只有有高尚的社会理想和道德情操者才能深解法理。这意味着法治社会的人决不是钻法律空子的讼棍和无赖。因此,法治社会决不是唯法而治,而是德法共治,是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是德治基础上的法治,是对大多数人用德感化和教化,对少数“异类”用法惩治和矫正。

法治问题绝非法律本身的问题。在法治状态的产生中,政治体制比法律制度关系更重要。因为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法律只有在“法治”的政治体制下才能形成,而这个法律也必须依赖于与法治相匹配的政治权力的正常运作。这就是说,法治的形成仅仅从法律上作文章是无济于事的,或者说法治状态的产生非法律独善自身所能实现,它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法治体制的构建。任何社会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因此,我国法治的姗姗来迟,不能仅从法律自身找原因,还应从政治体制上找原因。而且,后者处于更重要的地位,从一定角度讲,我国上述法律的不良也与之有关。

(二)从政治体制的角度看,虽然辛亥革命后我国名义上建立了共和国,但这个共和国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名不副实的。因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很淡薄,实际上也没有享有什么民主权利,国家权力完全掌控于执政党手里,形成了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我们对政党的认识有片面性,没有处理好政党与国家的关系。

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党治国”的观念。

“以党治国”这一观念从理论上讲起码有两个漏洞:其一,它容易导致一党专政和极权政治。因为它会使执政党错误地理解为执政就是依它们党的主义和由他们党党员独自执掌国家权力,不允许其他政党和政治势力插足。其二,它容易导致“人治”,因为“以党治国”意味着党高于一切,高于人民,高于国家,“党在国上”。而党是什么呢?它是政治精英们的组织,是政治领袖

活动的舞台。党用什么治理一个国家呢?只能依靠它的组织系统和它的政策,而政党组织往往被政治领袖所操控,因而党的政策也往往是政治领袖们的意思表示。这意味着政党政治包含着精英政治的因素,如果不对其活动用法律加以限制的话,则存在着变为个人独裁专制的危险。这对那些缺乏民主传统的政党来说更是如此。政党,哪怕是执政党,并不直接拥有立法权,所以也不会直接用法律来治理社会。“以党治国”观念在理论上的漏洞所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在我国上个世纪已充分地显露出来,它导致了一党专制体制。而这一体制存在几十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以党治国”观念指导下所产生的一党专政体制,只会给中国或者带来政治的动乱,或者导致一潭死水和停滞不前的状态。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使我国人民清醒过来,选择了改革开放政策,并进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抉择,而这一改革必然来自对政治体制最关键的部分,即执政党的地位和执政方式问题的思考,“依法执政”正是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出发对执政党如何改革的一个回答。这意味着我们要真正走向法治之路,就不仅要更新我们的法律和法治观念,而且必须正确地认识在我国有广泛影响的“以党治国”的观念,树立“以法治党”和“依法执政”的观念,抓住执政党这个政治体制的关键环节,对我国的政治体制进行认真地改革。

我国的法治之路的政党之维

真正的法治国家必须是民主共和政体,这种政体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就是与此相适应的政党体制。而这一体制的形成是与该国的民主进程相一致的,是需要与法治社会相匹配的具有较高民主素质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要使它的活动民主化、法制化。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法治国家的建设也就是与此相适应的政党的建设,就是使政党活动民主化、法制化的不断努力。基于此认识,我们认为我国的法治国家建设要真正有所突破和巨大发展,就不能仅仅从法律自身做文章,也不能泛泛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应该抓我们国家的政党,特别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一) 所谓政党活动的民主化指的是政党能遵循民主精神进行活动,这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

1. 对外的民主化指的是它能以民主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地理解和处理它与人民以及它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这就是说,它应该认识到自己只是人民中一部分人的政治代言人,因而它必须忠实地表达这部分人的政治诉求,而不能以党的领袖人物的个人意志取而代之。先进的政党意味着它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和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是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代表。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得到更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从而获得执政权。在成为执政党之后,这个政党不仅要遵循民主原则处理好与其代表的那一部分人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与全国人民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执掌国家权力时,它不仅要考虑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的要求,而且要考虑其他社会阶层的要求,不能把公共权力当成私权力来用,不能以权谋私。

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政策和主张以法案的方式提交立法机关讨论,即经由其他政党和社会阶层的代表审议、修改、批准,获得他们的认可和批评,最后以民主的方式得以通过和以法律的形式颁行全国。只有这样,其执政行为才具有合法性并产生实际的效力。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它与人民中的具体人以及由具体人所组成的组织而言,又存在着一种关系,即政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其执政党地位的确立就是其领导地位确立的象征。这种领导地位有抽象的一面,也有具体的一面:具体的一面表现在执政党的成员在国家机关和许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因而他们与其他人实际上是上下级的关系;抽象的领导指政治上的领导,指该党及其政治主张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所享有的威信和由此产生的权威地位。这使它在国内的各种政治活动中具有号召力,能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吸引到该党所关注的问题及其解决这些问题的决策上,从而能率领全国人民一起行动,解决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一领导主要来自该党对国内外的政治风险的敏捷的观察力和决策力,并利用其执政党的地位引领全国人民正确地面对和克服这些政治风险,乘风破浪地前进和发展。上面所讲的执政党把自己的主张通过立法变为全国人民的共

同意志和行动,就是这种领导的一种重要方式。

执政党的民主化最核心的是要树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观念,国家权力属于人民,自己只是人民的政治代言人,因此,它必须忠实地表达人民的愿望,虚心地接受人民的监督,对该政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领导人来说更是如此。我国执政党的各级组织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即这些组织和个人实际上与其他国家机关组织及其成员没有什么区别,享受同样的待遇,也握有公共权力,而且是握有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和人事权。这就使执政党组织与人民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即加进了国家机关和人民的关系。这使其产生和活动不仅要有党员的参与和监督,而且要有所在地区的人民的参与和监督。执政党是由人民通过民主的程序选择的,其执政期间的活动自然人民有权监督,特别是那些担任公职的执政党成员。他们与人民的关系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因而其行为不仅对其党负责,而且要对人民负责。其行使职权的活动,应向人民或人民的代表报告,人民有权咨询情况和追究违法者的责任。显然,这一关系不同于人民与非执政党的关系,因为那只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其产生和活动只是接受一种选择和监督,不像执政党须接受两种选择和监督。我国现有的政党体制是:握有国家重大权力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领导人,实际上是由共产党的上级组织任命并受其监督,虽然党章上规定他们由所在地区的党员或党员代表选举产生并受他们监督。这意味着其权力的行使处于不受人民监督的状态。显然这一状况是有悖于民主原则的。不受监督的权力往往会被滥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些年我国有些地方的基层共产党的组织的选举试行“两推一选”(民间俗称的“两票制”选举)制,即这些组织的候选人由党外群众民主推荐、党员民主推荐以及党内民主选举结合起来的制度。这一制度推行的地方效果还不错。遗憾的是,我国现在大部分的党组织的人选仍由上级党委任命,同级党内选举流于形式。因而不要说群众,就是党员也约束和监督不了他们。加上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位低下和受其领导,监督无力,而上级机关的监督鞭长莫及,使各级一把手处于实际上的无监督状态。显然,这是党外和党内民主化必须认真思考和着

力解决的问题。

对我国来说,党外民主中执政党与人民的关系延伸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人大”的关系。因为“人民”是抽象的,人民中的任何一部分都无资格自称或代表人民,只有经选举产生出的“人大”才具有这个资格。从理论上讲,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地方的“人大”是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因此,任何政党其地位都在其之下,即便是执政党也一样,因为他们只是人民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挥和命令“人大”,委派“人大”各组织的负责人,并把自己的决策不经“人大”讨论变为法律。

我国“人大”权力的虚位和形式化现象比较严重。这种情况近些年虽有所改变,“人大”的作用有所加强,但总体上仍不理想。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一,许多人在观念上还没有真正把握“党的领导”或执政党的真谛,还错误地把它理解为党组织与国家机关就是上下级关系;其二,最重要的是“人大”代表实际上是由党组织安排的。特别是在县以上“人大”代表的选举上,选举流于形式。谁当代表和谁不当代表完全由党组织说了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代表”的代表性问题。我国现在的人民代表,特别是省和全国“人大”代表,2/3以上是“官”而非“民”,这就使“人大”的会议实际上变成了“官”会,很少能真正听到基层人民群众的声音。基于此我们建议:(1)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上引入竞争机制,即代表候选人可由党组织和群众推荐、自我推荐相结合,而且代表应和被代表的群众见面,发表自己的政见,由人民来挑选。与此相适应地实行差额选举制;(2)凡政府官员,包括法官,不要当代表。党组织的负责人可不受此限制,但如果已在政府任职,就不要再当代表。这样既可以保证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又可以充分地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不使监督者(“人大”代表)和被监督者(政府官员)混同。

第二个就是共产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或简称为“党与政”的关系。望文生义,“执政党”似乎应直接和全面地执掌行政权力或政府权力,但从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看并非如此,它只意味着该党有组阁权,即担任政府最高领导人及其任命或提名内阁主要成员的权力,因此它并不意味着该党党员就垄断政府中公职人员的全部位置,更不意味着该党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政府权

力。这就是说,“党与政”虽然有密切关系,但二者还是有所区别的。党的组织并不是政府的组成部分,政府官员并不都是执政党的党员。我国的情况也非如此,政府中并非清一色共产党员,政府机关也并非只是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不过,我国现在“党与政”的关系更密切,已经发展到“党与政”不分的地步。

这突出表现在:其一,乡以上党组织及其成员实际上执掌着国家权力,并享有国家公务员的权利,它像国家机构一样设有类别齐全的组织系统,并直接掌控着许多国家权力;其二,在国家各种机构中,都设有党的组织,其领导人,即书记实际上是这些机构的第一把手,掌握着这些部门的大权。这就是说,府上有党,府内也有党,政府受到执政党的二重控制。还不要说政府各机构的行政首长的大部分也是执政党成员。这种状态不仅使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党在政上,而且造成政府各机构内部的二元状态,即行政首长与书记之间的权力之争。这种二元状态不仅造成行政权力的低效率和内耗,而且从理论上来说也是不通的。因为,行政机关的首长,其产生一般都经“人大”审议,也就是说得到人民的授权,而行政机关内的执政党的书记只是获得该机关内部的执政党党员的认可,因此他们在法律上不享有行政首长的权力。基于此,有的学者建议,“一方面,要强化党向政府渗透的力度,不再把党的职务和政府的职务(特别是主要领导的职务)人为地、刻意地分开,而是党把优秀的干部推荐给人民选择,经过法定的民主程序,输送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真正执掌权力;另一方面,党组织(如党委、常委会等)不再作为权力的直接掌握者,而是恢复作为政治组织的本来面目,充当人民控制政府、监督政府的代言人”(参见张志明《我党提出“三个执政”的历史背景和重大意义》一文)。这一建议是合理可行的。这样一来,行政机关内部的党组织的负责人不再执掌行政权力,除非他们是法定的行政首长。这意味着不担任行政首长职务的党的书记只做党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不直接插手该机关的行政业务。当然,允许书记兼任行政领导。这样就摆正了党与政的关系,而且消除了机关内双首长之间的矛盾,使行政机关达到政令统一。这并没有取消或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使党对政府的领导遵循法律的方式进行。因为执政党的组阁权使它有对政府首长的推荐权,

而且在政府中由于执政党成员控制着关键部门和在数量上的多数状态,使它可以通过政府内的党员和党组织实现对政府的领导和控制。

第三个就是共产党组织与司法机关的关系。这一关系与和政府的关系相似。我国现有的实际情况是,县以上的各级党委中设有政法委员会,领导和协调公、检、法三机关的工作,部署政法方面的重大事务。这意味着党组织直接插手司法活动,具有司法的功能也意味着司法机关不能独立地行使其权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党组织内还存在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实际上具有某种司法功能。因为有关党员的违法乱纪问题,首先要由它来经办,它认为需要法办的才移交司法机关。这意味着违法与否由它来确定,它不移交的案件,司法机关无法插手。我们认为,执政党组织及其成员的违法事项,司法机关应与对其他社会组织的办法一样,只要发现就有权查处,这样才是公平的。这使党组织处于多重监督之下(党内监督、社会监督和权力监督)。我们认为,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可以像上面所说的对政府的领导一样,就是通过推荐干部的办法,使自己的优秀分子进入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从而通过他们和司法机关内的党组织贯彻党的意图,而不必由自己的组织机构直接插手司法事项。因而各级党组织内的政法委员会应逐渐取消,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不再垄断对党员违法事项的审查权,允许司法机关在纪律检查委员会未发现和追查其违法行为之前,就着手查办其违法事项。

第四,就是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按照民主原则,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政党享有独立性,其地位都是平等的,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除非这些“政党”实际上只是某一政党的外围组织。许多小的政党,由于力量有限往往依附于某个大党,或与之结成长期的联盟,很少独自行动,所以不享有大党那么高的独立性。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并不影响它们作为一个政党的独立性,只要它们有独立的组织系统和所信奉的主义,追求的理想与联盟者有差别就行。这就像实际生活中的有些人的类似情况并不影响他们享有独立的人格一样。我国现在实行多党合作制,即一党执政,其他党参政,不存在西方国家的反对党和在野党,只存在参政党。我国的多党合作

的方式或制度主要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是我国实现民主的一种重要方式或一个重要途径,民主党派和非中共人士有什么好的建议就可以通过它传递上去,这种建议虽然不同于人大代表的建议,即不能形成法案,但对政府的工作还是可以起某种作用的。因为政府和党的组织必须对这类建议作出回应,而不能置之不理。不过,我国现有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实际上和制度上都还不理想,难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其中既有观念问题,也有制度问题。观念上人们不太重视政协的作用;从制度上看,现在政协委员产生完全由统战部决定和审批,不经过其他任何民主程序,也不引入竞争机制,致使当上政协委员的人底气不足,不敢大胆地提出建议。虽然政协委员的产生也征求所在单位和所在单位党组织的意见,但这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与群众见面。基于此,我们对政协的改进提出两点建议:其一是提升其地位,使政协的重大建议享有法案的地位,因而应作为法案交“人大”审议;其二,政协委员的产生增加透明度,应征求所在单位群众的意见,甚至可以民主选举。

第五,就是共产党与其他社会团体的关系,包括宗教团体、工会、妇联、共青团、各种学术团体、文化体育组织、学校、志愿者组织、经济组织(特别是其中的国营企业)等。我国现有的实际情况是执政的共产党在其中一般都有自己的组织,并且其书记还担任这些组织的负责人,或享有第一把手的权力。这意味着这些组织直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在其领导下工作。我们认为这一情况严格说来不符合执政党与非政治性社会组织的关系,它不仅限制了这些组织的独立性,而且使这些组织像政府机关一样形成二元结构的局面,不利于这些组织的正常成长。因此应作调整,调整的原则可比对党与政府的办法,即共产党可以在这些组织里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组织,但不能使该组织中的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当然就成为这些组织的领导或享有这些组织的领导一样的管理这些组织的权力。否则,不仅不合情理,也于法无据,而且必然造成这些组织两个领导之间的争名夺利,影响它们的正常活动。我们认为,这样做不会影响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因为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只是政治领导,只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并不是要其党员担任所有社会组织的负责人。

2. 政党的对外民主,在一定意义上依赖对内或其自身的民主化程度。那么什么是政党的内部民主化呢?我们认为,政党对内的民主是指遵循民主原则来组建政党和开展党内活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遵循民主原则来处理党的领导人和普通党员的关系,要树立一个观念,即他们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因而领导不是自封的,而是由党员民主选举的。这意味着党的领导必须向党员负责,并接受党员的监督;党的权力的掌握者是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而不是领导者个人。党的重大决策应由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作出,而不是党委会,更不是领导者个人。这些在理论上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在党章中也是作了明确规定。但在实际上并非如此,往往是党委会代替党代会,常委会代替党委会,书记办公会代替常委会,甚至有的地方或单位什么会都没有,书记一个人说了算,顶多是形式上开个碰头会把第一书记的决定向其他书记、常委通报一下而已。与会者碍于情面,只能随声附和。这种情况的产生和普遍存在,有观念问题,也有体制问题。从观念上看,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没有认识到党的领导人只是党员的代言人和党的活动的组织者,而不是特权者,其权力来自党员的授予,因此从事领导活动时应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地征求党员的意见,其决策应以广大党员的意见为基础,并通过民主的程序产生。因此,其行为应对党员负责并受其监督,而不是仅仅向上级领导负责和受其监督。从体制上看,这是因为我们现有的各级党的领导人实际上是由上级党组织、甚至是上级党组的某一负责人提名任命的,所以出现了党组织领导人任命中的“跑官”、“买官”的不正之风,也使这些领导人只怕上级不怕党员的怪现象。显然,要改变这一情况,不仅要纠正上述错误观念,增强党员干部的民主意识,而且应改变现有的党内各级领导人的选任制度,使他们真正是通过党员民主选举产生的。不仅如此,由于现体制中各级党的领导人执掌着部分国家权力,因此其产生还应经党外群众认可,并接受党外群众监督。上面提到的我国一些地方试行的“两推一选”(民间俗称的“两票制”选举)制,正是这一认识指导下的一种试点。

(二) 所谓政党活动的法制化,就是要把政党

的活动纳入法律的轨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其一,对于一般政党而言,就是要使自己的活动合乎法治的要求,这包括党内的活动和党外与其他政党交往、与私人和私人组织的交往,以及参与国家机关活动或“参政议政”活动,都必须依法而行。对内活动的法制化要求各政党不仅党内活动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规章制度,严格地遵守这些规章制度,而且要求这些规章制度不背离民主国家关于政党活动的法律。也就是说它们在精神上应与国家的法律相一致。政党的对外活动主要表现于“参政议政”,对于非执政党来说主要是要求它们以合法的形式参加竞选,这包括竞选经费的筹措、竞选方式的使用,竞选策略的制定和运作等。显然,这一点并不适合我国的政党,因为我国的执政党是法律早已确定了的,因而不存在各个政党通过选举争夺执政权的问题,只存在人民选举代表的问题,虽然这些代表名额的分配是依照传统和内部的规定。它们明确人民代表必须给非中共人士保留一定的比例。

其二,对执政党而言,它除了与其他政党一样外,就是其执政活动的依法问题,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依法执政”的问题。这里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就是作为执政党地位的取得应通过法律的途径,对我国来说,虽然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早为法律所规定,但作为个人的中共党员能否进入国家权力机构却是不确定的,必须通过各地人民的定期选举,否则不具有合法性。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努力改变现有的执政观念和执政方式,学会“依法治国”或“依法执政”。即不直接用党的政策和党的领导人的指示号令人民,而是用法律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志和用法律规定的方式统领全国人民的行动。这里最重要的是在立法机关抓紧立法活动,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我国首先做到有法可依。其次就是要使这些已有的法律落实在全国人民的行为中,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工作的党员带头守法,使他们成为遵守法律的模范和带头人。为此,对党员的违法行为必须严惩,不能以党内的纪律处分代替法律处分。■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退休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

○ 洪振快

最近几年,关于“三年困难时期”到底饿死多少人,有很多争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研究认为那三年发生了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三千万人。但也不断有人提出异议,不仅否定“饿死三千万”,认为那是“重大谣言”,甚至否定发生过大饥荒。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认为“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江苏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提出,“三年困难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其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王绍光认为1958—1961年的死亡率相当于解放前的正常情形及其他最不发达国家的正常情形。

真相到底怎么样,最好的证据之一,就是当时的档案。但是,公开的相关档案至今仍然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了解更多的有关大饥荒的官方信息?为此,笔者查阅了数百种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官修地方志,再结合部分已经公开的档案的内容,以展示官方资料所披露的大饥荒情形。

地方志如何处理大饥荒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在胡乔木、习仲勋、曾三、邓力群等人的倡导和支持下,全国掀起了一轮新修地方志的热潮。修纂地方志需要利用档案,但档案涉及保密问题。198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在提交中宣部的《关于地方志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强调“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要求“新编地方志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充分反映我国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同时要求:“编修地方志一定要重视保密工作。中

央和国务院有明文规定的保密条例,必须严格遵守。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机密,尤其是涉及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均不得载入志书。鉴于国际情报斗争尖锐复杂,为了防止泄密,新方志暂限于内部发行,严格控制印数。”“地方志编辑定稿后,必须经过审批手续。省、市、县志经各级编纂委员会审定后,凡涉及党的方针、政策、涉外等重大问题,必须报请省、市委批准,县志或相当县的市志须报上一级党委批准。凡涉及保密范围的问题,须经地方各级保密委员会审核。”

1985年4月19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明确提出编纂地方志要“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注意保密工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规定的保密条例,必须严格遵守”,“各地各类志书定稿时,各级编纂委员会必须严格审查,严格验收手续。凡涉及党的方针政策和涉外、保密等重大问题,必须送当地党委审查。县志涉及上述问题,应送上级党委审查。”“新方志的出版工作,由各地编纂委员会同党委宣传部统一安排。出版时必须严格审批手续。”同时要求,“关于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述,要遵守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地方志指导小组“定期向中央和国务院反映情况,对修志中涉及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及时请示报告”。

1988年9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同年11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向中宣部提交《关于新编地方志公开出版的报告》,提出保密法公布实施,“这使各地新编地方志在保密工作上有了明确的准绳”,建议对1983年提出的新编地方志暂限内部发行的规定做适当修改:省志经省级党委或政府验收合格、审查批准后可以公开发行,市志、县志经同级党委或政府审查、批准,并报省地方志编委会验收同意后,亦

可以公开发行。中宣部于次年1月28日批复同意该意见,但表示“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决定新编地方志公开或内部发行,不必一刀切”。由于这一原因,新修地方志(第一轮)大部分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

由于编修地方志的目的是反映“辉煌成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则要“同中央保持一致”,关于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述,还要“要遵守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修志中涉及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则要“及时请示报告”,还要遵守保密规定,修完后要经过层层审查,如此等等,致使地方志在处理1958—1962年的饥荒和非正常死亡情况时显得异常谨慎。

地方志专家、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仓修良先生曾特别关心过地方志里如何处理大饥荒的问题:“80年代初修志工作刚开始时,‘左’倾思想的影响还有一定市场,大家都还心有余悸。因此,有些内容不敢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心理状态在当时是比较普遍存在的,这与当时的社会气候有着密切关系。记得当时萧县志办的同志曾经问我,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是否要记载?我回答说当然要记载。那么如何记载呢?我则回答说那就用孔子作《春秋》的‘微言大义’的书法来反映吧,即用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字来反映吧。可见当时我也没有要求他们直接把饿死人的数字明确记载下来,因为当时的气候确实不可能这样写。”他举了新华社四位记者1980年的调查报告《告别饥饿》1998年才得以出版,副标题取名“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自然也要反映到修志上面,有许多内容就不记载了,有的记了也含糊其辞,内容则尽量减少”。

就笔者查阅数百种地方志所得出的印象,仓修良先生的所说的“不记载”、“含糊其辞”、“尽量减少”等形式,是修志者普遍采取的策略。不过,对有的修志者来说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河南信阳专区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惨重,被称“信阳事件”。信阳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曾昭辉曾经撰文透露,《信阳县志》出版后,遭到了批评,“尤其是尖锐地批评我们在志书不能‘秉笔直书’——回避了‘信阳事件’这个敏感问题”,“原县水利局副局长周九皋曾多次在有关会上或在

大街上,当众质问我:你老曾写的啥信阳县志?为什么对‘过粮食关’(信阳事件),在书中只字不提!?信阳县在1959—1961年饿死五六万人,你们为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曾昭辉“甚感狼狈”,同时又感到“十分委屈”,终于吐露了实情:“时在1988年前后,我和时任县志办党支部书记的李杰民、副主任兼总编的付良征,以及全办10多名编辑们都十分重视‘信阳事件’的编写工作,为此并收集了大量有关‘过粮食关’的材料,但是在数次信阳地区史志办开会时,领导多次郑重、严肃地专题提出过:‘信阳事件不能写’,并一再强调我们的志书观点,要与党中央完全保持一致,尤其是要严格遵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志书,这是组织纪律,丝毫也不能含糊。老实说,我们全办同志当时对此决定和说法是有意见的。认为文件上又要我们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而又限制我们不要‘乱写’(指信阳事件),给我们设置‘禁区’,还说‘这是纪律,否则要犯政治错误’等等。作为共产党员、下级,我们只有‘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了。我更清楚记得的是,在1988年9月2日上午(我有记录可查),地区史志办副主任郭克己来县志办公室,是专程为了‘写不写信阳事件’而来的。因地区领导早已风闻我们为信阳事件的入志问题而争论不休,这次来是给我们做思想工作的,并特别指出我们现阶段坚决不写,也不能写,信阳事件是存在的客观事实,不错,但不是时候,只能等若干年后,上级允许后我们再写,或者由后人来写……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写,这是党的纪律,是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不允许的。否则,谁写谁犯错误……当时的县委书记是余自顺,县长周相寅,副书记刘德福等,具体负责县志工作的是常务副县长李锋明。地区领导的意见我们向领导汇报后,他们都一致指示:按上级精神办,不叫写不能勉强。”

由于上述原因,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信阳县志》里面看不到对“信阳事件”的具体记载,但是它并不是笔者所翻阅的县志中最糟糕的,因为它里面不仅有1960年“死亡达42548人,净增长率为-67%”的表述,还提供了“1953—1985年人口增长情况一览表”,提供了信阳县历年死亡人数,包括1959年死亡16402人、1960年死亡42548人的

情况,在其他地方还有1959年“农民因缺粮,而导致浮肿、紫绀等疾病流行”的表述。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志中,甚至出现篡改死亡人数的恶劣情况,比如《无为县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无为县志》提供了一份《无为县人口变动情况表》,其中1958年底的总人口是950056人,1959年底为820259人,1960年底为662557人。这就是说,无为县在从1958年底到1960年底二年内人口减少了287499人。人口减少的原因,不外死亡和外流。县志提供的死亡数字,1959年为86278人,1960年为41703人,合计127981人。外流,这两年净迁出16184人。两者合计,只有144165人,与减少的人数相差甚大。同时,这两年还出生了22887人。因此,县志的人口数字是矛盾的。根据《安徽省志·人口志》提供的安徽省公安厅汇总的各县人口死亡数字,1960年无为县死亡人数是126524人,比县志多出84821人,相差这么大,合理的推测只能是编修县志时做了手脚,隐瞒了死亡人口。

《无为县志》的情况并非孤例。当然,也有一部分县志是比较客观的,比如《通渭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通渭县志》不仅介绍了该县的大饥荒情况,列出了死亡数字,而且多处明确提到“人相食”,是极少见的敢于明确说出“人相食”事实的县志(据笔者所见,承认“人相食”的地方志,除《通渭县志》外,仅见《张掖地区志》采录了《通渭县志》的相关记载,另有甘肃《高台县志》承认“出现食死尸的严重情况”)。《通渭县志》能够如此“另类”是有原因的。据该县志主编张尚质透露,“当时县委书记在审读志稿时,曾把他找去,问及三年困难时期所发生的事件有志稿中记载那么严重吗?他就将当年有关档案搬给书记查看,看到志稿所记都是有根有据,于是他就签了字。”张尚质当年是《甘肃日报》的记者,灾后随省委工作组到通渭放粮,写了通渭饥荒死人的内参,当时他回到家乡,路边、田里,到处都是死人,遍地白骨无人收。张尚质所在村,人饿死了三成,他一家就死了三口。所以在编纂县志时力求反映真实情况。由于主编的特殊,加上领导相对开明,所以才有了不多见的《通渭县志》。

由于上述原因,从地方志提供的信息不足以揭示大饥荒的全貌,地方志中的大饥荒年份人口

死亡数字可能不实,隐瞒了死亡人数。这既可能是编修地方志时研究不够,未得到最接近历史真相的档案材料,也可能是修志者不能据实写史,乃至有意篡改数字,但更重要的是原始档案可能就有问题,在大饥荒年份就没有据实统计死亡人数。比如上述的无为县和安徽省,《安徽省志·人口志》公开了公安机关年报中的1960年全省死亡人数2218280人、死亡率68.58‰的数字,同时认为该数字不实,“人口实际损失更大”;据公安年报统计数,安徽省1959—1961年三年中人口自然减少161.5万人,而《安徽省志·人口志》认为这“与实际减少量有较大误差”,实际“净减少人口406.5万人”。这意味着,公安年报的人口死亡数字有很大的缩水。部分县志也证实了这一情况,比如定远县,公安年报中1960年死亡率只有99.89‰,而在县志中却高达313.21‰。

由此可知,从地方志了解大饥荒有很大的局限性。地方志提供的死亡数字与实际情况相比,有可能是缩小的,但绝不可能夸大。尽管有许多缺陷,但地方志是官方主持纂修的,它毕竟提供了经官方认可的大饥荒死亡情况,对了解全国大饥荒的基本情况仍有很大价值。

地方志中的大饥荒基本情况

地方志按行政区划编修,常见是县志、地区志、省志。以下从县、地区、省分述地方志提供的大饥荒的基本情况:

(一)县级:1960年最高死亡率达383.2%,40多个县死亡率超过100%,68个县一年死亡超过395万人

1. 最高死亡率达383.2%。

河南信阳地区的淮滨县,据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人口为378144人,1960年降至266166人,一年内减少111978人,其中死亡102007人,1960年死亡率为383.2‰,这是笔者所见地方志中明确记载的死亡率的最高记录。时任信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的张树藩后来撰文回忆说,他的秘书余德鸿在半个月内回淮滨县老家两次,第一次回家埋大爷大娘,第二次回家埋父母。四个老人家全都是饿死的,但当时不能说是饿死的,统统说成是瘟疫传染而死的。张树藩追问村

里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人埋。余德鸿自己撰文说：“记得当时的淮滨约50万人左右，有人说死了18万人，也有人说死了16万人或17万人，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但从我家住的那个防胡公社看，全县的死亡比例还不算大。据原防胡公社党委书记熊仁宽同志回忆，当时防胡总人口为5万人左右，共饿死了2.2万人，占总人口的40%多。其中吴砦大队（我家那个大队）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52%。小余庄生产队（我的祖居之地）共12户、75口人，共死亡38人，也超过了半数。我父母及二伯父母、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均相继死去。……冯庄大队小李生产队13户死绝了9户，黄岗大队马楼村原400多人，饿死300人左右，杨围孜大队王庄生产队207人，饿死107人，其中死绝了6户。原地委党校副校长李心龙同志在家的6口人，死了4口。总之凡是我了解的村庄，死亡人数差不多占半数左右。”

《淮滨县历年人口变动指数表》（部分）

淮滨县历年人口变动指数表

年份	总人口	出生		死亡		增长	
		人 数	出生率 生‰	人 数	死率 亡‰	人 数	增 率 长‰
1949	306,262	7,037	22.9	4,420	14.4	2,617	8.5
1950	311,941	7,471	23.9	4,246	13.6	5,679	18.4
1951	328,087	1,101	33.6	4,344	13.2	16,146	50.5
1952	331,675	11,919	35.9	4,153	12.5	3,588	10.9
1953	341,113	13,792	40.4	4,580	13.5	9,438	28.1
1954	353,538	15,083	42.7	3,739	10.5	12,425	35.8
1955	356,242	10,339	29.2	5,327	14.9	2,704	7.62
1956	354,659	11,929	33.6	4,723	13.3	-1,583	-4.3
1957	360,231	12,342	34.3	5,409	15.0	5,572	15.6
1958	357,394	11,800	33.0	5,536	15.5	-2,837	-7.9
1959	378,144	4,687	12.4	3,638	9.7	20,750	56.4
1960	266,166	3,098	11.6	102,007	383.2	-111,978	-347.6
1961	279,777	3,898	13.9	2,959	10.6	13,611	49.9
1962	304,366	5,928	19.5	3,111	10.2	24,589	84.2
1963	309,062	8,921	28.9	3,090	9.9	4,696	15.3
1964	314,198	5,864	19.6	1,768	5.9	5,136	16.5
1965	318,429	10,114	31.8	2,268	7.1	4,231	13.4
1966	329,777	9,884	29.9	2,210	6.7	11,348	3.5
1967	347,148	10,567	30.4	2,182	6.3	17,371	51.3

文献来源：《淮滨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69页。

安徽定远县是另一个死亡率超过300‰的县。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人口为646053人，1960年下降到468807人，一年中急剧减少了177246人；1960年出生率5.45‰，死亡率313.21‰，自然增长率-307.76‰。定远县的死亡率从1949—1958年，最高的是1955年，为

11.30‰，最低的是1953年，为3.89‰，较多的是7‰多一点，十年平均为6.51‰。而1959年死亡率为20.02‰，1960年更高达313.21‰，县志总结历年人口变动情况说，1959—1961年“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使人口锐减”，可见当年大饥荒的严重。

定远县历年人口数字

建国后历年人口统计表

表3-1

年份	总户数	其中农 户数	总人 口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 长率(‰)
			合 计	男	女	其中,非 农业人口			
1949	128582	124658	550331	289584	260747	18145	18.03	7.04	10.99
1950	131398	127394	562383	295926	266457	18661	18.23	7.12	11.11
1951	134078	129416	573854	301962	271892	19669	18.21	7.11	11.2
1952	136814	132078	585565	308124	277441	20221	18.21	7.11	11.10
1953	133262	128521	597278	326432	270846	20780	15.01	3.89	11.12
1954	133375	129142	612983	334497	278486	20221	36.82	9.28	27.59
1955	135875	132405	624016	340560	283450	25514	27.06	11.30	15.76
1956	138135	134477	633913	343487	290426	30335	22.22	6.92	15.30
1957	140543	137090	635021	352893	300128	33302	25.36	7.01	18.35
1958	142530	139189	646053	345533	300700	45878	22.33	9.65	12.68
1959	144083	140642	642984	332007	310977	45548	18.15	20.02	-1.87
1960	114377	91900	468807	230780	238027	32710	5.45	313.21	-307.76
1961	118219	95720	400835	207525	193310	31408	6.80	5.62	1.18
1962	114471	99310	424054	223601	200453	28409	56.36	11.13	45.23
1963	116350	91046	449091	232136	216955	30648	55.05	7.33	47.72
1964	115004	97613	456394	241271	215123	30006	40.15	7.10	33.05
1965	104579	99485	426354	222909	203445	30009	45.44	6.00	39.44
1966	107757	101545	446536	230693	215843	27839	47.81	7.60	40.21

文献来源：《定远县志》，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128页。

2. 全国40多个县死亡率超过100‰。

在笔者翻阅的县志中，死亡率非常高的还有河南光山县、息县，安徽宣城县，甘肃通渭县，贵州余庆县（1960年并入湄潭县）、金沙县等，死亡率都超过或接近200‰。仅从笔者翻阅过的地方志中，就发现1960年前后全国40多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以下是这些县的情况，死亡率后面未标明年份者均为1960年：

大饥荒期间死亡率超过100‰的县

（据地方志不完全统计）

序号	县名	死亡率	所属地区
1	淮滨县	383.2‰	河南信阳专区
2	定远县	313.21‰	安徽蚌埠专区
3	光山县	276.9‰	河南信阳专区
4	息 县	274.71‰	河南信阳专区
5	宣城县	210.37‰	安徽芜湖专区
6	通渭县	204.2‰	甘肃定西专区
7	余庆县	199.80‰	贵州遵义专区
8	赤水县	182.11‰	贵州遵义专区
9	无为县	170.65‰	安徽芜湖专区
10	太和县	163.47‰	安徽阜阳专区

11	金沙县	> 157.68‰	贵州毕节专区
12	荥经县	151.13‰(1959年), 111.46‰(1960年)	四川雅安专区
13	新蔡县	147.00‰	河南信阳专区
14	亳 县	145.95‰	安徽阜阳专区
15	桐梓县	142.40‰	贵州遵义专区
16	垫江县	141.05‰	四川涪陵专区
17	固始县	139.12‰	河南信阳专区
18	正阳县	138.20‰	河南信阳专区
19	乐业县	137.61‰	广西百色专区
20	涪陵县	136.45‰(1960年), 110.96‰(1959年)	四川涪陵专区
21	眉山县	133.46‰	四川乐山专区
22	宿 县	30.32‰	安徽蚌埠专区
23	环江县	121.75‰	广西柳州专区
24	秀山县	120.7‰(1959年), 114.82‰(1960年)	四川涪陵专区
25	五河县	120.45‰	安徽蚌埠专区
26	凤阳县	119.46‰	安徽蚌埠专区
27	阜阳县	118.31‰	安徽阜阳专区
28	新津县	116.33‰	四川温江专区
29	资阳县	116.60‰	四川内江专区
30	肥东县	113.31‰	安徽合肥市
31	遵义县	108.53‰	贵州遵义专区
32	蒲江县	107.88‰	四川温江专区
33	大邑县	107.84‰	四川温江专区
34	上蔡县	106.69‰	河南信阳专区
35	简阳县	102.96‰	四川内江专区
36	大足县	102.98‰(1961年)	四川江津专区
37	万 县	102.12‰(1961年)	四川万县专区
38	巢 县	101.24‰	安徽合肥市
39	商城县	> 100‰	河南信阳专区
40	荣 县	> 100‰	四川内江专区
41	郫 县	> 100‰	四川温江专区
42	石柱县	> 100‰	四川涪陵专区
43	酉阳县	> 100‰	四川涪陵专区

说明:文献依据地方志,限于篇幅,无法一一注明,绝大部分数字为地方志直接记载,少数几个依据地方志相关记载推算。金沙县,自然增长率-157.68‰,死亡率还应加上出生率。

上述43县,四川16个,安徽11个,河南8个,贵州5个,广西2个,甘肃1个。从地区来看,涉

及18个专区(市),四川即有涪陵、内江、温江、江津、万县、乐山、雅安7个专区,安徽涉及滁县、芜湖、阜阳、蚌埠、合肥5个专区(市)。有死亡率超过100‰的省份,都是饥荒严重的省份,涉及专区(市)越多,也意味着该省饥荒越严重、死人越多,如四川、安徽。

除上面43县之外,还有一些县大饥荒期间死亡率超过100‰。比如,青海湟中县,1960年底该县县委书记刘择西揭发说:“1960年湟中县饿死15230人,占总人口的12.87%,死绝达1000多户。”由此可知,湟中县1960年的死亡率高于128.7‰。此外,河南南阳专区在大饥荒中死亡惨重,其中唐河县,1959年末761613人,至1960年末仅剩669875人,一年中下降91738人,1960年平均人口为715744人,这减少的9万多人中,部分为外流人口,大部分应为死亡,加上1960年出生相抵消的人口,1960年死亡率很可能超过100‰。贵州遵义专区的湄潭县、凤冈县(并县前)1960年死亡率都在200‰上下。甘肃高台县,1960、1961两年中至少有一年死亡率超过100‰。

因此,上述名单只是一份不完全统计,还有待发现和补充。死亡率超过100‰是什么概念?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按照《唐山市志》的记载,1976年唐山全市死亡242002人,死亡率44.8‰,其中市区死亡144184人(包括正常死亡和因地震以外的各种原因导致的非正常死亡),死亡率134.7‰。这就是说,以唐山大地震的惨烈,1976年唐山市的死亡率也只有44.8‰,处于震中、人口密集的市区,死亡率也不过134.7‰。

3.全国有70多个县在1960年死亡超过3万人

由于各县人口基数不同,死亡率高不等于死亡人数的绝对值就高。笔者从翻阅过的地方志中发现,有70多个县在1960年一年中死亡即超过3万人,其中68个有明确的死亡数字,合计为3955408人,平均每县58168人。由于这些县只有少数几个当年总人口超过100万,正常死亡率以10‰计算,百万人口一年正常死亡也不过1万人,68个县都按百万人口算,正常死亡也不过68万人,由此可知这些县的非正常死亡在1960年一年至少已有327万人。如若加上大饥荒期间其他年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数字将更为惊人。

以排序第 13 的涪陵县来说,1960 年死亡人数 82714 人,死亡率 136.45‰,1959 年死亡 81123 人,死亡率 110.96%,1958 年死亡 26036 人,死亡率 32.27‰,1961 年死亡 24333 人,死亡率 44.40‰,四年中死亡 214206 人,自然增长连续四年为负值。仅这四年,非正常死亡就有约 18 万人。《涪陵市志》原副主编金家富先生 1960 年在涪陵县马鞍公社妙音二队(现为李渡镇红星村三组)任基干民兵连文书等职,他提供了该生产队 1959—1961 年的死亡具体情况,包括村民的家庭和死亡者姓名:299 人中,除一位老人病故属正常死亡外,患浮肿病致死者有 75 人,占总人数的 25%。

1960 年死亡超过 3 万人的县

(据地方志不完全统计)

序号	县名	死亡人数	所属专区
1	定远县	174112	安徽蚌埠专区
2	阜阳县	134128	安徽阜阳专区
3	无为县	126524	安徽芜湖专区
4	太和县	119853	安徽阜阳专区
5	宿 县	111234	安徽蚌埠专区
6	息 县	107263	河南信阳专区
7	淮滨县	102007	河南信阳专区
8	毫 县	100807	安徽阜阳专区
9	光山县	99378	河南信阳专区
10	固始县	99163	河南信阳专区
11	简阳县	93472	四川内江专区
12	宣城县	82773	安徽芜湖专区
13	涪陵县	82714	四川涪陵专区
14	肥东县	81550	安徽合肥市
15	资中县	77356	四川内江专区
16	遵义县	71832	贵州遵义专区
17	临泉县	71392	安徽阜阳专区
18	寿 县	70906	安徽六安专区
19	资阳县	70364	四川内江专区
20	垫江县	70232	四川涪陵专区
21	上蔡县	70071	河南信阳专区
22	新蔡县	69729	河南信阳专区
23	富顺县	60042	四川宜宾专区
24	泸 县	57812	四川宜宾专区
25	开 县	56964	四川万县专区

26	眉山县	56884	四川乐山专区
27	金沙县	55000	贵州毕节专区
28	涡阳县	54088	安徽阜阳专区
29	濉溪县	52500	安徽蚌埠专区
30	正阳县	48179	河南信阳专区
31	桐梓县	46012	贵州遵义专区
32	巢 县	45571	安徽合肥市
33	凤台县	44480	安徽阜阳专区
34	肥西县	43900	安徽合肥市
35	乐至县	43191	四川内江专区
36	信阳县	42548	河南信阳专区
37	宣汉县	41911	四川达县专区
38	五河县	41829	安徽蚌埠专区
39	安岳县	41709	四川内江专区
40	凤阳县	41706	安徽蚌埠专区
41	霍邱县	41360	安徽六安专区
42	六安县	40880	安徽六安专区
43	宜宾县	40613	四川宜宾专区
44	内江县	40448	四川内江专区
45	威远县	40308	四川内江专区
46	颍上县	40190	安徽阜阳专区
47	阜南县	39615	安徽阜阳专区
48	云阳县	39381	四川万县专区
49	灵璧县	38388	安徽蚌埠专区
50	古蔺县	36338	四川宜宾专区
51	平舆县	36204	河南信阳专区
52	梁平县	35867	四川万县专区
53	江北县	35830	四川江津专区
54	秀山县	35479	四川涪陵专区
55	蒙城县	34447	安徽阜阳专区
56	赤水县	34293	贵州遵义专区
57	庐江县	33801	安徽六安专区
58	犍为县	33502	四川乐山专区
59	怀远县	33292	安徽蚌埠专区
60	大邑县	33045	四川温江专区
61	大足县	32883	四川江津专区
62	合川县	32544	四川江津专区
63	渠 县	31456	四川达县专区
64	合江县	31215	四川宜宾专区
65	万 县	30774	四川万县专区
66	萧 县	30718	安徽蚌埠专区
67	潢川县	30693	河南信阳专区

说明:文献依据地方志,绝大部分数字为地方志直接记载,少数几个依据记载的总人口、死亡率推算。金沙县,为1961年1月16日中共金沙县委《关于“金沙事件”的报告》中指出的“金沙事件”死亡人数,见《金沙县志》。

以上摘录的只是各县1960年的死亡数字,如果算上各县大饥荒期间其他年份的死亡人数,数字将更为惊人。

上述68县,四川、安徽各27个县,河南10个县,贵州4个县。除这些县外,还有一些县非常严重,比如通渭县,据县志记载,该县1958年冬“出现严重的饥荒问题,不少农民以树皮、野菜、草根、禾秆等充饥,身体浮肿,人口开始外流、死亡。至年底,外流625人,死亡3687人……1959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至1960年初,共外流19081人,死亡42024人。至年底,共死亡60210人,外流11940人。……至1961年底,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78432人,绝户2168户,有孤儿1200人,寡妇3000多人。3年多时间内,全县加上少量出生数共减少72150人,比1958年秋的总人数减少25.4%。”从上述表述来看,应该是从1958年冬到1960年底总共死亡60210人(但未表述清楚这些死亡者是否包括正常死亡),其中1958年冬死亡3687人,1959年和1960年共死亡56523人,由于其中“1960年初”意义不明确,不清楚1959年和1960年的准确数字,故未列入上述名单中,但这两年中有一年死亡超过3万人是没有疑义的。又比如四川仁寿县,1961年死亡42464人,总人口1961年比1958年减少186151人,1960年死亡人数可能比1961年还多,但缺乏准确数据,故未列入上述名单。四川荣县,县志记载该县1957年底总人口为66.88万人,“1958至1961年,受‘三高五风’和严重自然灾害影响,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全县总人口急剧下降为49.17万人,人口再生产出现‘低出生,高死亡,负增长’类型。共出生2.52万人,年均6300人,死亡18.95万人,年均4.74万人,自然减少16.43万人,年均4.11万人”。该县1958—1961年死亡18.95万人,年均4.74万人,而1950—1957年总共才死亡5.29万人,年均6612人,由此可粗略推算非正常死亡超过16万人,可见饥荒之严重,也可以大略推

知,其1959—1961年三年中应有两个年份的死亡率在100‰,死亡人数在6万以上。

安徽公安机关统计的1960年各县死亡人数和死亡率

地 区	市、县(级)年人口死亡状况									
	1954年		1957年		1960年		1962年		1964年上半年	
	人口数	死亡率 (‰)	人口数	死亡率 (‰)	人口数	死亡率 (‰)	人口数	死亡率 (‰)	人口数	死亡率 (‰)
总计	515734	16.60	299526	9.10	2218280	68.58	251909	8.23	159471	5.10
合肥市	1309	7.80	1448	4.92	6410	11.27	2457	5.12	926	2.15
长丰县	—	—	—	—	—	—	—	—	—	—
肥西县	10623	13.92	5053	6.38	43900	65.83	3375	6.03	3065	4.96
肥东县	9085	12.15	6361	7.95	81550	113.31	5884	9.18	3128	4.74
芜湖市	4072	19.08	2368	9.20	12762	34.51	3480	9.88	1206	3.62
芜湖县	8670	40.32	2646	11.87	14735	63.91	2030	9.32	1126	5.40
繁昌县	7016	29.51	2027	7.89	16321	60.45	2701	10.50	1461	5.59
南陵县	6570	21.98	3911	12.29	18009	57.32	3949	12.86	1766	5.76
青阳县	2814	19.05	1992	12.29	3418	21.07	2228	13.50	1070	5.99
蚌埠市	2352	9.42	2569	9.57	10746	25.97	2315	6.11	1547	4.04
怀远县	9141	13.89	6015	8.70	33292	58.99	3772	6.74	2386	3.87
五河县	5496	13.99	3989	9.70	41829	108.70	3844	10.31	2045	5.10
固镇县	—	—	—	—	—	—	—	—	—	—
淮南市	3723	14.42	1718	5.86	12953	21.97	3376	5.71	1881	4.12
凤台县	9095	15.70	3808	6.26	44480	92.61	2845	5.78	2503	4.29
马鞍山市	—	596	8.08	3305	14.03	1520	7.24	1038	5.02	—
当涂县	11842	2541	4495	10.12	13694	37.98	3772	10.12	2539	6.34
淮北市	—	—	—	—	1668	25.94	424	5.55	250	2.90
濉溪县	8204	11.68	6798	9.00	52500	73.03	4516	7.95	2195	4.07
铜陵市	—	255	5.43	1858	21.44	668	7.48	430	5.11	—
铜陵县	4530	20.85	1463	7.52	6721	34.29	2016	10.52	1308	6.17
安庆市	1242	12.56	1775	12.90	5876	22.28	2784	10.70	701	4.24
黄山市	1317	20.77	606	8.38	5375	41.56	1749	14.65	762	6.19
阜阳市	—	—	—	—	—	—	—	—	—	—
阜阳县	13746	12.50	9981	8.74	134128	118.31	6860	6.45	4172	3.94
临泉县	11615	13.85	8068	9.15	71392	85.20	6409	7.91	3774	4.63
太和县	9716	12.79	6482	8.15	119853	163.47	4307	6.29	2425	3.43
涡阳县	11888	13.39	10234	11.11	54088	59.33	8054	8.68	5245	6.01
蒙城县	7285	11.51	5733	8.69	34447	54.40	4715	7.95	2320	3.93
亳县	10461	13.97	8520	10.96	100807	145.95	5356	8.35	3069	4.76
阜南县	9433	13.04	6971	9.09	39615	57.72	4801	7.47	2623	4.15
颍上县	8937	13.26	5494	7.90	40190	58.52	4818	7.42	2626	3.93
界首县	4046	12.14	1266	3.63	29116	85.67	2271	6.70	1562	4.52
利辛县	—	—	—	—	—	—	—	—	—	—
宿州市	—	—	—	—	—	—	—	—	—	—
砀山县	5400	13.29	4643	10.75	13316	29.84	2488	5.63	1613	3.85
萧县	10917	15.76	7274	9.91	30718	41.56	4772	6.92	3141	4.69
宿县	12625	14.09	8565	9.37	11234	130.32	5373	6.73	3565	4.59
灵璧县	7533	12.03	7290	11.44	38388	66.05	5137	9.57	2644	4.92
泗县	3507	8.68	1431	3.35	22508	57.23	2876	7.80	1709	4.46

文献来源:《安徽省志·人口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在上述68县中,四川27县的人口数字比较齐全,其1960年合计死亡1282334人,1959—1961年合计死亡2952534人,发生饥荒的年份(主要是1958—1962年,极少数县份算上1957年)死亡人数超过364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266万人。从总人口来看,各县统计1958年底为1887.7万人,1961年底为1609.7万人,三年中减少了278万人。

四川大饥荒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死亡最严重的不一定是1960年。有些县1959年或1961年的死亡超过1960年,如上述27县中,1959年开县死亡62486人、云阳县死亡44836人、梁平县死亡52394人、渠县死亡46286人,1961年宜宾县死亡49515人、大足县死亡50044人、万县死亡78841人,均超过1960年的死亡人数。此外,未列入上述27县中的还有多个县在1959年或1961年死亡超过3万人。比如忠县,1960年死亡24928人,1959年死亡则为33225人。又如酉阳县,四川省委的统计显示1960年人口增长率高于-100‰,总人口则从1958年末的478046人,到1961年末减少到387422人,三年

中减少了90624人,可知1960年死亡超过4万人,也有可能达到5万人甚至更多。彭水县1958—1961年死亡79943人,人口从375002人下降到315282人。石柱县1960年死亡率高于100%,1958—1961年死亡118625人,人口从1956年的391592人持续6年下降,至1961年仅剩242990人。丰都县,1958—1961年人口从547389人降低至439582人,减少了107807人。这些县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都极其严重,但未公布精确的死亡数字。

上述70多个县大饥荒期间的死亡数字已极为惊人,仅四川的30多个县非正常死亡已有300万人光景。

(二)地级:信阳、内江、涪陵、遵义等专区最为惨烈,18个专区(地区)非正常死亡900万人

笔者考察了18个专区(地区),从中了解到惊人的死亡数字。

1. 地方志显示信阳专区非正常死亡百万人

河南信阳专区是大饥荒期间死人情况最严重的地方之一,一般都认为非正常死亡上百万。当年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调查的结果是“八百万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中央调查组李坚等人的调查说饿死105万人。地方志记载和公开的档案资料,与这些调查结论相吻合。

1959、1960年的信阳专区,后分为信阳地区和驻马店地区。据《信阳地区志》,该地区1959年死亡113257人、1960年死亡482592人,合计595849人,即约59.6万人。据《驻马店地区志》,该地区1959年死亡8.45万人,1960年死亡37.68万人,考虑到这两年所属泌阳县归属南阳专区,应予扣除,1960年泌阳县死亡15154人,1959年死亡以4500人计算(该县1959年总人口在46万人上下,死亡率以10%计算,应有4600人),则信阳专区所属驻马店地区1959年死亡约8万人,1960年死亡约36.2万人,合计两年死亡约44.2万。以此计算,合计信阳专区1959、1960年两年死亡103.8万人。信阳专区的总人口,1959年约828万人,1960年747万人。正常死亡两年均以800万人、死亡率10%计算每年为8万人,由此可知两年非正常死亡约87.8万人;即便正常死亡两年均以800万人、死亡率12%计算,非正常死亡也有84.6万人。

以上是根据两部地区志所得的数字。但是,根据各县县志提供的死亡数字,则统计结果超出地区

志数字。比如1959年,根据《驻马店地区志》,该地区死亡8.45万人,但在未计算驻马店市(县级)、确山县、泌阳县、遂平县的情况下,仅西平、上蔡、汝南、平舆、新蔡、正阳六县的死亡人数即达91961人。再者,县志所记载的死亡数字也比档案中反映的数字小。比如潢川县,县志记载1959年死亡6358人,1960年死亡30693人,合计37051人,而中共潢川县委常委1960年9月7日作出的《关于潢川县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结论(初稿)》中已明确指出潢川县委多次故意瞒报死亡人数,“省委检查组最后澄清实际伤亡55032人,超过县委原统计报告数字一万余人”。又比如,1960年12月22日《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一万八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但据县志,1959、1960年两年死亡人数,正阳县是59194人,新蔡县是80648人,均小于信阳地委报告中的数字。

信阳地区、驻马店地区历年死亡数字

表1 信阳地区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八五年人口统计

年份	总户数	总人口	出生	死亡	净增人口	自然增长率%
1950	834607	3650653	44578	42298		
1951	858769	3695231	15439	42874		
1952	902194	3710670	124161	42993		
1953	915133	3834831	123570	44432	79138	20.97
1954	924133	3944340	165268	65321	99947	25.70
1955	923473	3994613	107360	54861	52999	12.23
1956	931798	4048783	131934	58566	73368	18.25
1957	959505	4140858	140812	49276	91536	22.40
1958	992341	4262635	140823	51963	88860	21.51
1959	946252	4258316	108520	113257	-4737	-1.11
1960	892820	3817669	27363	482592	-455239	-112.93
1962	877381	4051474	310535	233434	195235	47.43
1963	915531	4119037	327773	196498	154924	37.94
1964	912001	4055593	344310	178687	132971	32.55
1965	925814	4214481	346348	191518	159307	37.83
1966	—	4383051	200170	34739	165437	38.48

1950—1985年驻马店地区人口自然变动情况表

年份	出生				死亡		自然增长	
	出生人口数	出生率%	死亡人口数	死亡率%	自然增长人口数	自然增长率%	自然增长人口数	自然增长率%
1950	8.95	23	2.19	5.64	6.76	17.4		
1951	9.56	24.53	2.18	5.59	7.38	18.94		
1952	11.89	30.37	2.19	5.59	9.7	24.78		
1953	9.16	23.06	4.24	10.68	4.92	12.38		
1954	18.72	45.05	5.54	13.34	13.18	31.71		
1955	13.91	32.68	6.09	14.30	7.82	18.38		
1956	13.16	30.55	5.98	13.87	7.19	16.68		
1957	14.12	32.38	5.48	12.55	8.65	19.83		
1958	15.95	36.17	5.88	13.32	10.08	22.85		
1959	11.26	25.28	8.45	18.98	2.81	6.30		
1960	3.66	8.51	37.68	87.54	-34.02	-79.03		
1961	7.84	19.00	2.47	5.99	5.37	13.01		
1962	25.59	59.93	4.20	9.84	21.39	50.09		
1963	19.87	44.59	4.52	10.13	15.35	34.46		
1964	15.97	35.80	4.25	9.53	11.72	26.27		
1965	16.24	36.61	3.42	7.72	12.82	28.90		
1966	17.29	37.93	3.08	6.77	14.20	31.17		

文献来源:《信阳地区卫生志》,信阳地区卫生局、信阳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信阳地区卫生局1986年印,第11-12页;《驻马店地区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页。

由上可知,地方志提供的死亡数字小于实际死亡人数,因此《信阳地区志》和《驻马店地区志》提供的信阳专区1959、1960年死亡103.8万人的数字是缩水的。

此外,《驻马店市志》提供了一个数字: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全区800万人,死亡14.2%。以此计算,死亡113.6万人。在7个月内死亡113.6万人,正常死亡以5.6万计(正常死亡率按12‰计算,800万人年正常死亡为9.6万人,月正常死亡0.8万人),则非正常死亡108万人,即使正常死亡算8.8万人,非正常死亡也有105万人。这条材料也与“信阳事件”非正常死亡百万人的说法一致。

另外,已经公开的档案材料也支持上述说法。中共信阳地委1962年7月10日作出的《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草稿)》中说:“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死人事件。据统计,全区死亡百余万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三,死绝五万多户,村庄毁灭一万多个,牲畜死亡二十一万多头。破坏严重的地方,大量田地荒芜,房屋倒塌,十室九空,一片凄凉。这一残酷事件……”河南大饥荒发生后,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吴芝圃先后三次向中南局、中央做检讨。其中,1961年1月5日,吴芝圃向毛泽东、党中央及中南局呈递了他关于信阳事件及河南问题的第一份正式检讨报告,他自己称之为“初步检讨”,检讨中说:“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二百万以上,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些地区,单是信阳地区就占一百多万,受灾最重的地方,人民被摧残得家破人亡,几乎人人带孝、户户哭声,有的整个村庄变为废墟,令人目击泪下。”这两份材料从另一个方面支持了信阳非正常死亡百万人的说法。

2. 内江专区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超过信阳专区

四川内江地区的死亡数字最全。中国人口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内江地区人口志》提供了该地区1954—1985年所属9县(市)的年末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从年末总人口可以算出年平均人口,再乘以死亡率,就可以算出死亡人数。据此计算,所属各县1960年死亡情况是:内江市5597人,内江县40448人,资中

县63022人,资阳县68653人,简阳县74751人,威远县40308人,安岳县41709人,乐至县32638人,隆昌县19266人,合计386392人。但是,在查核各县县志时,发现上述死亡情况有较多缩水情况,比如,按县志记载,资中县死亡77356人,资阳县死亡70364人,简阳县死亡93472人,乐至县死亡43191人,都高于从《内江地区人口志》算出的数字。若以县志为据,县志无载者按《内江地区人口志》计算,上述9县1960年死亡达431713人。按同样的方法计算,9县在发生饥荒的1958—1961年总共死亡1117798人。大饥荒时期的内江专区,还有一个荣县(后划归自贡市),其1958—1961年死亡不少于18.95人。以此合计,内江专区1958—1961年死亡人数高达1307298人。荣县1958—1961年非正常死亡不会少于16万人。其余9县,1957年末总人口为629.7万人,至1961年底降低至521.5万人,四年中减少了108.2万人。这9个县四年中的正常死亡人数,平均死亡率按12‰计算,也不过28.4万人,可知非正常死亡约83.4万人,加上荣县,非正常死亡超过99万人。若平均死亡率按10‰计算,则非正常死亡超过104万人,这还没算上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由此可见,依照官方资料,内江专区大饥荒的惨烈程度实际上超过信阳专区,因为总人口内江专区少于信阳专区。

3. 全国18个专区(地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估计有900万人

除信阳专区和内江专区外,四川涪陵、宜宾、温江、万县、达县、乐山6个专区及重庆市(以1985年的政区统计,含大饥荒时期的江津专区)、凉山彝族自治州,河南南阳、周口专区,安徽阜阳专区、合肥市,贵州遵义、毕节专区,湖南常德地区,甘肃定西地区,大饥荒期间死亡情况都很严重。

宜宾、温江、达县、乐山地区及重庆市、凉山州均有较精确的死亡数字,1959—1961年死亡约409万人,万县专区、涪陵专区按各县数字加总估计分别有80万人和100万人,故粗略估计8个地市1959—1961年死亡高达589万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约473万人。如果算上内江地区,则非正常死亡约583万人。1960年宜宾专区含现泸州市,其所属各县,据《百年泸州》一书所述:“非正常死亡泸县13万1859人,合江76166

人,纳溪39400人,富顺仅两年就死亡11万9577人。导致田土该种无人种,该收无人收,有的地方连犁耙手都找不到。虽然到处都办了肿病医院进行救治,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河南南阳地区,1959年末人口590.7万,1960年末降至559.1万,一年中骤减31.6万人,当年死亡29.5万人,正常死亡在6.5万左右,非正常死亡达23万人。周口地区1960年死亡151463人,总人口约500万,正常死亡五六万人,可知非正常死亡应超过9万人。

安徽阜阳专区10县(现阜阳地区9县加凤台县),合肥市4市县(合肥市、肥西县、肥东县、巢县),据公安年报的缩水数字,1960年分别死亡668116人和177431人。阜阳地区9县,总人口1959年681.3万人,1960年602.5万人,一年中减少了78.8万人,死亡率97.1‰,死亡623636人,正常死亡率以12‰计算,非正常死亡54.7万人。凤台县1960年非正常死亡约3.9万人。故阜阳专区1960年非正常死亡约58.6万人。肥西县、肥东县、巢县1960年共死亡171021人,正常死亡率以12‰计算,非正常死亡14.8万人。以此知之,不计合肥市(县级),1960年阜阳专区和合肥市非正常死亡约73.4万人。

贵州遵义专区1959—1961年饥荒严重、死亡惨烈,被称为“遵义事件”。遵义专区下辖十来个市、县。饿死人最严重的是湄潭、凤冈、余庆三县合并而成的大湄潭县,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在5个月中,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遵义县和赤水县非正常死亡也特别严重,合计约有10万人。整个遵义专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应有五十几万人。毕节专区1958—1961年共死亡346351人,非正常死亡应超过19万人。

湖南常德地区(辖2区6县1市,现常德市)1959年死亡10.40万人,1960年死亡18.37万人,1961年死亡11.45万人,三年共死亡40.22万人,非正常死亡约30.7万人。

甘肃定西地区下辖定西、通渭、陇西、渭源、临洮、漳县、岷县七县,1959年死亡42837人,1960年死亡117342人,两年非正常死亡约12.5万人。

以上18个专区(地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900万人。

(三)省级:河南、四川、安徽三省非正常死亡不下1300万人

1958—1962年的大饥荒,各省之间差别很大。饥荒严重的省份,从上述死亡率超过100‰、年死亡人数超过3万人的县,以及18个非正常死亡人数较多的专区(地区)中已经可以看出来。最严重的当属四川,次则安徽、河南、贵州、甘肃等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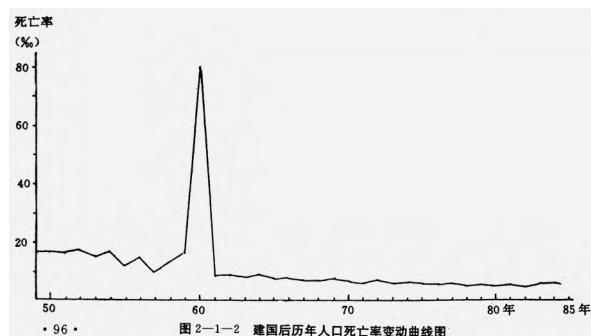
四川,1958—1962年死亡人数分别为178.18万人、328.20万人、364.74万人、192.36万人、94.65万人,五年内共死亡1158.13万人。四川省总人口,1957—1961年末分别为7081万人、7077.9万人、6897.3万人、6619.8万人、6459.2万人,1958—1961年持续四年下降,呈负增长状态,四年间减少了621.8万人,到1962年才止住下降势头(6485.6万人)。四川的人口数据,《四川省志·地理志》的“人口篇”、《四川省情》(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编纂)、《中国人口·四川卷》等书记载一致。据《四川省志·公安司法志》介绍,为了纠正1958年后人口统计数据失实的情况,应公安部和四川省委的要求,四川省公安厅部署从1961年冬到1962年4月“逐队逐户逐人地全面登记核实,然后层层统计汇总”,“弄清了全省从1954年以来历年的总人口数,人口出生数和死亡数,查清了人口统计上的差错数字”。按照上述数据,四川1958—1962年共死亡1158.13万人,非正常死亡约800万人。

四川死亡的严重情况,从一份权威统计资料可以看出:“1958年,眉山等地农村发生‘水肿病’(亦称‘肿病’),1959年春,各地时有发生,当年秋后猛增,死亡迅速增加。到1960年初,在全省140个县流行,当年人口死亡率达53.9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2.23‰,其中65个县超过-50‰,41个县超过-60‰,23个县超过-70‰,17个县超过-80‰,8个县超过-90‰,石柱、荣县、涪陵、秀山、酉阳、荣经、资阳七县超过-100‰……由于全省粮食继续紧张,‘水肿病’直到1962年才停止蔓延”。由此可知,1960年四川自然增长率超过-50‰的县有161个,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60年四川省共有县级单位173个(171个县、2个自治县),由此可知1960年四川绝大部分的县死亡率都在50‰以上。而

且死亡率超过100‰的有十几个,不少县还是连续两年死亡率在100‰以上,连续四五年人口持续下降,由此可见四川死亡之严重。

安徽省,据《安徽省志·人口志》,1959年至1961年,“三年内全省共出生141.8万人,死亡303.3万人,自然减少161.5万人”,该数字为公安机关年报统计数,“与实际减少量有较大误差。实际三年净减少人口406.5万人。”从历年死亡人口数字看,安徽死亡严重的是1958年到1960年,分别死亡415820人、570080人、2218280人,合计3032780人,即上述引文中所说的303.3万人。但是,这个数字来自公安机关年报,已被《安徽省志·人口志》否定,因为根据此数,1959—1961年人口自然减少仅161.5万人,而实际三年净减少人口406.5万人。部分县志的记载已证实公安机关年报不实,如定远县。

安徽省历年人口死亡率变动曲线图



文献来源:《安徽省志·人口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在上世纪80年代回忆:“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据大饥荒时期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张恺帆回忆:“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而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研究认为,1959—1961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应有630.6万人。

安徽大饥荒的严重性,从1960年的死亡率也可以看出来:据公安年报数字,死亡率在100‰以上的有9个,在50‰—100‰之间的有35个,合计44个,占75个市县总数的59%,即有将近六成的市县死亡率在50‰以上,而这还是死

亡人数实际上大大缩水的公安年报的统计数。

综合上述信息,可以推测大饥荒期间安徽非正常死亡应有400万人光景,就算从低估计,也不应少于350万人。

河南省,1958—1960年共死亡325.9万人,其中1960年死亡193.8万人,粗略估计非正常死亡约150万人,主要发生在1960年,达135万人。据上文统计,信阳专区加南阳、周口两个地区非正常死亡已超过130万。此外,商丘专区问题也很严重,非正常死亡估计有十多万人(所属柘城、鹿邑、永城三县非正常死亡即有八九万人)。再者,河南总人口1960年比1959年减少了161万人,当年净迁出11万人,自然减少约150万人。综合上述信息,可以确定大饥荒期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150万人只可能是低估,而绝不可能是高估。

由上可知,依据官方公开的材料估计,四川、安徽、河南三省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已不下1300万人。

大饥荒期间全国到底死了多少人,迄今为止官方没有公布数字。但从地方志提供的经官方认可的数字来看,“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非正常死亡极其严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大饥荒”的存在无法否认掉,人命关天,生命的价值至高无上!但是直到今天,还有人试图否定发生过大饥荒的事实,认为那是“重大谣言”。其实,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死亡率正常、“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等等说法,都是完全缺乏官方材料支持的臆说,严重脱离事实。任何“研究”,都必须尊重事实。孙经先声称自己研究过程中“专门查证了我国这一时期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地方志和其他大量资料,查证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这一估算是否符合实际的”。根据笔者从地方志查证的情况来看,这是公然撒谎。因为据本文前面提到的1960年死亡率在100‰以上和死亡在3万人以上的县,总共不过80来个,只占其所谓“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七分之一,仅1960年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已远远超出250万人,更不用说全国1958—1962年数年间的非正常死亡了。■

(责任编辑 黄 钟)

历史虚无主义的来龙去脉

○ 马龙闪

自清末民初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在近现代中国一直经久不衰,它几度汹涌澎湃,几度涨落起伏,是影响巨大且有相当破坏力的社会政治思潮和文化思潮。但几乎可以说,长期以来,这股思潮高涨泛滥的时间久,而对之切实批判得不多,有些时期,甚至奉它为神圣,实际上把它当成了革命的主流和正统。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对历史虚无主义有不小的冲击和压制,它虽也几经抬头,但终究没有像改革开放前那样发展成主要的危险和潮流。然而,向来很少被我国思想理论界视为危险倾向并列为重要批判对象的历史虚无主义,近一个时期以来,却仿佛成了某种思想威胁而被一些媒体标识成了批判的靶的。

但是,什么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它的危险倾向是什么,却在舆论界存在着不小的分歧。有些人把历史虚无主义看作是对某些领袖人物如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过多否定,抹杀了某些时期的历史功绩,如苏联时期和中共建政后前30年,等等;有些人却持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企图把文化大革命从人们集体记忆中抹去,让它变为一段历史的空白,使社会对这段历史走向集体的失忆,则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危险和表征。

这两种看法的分歧和对立,在当前我国舆论界尖锐地存在着。笔者以为,直接着手消除这种分歧,化解这种对立,看来一时未必可能。也就是说,直接批判一种观点,提倡另一种观点,采取直攻近取来解决这个问题,未必行得通;窃以为,不妨迂回一下,从追寻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入手,首先在源头上弄清什么是虚无主义,从而形成了人们的共识,然后再回过头来分析历史虚无主义的当前表现,这样绕道迂回一下,或许就能在现实问题上逐渐缩小分歧和对立,形成较多的共识。

那么,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上究竟是怎么发端的,其理论根源何在?它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传播过程?

虚无主义在世界社会思想史中扎根很深,它在西方的源头,可以说是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H·雅可比,此人在1799年提出了虚无主义的概念,主要表现为否定人生的意义。俄国19世纪前半叶的思想界看来受到他的一些影响,恰达耶夫在《哲学通信》中的愤世嫉俗、悲情孤愤和自虐情绪,就含有若干虚无主义的成分,而恰达耶夫在当时俄国思想界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样,虚无主义就传到了俄国。

历史虚无主义在理论上也源远流长。自19世纪末以降,一百多年来它以庸俗社会学为理论根基,穿着“革命”的外衣,在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却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左倾幼稚病的根源之一。这样看来,历史虚无主义传到俄国就有了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这两个源流。这里实际就汇成了历史虚无主义在东方的源头。

现在就让我们从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这两大源头着手,来看看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上的传播路径和面貌特征。

先从历史渊源上来看历史虚无主义同民粹主义的血脉联系。

不管虚无主义还是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文化理论思潮,对于我们中国社会和思想界来说,都是一种舶来品。与中国关系较为密切的这种虚无主义,原是出现在俄国19世纪中叶,是与俄国民粹主义与生俱来、同无政府主义掺杂在一起,实际上由三个思想棱面,即



江亢虎(1883—1954)

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组成的思想流派。这种思想流派,表面上看是由这三种思想成分构成,分别可用上述这三个不同名称来称呼,实质上是水乳交融,三位一体呈现在俄国思想史上的,只不过以不同名称表明其强调的不同侧面而已。这种思潮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在中国土地上才有了虚无主义潮流和“虚无党”的说法。其实,虚无主义之入中国,同在俄国一样,是与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交织在一块的,名异而实同,实际上不只是三位一体,而是四位一体,但在中国上世纪头 20 年,是多以“无政府主义”的名目称谓的。

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说,初识“虚无主义”之名,是在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著名的中篇小说《父与子》当中。小说主人公巴扎罗夫就被人称作“гигинист”,即“虚无主义者”之义。在屠格涅夫笔下,此公否定一切,不仅否定哲学,否定美学和艺术,甚至也否定爱情;他终日解剖青蛙,只相信自然科学和技术。这样,作家就同他开了个玩笑,闹了一个恶作剧,偏偏让他有机会爱上了个名叫阿金佐娃的贵妇人。这个阿金佐娃风姿绰约、妩媚动人,又偏偏喜爱音乐和艺术,这一天性,更给她平添了几分国色天香。巴扎罗夫被

这个贵妇人迷逗得神魂颠倒,不能自拔,甚至在大雨滂沱中发疯狂奔,给弄到茶饭不思、学业全抛的地步,最后回到作军医的父亲身边,在他的庄园上郁郁而终。作者在此寓意丰富,表示着虚无主义的虚伪和违背人性,也意味着它的最终破产和没有前途的命运。

其实,屠格涅夫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笔法所刻画的这个巴扎罗夫,是 19 世纪 50—60 年代产生于俄国的一个知识群体,他在某种意义上所标示的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或曰“新人”的形象,其在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中是有鲜活的生活依据的。作家取之现实生活的原型模特,学术界公认是当时的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第·伊·皮萨列夫(1840—1868)。皮萨列夫本人也从巴扎罗夫的形貌性格特征中,辨认出了他本人及其所属的这个群体的影像。

皮萨列夫出身于破落的贵族家庭,自幼聪慧好学,才华横溢,在 16 岁上就考入圣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上学期间,就发表新锐的批评文章,引起人们的注目。他一生坎坷曲折,短暂局促,其身影像一颗彗星,迅疾掠过俄国思想的天空,其光焰耀眼夺目,影响了俄国思想发展的轨迹和历程。

皮萨列夫鼓吹“否定一切”,在艺术、美学和哲学上走向极端。他否定普希金、谢德林,主张为了未来的事业,要抛弃拉斐尔和贝多芬。他持“美学毁灭论”,认为美是无用的。对于“抽象”、“思辨性”的东西,他都一一加以否定,因此,他认为哲学是“无益的”。他观察事物大体都是从有用和功利出发,所以,他的虚无主义是同极端功利主义交织在一块的。

皮萨列夫所代表的虚无主义思潮,是俄国 19 世纪中期以后半个多世纪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该思潮作为民粹主义的固有思想成分之一,同无政府主义交融在一起,带着空想社会主义的浓墨重彩,构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思潮。虚无主义像这一用语所表示的涵义那样,是对社会普遍通行的价值原则持全面否定态度,主张对一般理想、社会生活型态、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进行全盘否定。它尽管表现了某种富有进取的否定精神,但往往走向片面和极端,把认识推向绝对化,给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造成了相当

大的消极影响。

这股虚无主义思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中国一批留日、留法学生,分别通过在东京创办的《天义报》和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给介绍到中国来。甫一传入中土,就以“虚无党”的更加极端,更加惊世骇俗的学说呈现在世人面前。它与无政府主义熔于一炉,不仅宣扬无国家、无政府,而且鼓吹无宗教、无纲常、无婚姻、无家庭、无私有财产、无货币、无职业、无种界,以及“无父子、夫妇、昆弟、姐妹”之别,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到了“毁家”、“破家”,上至祖宗,下至子孙后代,否定一切,毁弃一切的地步。这在当时虽有反对“纲常”礼教、封建道德的某些成分,但其极端性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这种虚无主义混合着无政府主义,在辛亥革命后曾兴盛一时,得到以刘师复和江亢虎为代表的当时中国一批士子文人的宣扬和推崇。“五四”运动后,这一思潮虽有所收敛,但民粹主义中的某些无政府主义成分为国家主义所代替,虚无主义在思想文化层面并未有多少减色,而是以演化了的形态被延续下来。“打倒孔家店”以及在“反封建”口号下不加分辨,对传统文化的一概打击、摧毁,则是在这个时期呈现出的一种演化了的形态。这种演化形态的突出特征,是它又同上世纪20—30年代从苏联传入的庸俗社会学紧密结合了起来。

二

下面,再让我们看看庸俗社会学同虚无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渊源。

庸俗社会学,按照俄罗斯学者的说法,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理论和方法采取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和庸俗化的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理论思潮。它的最突出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进行绝对化、庸俗化的歪曲,往往把社会阶级看作是某种孤立的、封闭的、自律的,具有一成不变的特征的东西。庸俗社会学论者不是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上,从经济基础,从所有社会阶级斗争条件,从社会阶级关系的总和中,从所有这一切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中引出思想现象,而是把这些现象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利益”的表现,归结为“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思想意识。

庸俗社会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它不仅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伦理学和美学真理的意义上,即在否定真、善、美的意义上,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由此,自然导致对人类文明基本价值和优秀文化传统的否定。

庸俗社会学坚持狭隘的、教条主义的、无所不包的、绝对化的阶级论,把阶级制约性的原则无限夸大,使其外延无所不至、无所不包,把一切社会意识,一切社会现象都解释成阶级性的产物,这样就否定了继承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否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庸俗社会学论者看来,过去时代、过去阶级的文化遗产,过去的传统文化,都是属于剥削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对它们是不能继承,也不需要的,应当对它们统统加以批判、否定和抛弃。

庸俗社会学不是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辩证地进行阶级分析,而是戴着形而上学的“阶级的有色眼镜”,把所有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涂上阶级的色彩,甚至把原本没有阶级性、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俄国民粹派文选》封面

原本没有阶级色彩的东西也涂上阶级性的色彩。正像庸俗社会学者、苏联语言学家马尔那样,把原本没有阶级性的各阶级、全社会都使用的交际工具——语言,也一概涂上阶级性色彩;像苏联持有庸俗社会学观点的哲学家米丁和尤金那样,将本来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等等,穿上阶级的衣衫,因此,他们提出“资产阶级科学”的概念,仿佛自然科学也是有阶级性的。在上世纪 20—30 年代,庸俗社会学在苏联的文艺理论领域尤其盛行。“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的代表人物,无一例外地都遵行庸俗社会学理论。他们否定艺术大师作品的珍贵而客观的艺术价值,把狭隘的阶级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称普希金、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等等伟大的文学家为“贵族”或“资产阶级”的作家。在社会历史领域,庸俗社会学学者坚持僵化刻板、一成不变的,因而带有宿命论色彩的经济决定论,一出娘胎,一由经济地位或阶级出身论定,对过去时代的人物,统统以属于“剥削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加以否定。所以,在他们笔下,过去时代的历史人物,无一不是属于“帝王将相”及其代理人的。所以,否定和批判是他们所有著作的主调和单一色。

庸俗社会学学者持有这样的历史观,自然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对过去时代的历史人物和精神文化遗产统统加以否定。

庸俗社会学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在西欧、在俄国,有着一段相当长的传播史。早在 19 世纪 70—80 年代,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就表现出了某种经济唯物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思想倾向。马克思对 70 年代末法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采取的这种倾向,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他们把这看作“马克思主义”,那“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474 页)

后来,这种经济唯物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思想倾向传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前,以П.Б.司徒卢威为代表的经济唯物主义,和以H.罗日科夫、B.Ф.彼列维尔泽夫代表的庸俗社会学在俄国得到了相当传播。俄共(布)“前进派”的头目波格丹诺夫,就是庸俗社会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十

月革命后,以波格丹诺夫为精神领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鼓吹“只有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才能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和文化人,一概采取排挤和打击的政策。这种在苏联 20—30 年代相当流行的理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危害甚大。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虽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但这一思潮以变化了的形态,通过“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这个当时最有影响的、最大的文化艺术派别和组织,又将庸俗社会学理论承袭、延续了下来。斯大林后来虽批判、解散了“拉普”,但他这样做,主要是针对“拉普”头目阿韦尔巴赫的政治可靠性和组织派性问题,并不是针对其极左的文艺路线和历史虚无主义理论。斯大林解散“拉普”后,实际上执行的是没有“拉普”的“拉普”路线。打掉“拉普”的头目阿韦尔巴赫后,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部门依靠的依然都是原来“拉普”的骨干分子,采取的仍然是“拉普”的文化艺术理论。因此,到上世纪 30—40 年代,才会有把资产阶级分为“上升”和“下降”两时期,将当代资产阶级文化视为“全面腐朽”,应彻底批判和抛弃的日丹诺夫主义。这毫不奇怪,因为斯大林一日丹诺夫的文化艺术路线同“拉普”路线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庸俗社会学及其变体。

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往往表现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幼稚狂热性,正像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 M. 利弗希茨所说,“这种狂热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一切旧事物进行自发性反抗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对所有深刻社会变革所固有的对旧事物的革命否定的夸大。这种幼稚的狂热性,也表现出了群众文化水平的低下和知识界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不足,他们还不能对世界文化中的复杂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和真正符合共产主义党性的评价。”(Лифшиц Мих.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ех томах. т. 2 М., 1986.—С.238)

庸俗社会学观点表现在史学中,就是用社会学代替具体的历史,用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具体生动的历史事实,用对社会形态和对问题的研究代替对具体的历史事实的研究,而对社会形态的研究又不是具体地、历史地,像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那样生动地阐述人物事件及其活生生的呈现,而是把社会形态当作抽象的公式加

以叙述,这实质上导致对历史这一学科的取消。在他们那里,历史变成了干巴巴的抽象的原理和概念,失去了历史所素有的吸引人的魅力。在学术界一度有过的所谓历史学科的危机,在历史教科书和史学著作中充满着抽象社会学公式的说教,而缺少生动活泼的历史事实的叙述,把丰富的历史写成了一部无人参与活动的、空洞无物的历史,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庸俗社会学的反映。

庸俗社会学的表现形式是不断演变的。在早期的苏俄时代,它的表现形式较为幼稚、粗糙、趋于表面化,较容易为人们所识别。随着对它的批判、斗争,它在不断演变,后来往往呈现出较为精致的形态,加之它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又充斥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人们对它的本质和面貌就较难于识别。在卢那察尔斯基的倡导下,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苏联曾在文艺学和历史学领域批判过庸俗社会学,但因受到“左”的干扰,进行得很不彻底,以致在日后的苏联仍然长期存在,按照近年俄罗斯学者的说法,在苏联的学校教育中,庸俗社会学甚至一直持续存在到上世纪的80年代。(M.M. Голубко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XX века(1920—1990-е годы).M., 2008.—C.168)

上世纪30年代,我国上海“亭子间”的一些人,并没有把马克思的真谛奥义学到手,他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时没能真正领会这一科学社会学的实质,而是对虚无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这些大杂烩生吞活剥,把“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的这种“无产阶级文化”理论学了出来,从上海“亭子间”传播到广大国统地区,也带到了解放区,一直从30年代推展到了50年代。后来的事件人们都很清楚,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直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否定一切、打到一切的各种虚无主义,包括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文学虚无主义、哲学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推到了登峰造极。

从上述可以看出,历史虚无主义是以庸俗社会学为理论依据,庸俗社会学又以历史虚无主义为外在表现形式,二者互为表里,相互给力,推波助澜,这样,就在历次运动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历史虚无主义的狂涛巨澜。



斯大林

三

民粹—虚无主义与庸俗社会学有其内在的同质性,它们二者在传播过程中的结合,更进一步推涨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气势和影响。

“民粹主义”这一用语,在俄国文献中是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到70年代才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来;而俄国这一思想流派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产生,在其产生之初,并不曾用“民粹主义”这一称谓,当时是用“虚无主义”一语冠之的。最初被称作“虚无主义”、后来被命名为“民粹主义”的这一思潮,是在封建专制制度走向严重危机,资本主义薄弱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落后的农民国度特有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想潮流。农民等小生产者是它赖以产生的社会阶级土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把它压榨、逼迫得发疯,所以这种生存状态使它几乎天然伴生一种特有的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接受庸俗社会学简直像肥沃湿润的土壤接纳植物种子一样,使二者相得益彰。庸俗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在广泛传播过程中,主要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出于革命的急性病和狂热性

而又文化理论修养不足,面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做的一种扭曲和修正;这种情况,最初发生在19世纪70—80年代的法国年轻“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后来又发生在俄国以“前进派”为代表的一部分革命者之中。

具有虚无主义基因的民粹主义,同庸俗社会学虽然在发源的时代、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上不尽相同,但有着共同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有着不同情势造成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它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交汇在俄国这个特定国度的土壤上,所以交融汇合,形成了一股同质共流的社会政治思潮和文化理论思潮。

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这两股思潮汇流在一起,浪涛叠加,势头是极其强大的。其所以如此,一是,它们有雄厚的社会阶级基础——农民小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二是,它们有以马克思主义词句为掩盖的、貌似革命的理论学说——庸俗社会学理论。而它们畅销通行的地域又在俄国和中国这类文化落后的农民国家,革命队伍中文化理论修养普遍较低,容易接受这种似是而非的伪马克思主义。

正是这个缘故,民粹主义连带其虚无主义倾向与庸俗社会学汇流,二者能牢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极左社会政治思潮,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容易被人识破,能以极大的破坏力,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中国冲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从上面可以看出,从俄国19世纪出现“否定一切”的民粹—虚无主义,到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只要“无产阶级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再到把一切资产阶级文化都斥为“全面腐朽”的日丹诺夫主义;从中国20世纪初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虚无党”,到20年代以“太阳社”为代表的一批上海“亭子间”文人,再到解放后的一系列思想文化批判运动,最后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虚无主义狂潮,这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承脉络是十分清晰的。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表现为,除列宁、斯大林“两个领袖”的权威外,对布尔什维克其他领袖人物是一概否定的,除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外,对其他一切文化都是一概抛弃的;在中国,历史虚无主义狂潮的顶峰是“文化大革命”,其时编造的“党史”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鼓吹个人崇拜,比《联共(布)党史简

明教程》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股历史虚无主义的狂潮,随着“四人帮”的覆灭,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然而,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新时期并没有偃旗息鼓。在新形势下它虽不断遭到批判和冲击,但仍此起彼伏,或明或暗地一直存在于某些社会群体。它在当前时期的极端表现,就是有人扬言要发动二次“文化大革命”,来整治中国官场的腐败,打倒新生“走资派”;当前隐性或温和的表现,则是不准人们触碰“文化大革命”,欲将文革封存、冻结于历史,让它在新生代的头脑中变成一片历史的空白。这看似同欲继承文革衣钵的极端派不同,但其行为的客观效果是没有二致的,就是袒护文革,不准清算文革,为文革思潮及其历史虚无主义留出生存的空间,以待时机成熟,让文革的狂澜卷土重来。

这样看来,历史虚无主义在100多年思想史上的传承线索是一清二楚的,它在当前历史时期的现实表现则是它历史逻辑发展的自然延伸,所以,清算历史虚无主义的矛头,应当清楚指向企图重拾文革旧梦的虚无主义思潮。这股源远流长、汹涌澎湃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威胁,理所当然应成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目标。与此相比,对某些领袖人物功过和某些历史时期成就的所谓“否定性”评价,尚不足以标识为清算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目标,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学术界有关历史评价的学术之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本刊启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规定,结合我刊的实际情况,凡向本刊投稿,即视为作者将作品的数字化处理权、网络传播权、电子发行权、无线增值业务权授予本刊,同意本刊将以上权利转授予与本刊合作的第三方使用,稿件采用后即自动获得上述授权。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酬。如作者对上述处理有不同意见,请在来稿中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炎黄春秋杂志社

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

○ 尹保云

最近一些报刊杂志对“历史虚无主义”展开批评,指出目前国内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表现、认识论根源以及社会危害。“百度百科”还推出了一个新写的“历史虚无主义”词条,全面地介绍了目前的各种批评观点和立场。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偏激或片面的思想方法,它妨碍人们对历史的准确认识。对这种思想方法加以批评纠正,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国内学术界目前对“历史虚无主义”批评并没有抓到问题的关键。中国目前需要引起重视的历史虚无主义,仍然是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它严重地扭曲了社会历史观,使人们不能对历史和现实做出恰当的理解和判断,从而构成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思想阻力。

历史虚无主义的一般特点

顾名思义,“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否定过去的历史,认为过去的历史中没有好东西、没有意义。它一般针对大的单位的历史,比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在世界历史领域,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就是对欧洲中世纪的评价,它把中世纪描绘得一团漆黑,以至于形成了“黑暗的中世纪”的流行说法。其实,中世纪的历史时间很长,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到东罗马帝国灭亡(公元1453年),经历了近1000年时间。中世纪四分五裂的封建社会结构、基督教对人性的压抑以及对科学的研究和思想探索的迫害,等等,这些事实难免把历史学家引向对中世纪的否定。但中世纪也有另一面,尤其是其晚期有很多的新事物出现,比如自治城市的发展,商业贸易的兴起、现代大学的建立等等。二战后的学术研究对这些事物给予重视,从而对以往的偏激观点做了一些纠正。

“黑暗中世纪”只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之

一。总体看来,它的虚无主义成分并不十分严重,因为它对中世纪的否定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的,并没有很多的故意夸大。这一类历史虚无主义尽管多少也会带一些主观偏见,但主要还是受到认识高度的局限。在以前,人们没有认识到社会多元结构的意义,把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看作一团漆黑。二战后兴起的结构—功能论提出了新的视角,从系统分化的角度来分析中世纪的社会结构,认为它比起集权官僚制模式更有弹性,能够吸收新事物并容易发生社会变迁。这一认识变化说明,曾经流行“黑暗的中世纪”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是一种学术现象,是受到理论发展阶段或认识高度的局限,而不纯粹是故意为之。

并非所有的历史虚无主义都是这样的学术问题。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表现古已有之,它在任何民族的过去、今天和以后都会出现,甚至常形成很大的思潮。其中多数都不是学术上的问题,既不是因为一时的知识缺乏或理解错误所造成,也不是一般的偏见,而是带着明显的主观能动性,是故意制造的历史曲解。

这就是说,历史虚无主义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政治性行为,尽管这个词语目前尚没有成为一个政治学概念。除了那些因知识缺乏或方法不当而导致对历史的贬低,以及少数天生对历史冷漠的虚无主义者外,几乎所有把某个历史加以虚无化的行为都带着特殊的政治目的。有两种情况比较常见:一种是把这种方法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手段。这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突出。几乎每一个朝代的皇帝都要否定前朝的历史,把前一个朝代说得一无是处,而把自己朝代说得一片光明。统治者通过这种手段宣传民众、蒙蔽民众,从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让民心归顺;另一种情况是在社会大变革的关头,受到变革的压力而产生了对以往事物的过激否定。欧洲启蒙运动对基督教的否定、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教

传统文化的否定等等,都带着很多矫枉过正的色彩。基督教和儒教的思想体系都十分庞大,虽然有些思想是对封建主义不合理制度的辩护或支持,但很多内容却涉及的是人们的日常伦理行为,如慈爱、友善、诚实、守信、好学、勤奋等做人原则,都是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把它们全盘否定,可能会达到一时的推动思想变革的效果,但就长远看,这种因思想过激而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必然会产生很多负面效应。

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历史虚无主义不仅表现在对民族或国家的历史上,也经常被个人、社会组织、政治党派等运用。歪曲对手的历史,把对手的过去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常用的斗争手段。一个社会越是古老、越是传统、越是文明程度低、越是缺乏学术争鸣,这种不光彩的手段就越是流行。对历史的解说完全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在很多情况下,历史总是被随意扭曲的,甚至常常是善恶颠倒、黑白不分的。由于历史虚无主义成为一种常用政治手段,解决思想分歧的办法也只能是“政治的”。人们不可能通过对历史的学术的、科学的仔细探讨来获得一致的、准确的认识,因为争论的性质是政治的而不是学术的。中国明朝、清朝的一次次文字狱说明,谁掌握了政治权力谁就掌握了解释历史的权威。没有科学理性的生存余地,也不可能获得对历史的客观认识。

马克思历史观的遗产

众所周知,教条主义是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摘出一些教条并加以极端化发展。它起源于第二国际,形成于一战期间。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在前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教科书中形成结晶。

教条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要认识其思想根源,需要首先搞清楚启蒙思想家和马克思的区别。马克思继承了启蒙思想家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批判,同时也继承了“自由”、“平等”、“权利”、“民主”等启蒙口号。但马克思与启蒙思想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这也反映在他的历史观上。

国内学术界这些年对“历史终结”这个词十分敏感。福山在1992年出版了社会哲学著作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重申了现代性的一致性。这本书是以“历史终结”的观点展开论述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很多强权政体一个接一个地解体或者转型,1990年苏联解体后,喧嚣一时的国际意识形态争论也随之结束;伊斯兰地区虽然固守自己的文化,但其反对自由民主的力量不足以产生强大的对抗。总之,在长期的竞争对比中,自由民主制度显示了优势并获得胜利而成为人类最后的制度,这个趋势一直持续下来,意味着人类历史终结而进入一个叫“后历史”的时代。显然,这个观点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尖锐对立。正统马克思主义沿着马克思的思路,把历史终结在未来的共产主义而不是现在。

其实,历史终结论并不是福山的发明。早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就有很多的欧洲学者论述了历史终结观点,这包括康德、孔多塞、席勒、黑格尔、孔德等著名思想家在内。

重要启蒙思想家之一、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784年写的《文明与启蒙》一文中写道:“自然驱使人类去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达到普世主义的在人们中间实行法律的市民社会”,“这是最困难的,也是人类要解决的最后问题。”康德把人类历史比作个人的历史,分幼年期、青年期和成年期三个阶段。他指出,在青年时期,人类受到自己招致的道德束缚的困扰而不能理性地处理自己的自然愿望。而从启蒙时代开始,人类进入了成年期,开始理性地解决各种问题。人类要解决的“最后的问题”就是建立现代法治与民主秩序,使人类本性所要求的“自由”得以充分实现。这就是说,他认为人类已经进入最后的任务了。在写于同年的《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康德又阐述了类似的思想。他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朝着有理性的进步过程,激情、愚昧和自私就是一直驱赶着理性不断进步的力量,而当理性充分出现之后,这些一直驱赶人类的盲目的邪恶力量就会被征服,而一个太平时代就会出现。

黑格尔和孔德不属于启蒙时代,但他们基本都是沿着启蒙开拓的道路而继续建构现代历史观。康德只是以哲学的抽象说明了一个道理,并没有那么确定地把历史终结在眼前。而黑格尔、孔德则是明确地把历史终结在他们的时代。黑

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所描述的世界历史就是“精神”在世界范围内运动发展的历史，“精神”由东方到西方，最后在日耳曼世界达到“现代”，也就是完全地认识到了“自由”，历史也就结束了，以后的任务就是“自由”观念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实证主义者孔德则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实证阶段）。孔德也像康德一样把人类比作个人，认为“科学阶段”相当于个人的成年阶段；并且，他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已经进入了历史的最后阶段即“科学阶段”，而他自己的实证哲学就是代表。

这些思想家一个接一个地把历史终结在现在而不是未来，这并不是他们认为以后人类社会就停止了、不再有发展变化了，而是对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观的抛弃，是为了建立一个符合人类世俗历史进程的新的历史观。

世界上各种传统的历史观基本都是历史终结论的。佛教可能是一个例外。它虽否定尘世的意义，却不认为历史会终结。印度佛教把宇宙比作一个不断旋转的火轮子，宣扬生死轮回永无止境。其他大型宗教文化，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等，都主张历史终结论。不过，它们都是把历史终结在未来的某个时代。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历史图式把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伊甸园的清纯”阶段、“堕落”阶段、“最后拯救”阶段。第一个和第三个阶段是神的历史，中间阶段是人的历史。人类的整个历史（包括以往和现在）都是堕落的，阳光下面既没有好东西也没有新东西。

无独有偶，基督教的这种历史图式在中国儒学中也有对应物。儒学虽不是严格意义的宗教，但它与宗教有很多相似之处。孔子在《春秋·公羊传》中提出了一个三世说，即“太平世”、“据乱世”、“升平世”三个历史阶段，与基督教神学的三个历史阶段完全对应。“太平世”指遥远过去的尧、舜、禹时代，对应“伊甸园”；“据乱世”对应“堕落”，而“升平世”指遥远未来时代，对应“最后拯救”，是历史的终结点。儒教与中世纪神学的历史图式的对应，说明传统的历史观都是向后取向和未来取向的，通过美化遥远的过去和想象遥远的未来而否定中间阶段的漫长历史（包括过去和现在）。这种历史图式把整个人类的历史都虚无化了：

	起始阶段	中间阶段	终结点
启 蒙	蒙昧时代	传统时代	现代(现在)
基督 教	伊甸园	堕落	最后拯救(未来)
儒 教	太平世	据乱世	升平世(未来)
马 克 思	原始共产主义	阶级社会	共产主义(未来)

上面的图表清楚地说明了启蒙的历史图式与基督教的区别。在基督教历史图式中，伊甸园阶段是神的阶段，是美好的；中间阶段是人的阶段，是堕落的；最后拯救又回到神的阶段，是美好的。这是一个人神混合的历史图式，人的全部历史都是黑暗的、虚无的东西。启蒙的历史观否定的就是这种人神混合的历史图式，把历史完全回归到人类世界。它显然不是虚无主义的，因为它的三个阶段是不断进化的，一个比一个更加文明进步，这与人类文明的实际进程相符。它把历史终结在现在，就是为了去掉神学的未来阶段，抛弃历史目的论。

这里包含着一个重大的思想转变。基督教的历史观是用未来阶段（最后拯救）为参照系，以不存在的、设想中的未来作为评价标准而把人类历史（包括过去与现实）的意义完全否定。儒教历史图式虽然描述的三个阶段都是人的历史，但却同样地否定了中间阶段并把历史终结在未来。启蒙历史图式去掉未来阶段，就等于是树立了一个现实标准的原则，它指出美好的事物就存在于人们眼前的现实世界中，是可以实证检验的而不是靠凭空设想的，社会进步应该在现实中的先进单位为参照系。这就是说，启蒙历史终结论的意义在于建立了一个现代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历史观。

从上面图表中也可看到马克思历史图式的特征。如人们所知，马克思有一个历史五阶段说，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他同时还有一个三阶段说，即原始共产主义-阶级社会-共产主义。三阶段说与五阶段说是一致的，它的中间阶段即阶级社会包括了五阶段说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把历史终结在未来的共产主义阶段，这样的历史图式就与启蒙分道扬镳而与基督教和儒教的历史图式重合了。它同样是用两头否定中间，并把历史终结在一个设想的未来阶段。



文革中，“全聚德”烤鸭店、“亨得利”钟表店等一大批老字号被改名，原有的匾额被毁弃。

由于这个历史图式与基督教的历史图式重合，西方学者常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看作与基督教一类，称之为“历史目的论的”或“末世说的”。这种看法当然是片面的。马克思虽然把历史终结在未来，但他却也在一些地方坚持了现实主义的评判标准。比如，他肯定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辉煌成就，并认为资本主义是目前世界上的文明高峰，人类的共产主义只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等等；他和恩格斯还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是落后民族学习的榜样，落后民族“如果不想要灭亡的话”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还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论述显然是坚持了现实标准的原则，与“末世说”完全以设想中的未来作为评判标准是不同的。

但毋庸讳言，马克思的历史图式与基督教历史图式的确十分相似。他虽然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成就，也认为资本主义是目前世界文明高峰，但他最终还是以一个设想中的未来社会阶段把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了。在他的历史观中，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阶级社会”，是人的本性的堕落；资本主义无论取得了怎

样的成就也是异化的，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观念等等都将会被彻底抛弃。这显然脱离了启蒙的思想路线，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了。

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

教条主义把上述马克思历史观进一步片面化、极端化，从而走向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如前所述，马克思还在一些地方坚持了现实标准的原则；并且，他运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圆圈思维，把正话和反话都一起说了。而教条主义则不同，它完成了严密理论体系的建构。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它把一个不存在的、仅仅是想象中的共产主义作为评判事物的唯一标准，不仅否定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漫长的人类历史，也否定了现实世界中的文明榜样。它自信地宣布，从原始社会解体后人类历史上就没有好的事物，充满了剥削、压迫、不平等和阶级斗争，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后才会获得彻底解放。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完全解释成了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观，堕入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与神学一样，教条主义把现实世界也虚无化，背离马克思而否定西方先进文明的意义，不仅不承认它是现实世界上的先进单位，反而强词夺理地把它说成是人类堕落的低谷；它宣布传统农民蕴藏着天然美德，主张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奔向共产主义。总之，一切的评判标准都被它颠倒了。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学术观点或个人认识倾向并不可怕、也不奇怪，而它一旦与政治结合就会产生很大的消极作用。哈耶克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主编了《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一书，目的是要纠正一种历史偏见。他指出，英国在二战后福利制度的发展使经济丧失掉“自由”，福利制度受到一个编造的虚假历史作为思想支撑，即资本主义给工人带来剥削和贫困；一些历史学家使用了不客观、不全面的统计数字，夸大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剥削和贫富差距，导致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总之，一些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历史采

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从而造成了思想偏见。当然,哈耶克这样把现实困境归罪于学术研究的看法是片面的。姑且把二战后的福利国家制度看作一个不好的趋势,它也是受到很多因素的推动,如工党的上台、苏联模式的影响、战后重建的需要、贫富差距的矛盾、民主力量的推动,等等,这些形成了合力,部分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这种否定资本主义的思潮尽管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但还属于一种学术观点,主要还是由于片面使用资料而形成的一种片面的认识。哈耶克本人也是这么看的。

然而,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则不同,它一开始就与政治行动结合在一起,一开始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简单的学术倾向或认识偏差。由于这个原因,它的社会影响和后果也是任何其他的历史虚无主义所不能比拟的。50年代的英国工党虽然意识形态上反资本主义,但它并不反对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它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遭到保守党的反对,并不是一元化的。而教条主义虚无主义则与苏联模式的政治权力结合,形成了一种“政教合一”的铁板结构。苏联模式利用政治高压而把极端虚无主义的历史观贯彻到社会各个领域。在政治上,它否定了人类探索和实践了几百年的宪政民主制度的价值;在经济上,它否定了历史更加悠久的自由经济制度,否定了人的自由财产权利和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秩序;在文化上,它否定了以往的一切文化创造,从宗教到文学艺术。总之,利用政治强权所控制的宣传机器,苏联模式把人类的从古代文明到眼前资本主义文明的漫长历史完全地虚无化,将其贬低为没有任何价值的一堆垃圾。

这种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必然带来严重的现实灾难。在搞了70多年之后,苏联模式突然全面崩溃。非但没有实现它所宣传的伟大历史目标,反倒成了世界现代化历史之树上的一个巨大疤痕。国内有些学者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不断地强调原苏联时期的经济与科技成就,据此认为那些批评苏联模式的观点是“历史虚无主义”。这实际上是在颠倒黑白。恰恰是这些学者陷入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他们不知道历史的人本意义,也背叛了马克

思“人的全面发展”的原则,仅仅把钢铁产量和导弹、核武器当作评判历史进步的标准。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它违背了人性和历史基本规律,抛弃了人类文明积累而倒退了人类历史。它无视人的自由权利,在一个荒谬的制度上用国家意志来控制经济,导致经济的一次次崩溃。在70多年时间里,原苏联发生了1918—1922年、1933—1934年、1946年三次著名的大饥荒,每次都有数百万、上千万人口饿死。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在和平年代频繁地出现这种短促而巨大的死亡,这样的事情恰恰发生在教条主义国家,而在被它虚无化和贬低的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很少找到。

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危害比原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在发生1959—1962年的大饥荒之后,毛泽东看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病,希望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但是,由于整个意识形态深深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泥潭并已经构建了一个与现代文明对立的苏联模式框架,

— 23 —

(一) 對國民黨六法全書的認識,在我們好些司法幹部中,是錯誤的、模糊的。不僅有些學過舊法律的人,把它奉為神聖,強調它在解放區也能運用;甚至在較負責的政權幹部中,也有人認為六法全書有些是合乎廣大人民利益的,只有一部份而不是基本上是不合乎廣大人民利益的。東北印行的『怎樣建設司法工作』中所提到的對六法全書的各種觀點,不過是一部份明顯的例證。

(二) 法律是統治階級公開以武裝強制執行的所謂國家意識形態。法律和國家一樣,只是保護一定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和一般資產階級法律一樣,以掩蓋階級本質的形式出現,但是實際上既然沒有超階級的國家,當然也不能有超階級的法律。六法全書和一般資產階級法律一樣,以所謂人在法律方面一律平等的面貌出現,但是實際上在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間、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沒有真正共同的利害,因而也不能有真正平等的法律。因此,國民黨全部法律只能是保護地主與辦官僚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的工具,是鎮壓與束縛廣大人民群衆的武器。正因為如此,所以蔣介石在元旦救死求和的哀鳴中,還要求保留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關於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

與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二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片断。

寻求中国道路也难以找到正确方向,结果反倒是一错再错,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全面的破坏是必然的。因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力量超过了中世纪神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形态,它不仅否定了所有存在过的和仍然存在着的制度文明(包括苏联“修正主义”),也否定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化积淀,甚至把文物古迹也当作罪恶而加以摧毁。文明观和历史观完全颠倒,善恶美丑失去评价标准,历史没有了方向。这样,无休止的运动、斗争和破坏也就成了日常行为。

这种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有一个深刻的逻辑:历史虚无主义总是倾向于与愚昧的群体结合。一是历史虚无主义带来的知识空白和是非颠倒,一是来自社会下层的愚昧力量。二者都在本质上是敌视文明的。文革期间的红卫兵主体是初、高中学生,他们正值青春期年龄,尚没有进入理性的人生阶段,属于青春蒙昧期,文明化的程度很低。塔利班和波尔布特政权也是同样,要么是学生军组织的发展,要么是来自社会下层的权力暴发户,都是文明化程度很低的社会部分。人类社会存在着这样一个困境:社会上层的文明化程度高却容易陷入腐朽,社会下层却文明化程度低。历史虚无主义与下层社会群体的原始性和愚昧性结合,必然形成巨大的破坏文明的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了,大跃进和文革早已成为历史。三十多年来,中国一步步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积极向世界先进文明学习,从而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学术思想领域也取得了重要的进步。随着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逐步弱化,它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和编造的各种伪历史也得到一定纠正。一些学者从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立场出发,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些重大课题,如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清末改革、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大跃进、文革等历史事件以及诸多历史人物,都做了不少新的研究,涌现出很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还原了历史真相。这对于恢复中国人的知识理性、客观全面地认识历史起到积极作用,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支持和决策参考。

但也应该看到,目前我们对教条主义思想影响的清理任务还远未完成。教条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不顾事实,不容许科学探讨。只要它存在,它就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在新的形势下,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会与各种既得利益结合,包括一些曾经得益于或者目前还依恋着苏联模式的经济群体和政治群体,也包括接受了它并依附于它的一些知识分子,同时,它作为一种精神鸦片,对部分社会下层和边缘化人口具有一定号召力。在这种局面下,清除工作必然会遭到思想抵制,甚至有人会打着“反历史虚无主义”的口号维护教条主义,这势必对全面深化改革造成种种思想阻力。

对于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我们必须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一个繁荣昌盛的文明中国不可能建立在由一堆虚假历史故事所构筑的思想土壤之上。■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社科人文 文学小说 党建管理 经济管理 书画摄影

正规出书 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一)社科人文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二)管理类书稿:党建管理、行政管理、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专著;(三)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四)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五)美术类:画册、书法作品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80-8368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

综合编辑部 收;邮编:100025

电话:010-57733086、57192229、57733087、57192223

传真:010-89506878;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文馨、顾娜、高晶、牛萍萍(编辑)

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bookhk.net>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历史虚无主义的实与虚

○ 郭世佑

一、“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一词从德文 Nihilismus 意译而来,源于拉丁文 nihil,意即“什么都没有”、“虚无”。据海德格尔考证,在哲学层面率先使用“虚无主义”一词的是雅可比,在 1799 年致函费希特之时,他所指斥的虚无主义原本就是唯心主义,同后来的涵义迥异。至于“虚无主义”一词的流行,是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主要是通过屠格涅夫于 1862 年发表的小说代表作《父与子》,该书在当时引起激烈争论的程度并不亚于德国的哲学家尼采的遗稿被发现所引发的激烈争论。

后来,人们把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欧洲出现的否定历史传承与道德规范的社会与文化思潮称作虚无主义,关涉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前景的焦虑与自救。

若从现代化的视角观之,与英、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德两国的资本主义起步较晚,虚无主义思潮最盛,俄国主要集中在文学界,德国则主要集中在哲学界,个中现象,耐人寻味。

关于“历史虚无主义”(historical nihilism),相对来说,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更为热心。去年刚谢世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兼教材作者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Hill)从维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立场出发,把试图否定 17 世纪英国革命历史作用的论点叫做“历史虚无主义”。当有人将英国革命之后的局势贬斥为“一个该死的事件跟着另一个”时,作者在《清教主义,资本主义与科学革命》一书中说:“我们并不难从‘让我们不要过度简化’滑向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合理化或是心照不宣的假定,历史虚无主义现今很流行,是有显而易见的社会学原因的。”包括苏联与中国在内,也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常常把某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潮,

以及否定马克思等人肯定过的历史上的革命等论点称做“历史虚无主义”。平心而论,许多一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的确存在问题,但如果从学理与概念来说,有人否定马克思主义所认可的历史因素是否就等同于否定历史的那种虚无主义,可能还略有推敲的余地。概念的转换不是不可以,但也需要进行类型上的区分。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社会变革的强力推进与传统文化的冲击,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对原有价值观念的重构,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落后国家的社会面相与价值体系的重组,近代中国也是如此。不过,对一个拥有数千年独立文明系统的国族来说,无论是社会的转型,还是价值体系的重组,都是很缓慢也很复杂的事情,技艺与器物上的变化,未必可以带来价值观念与文化的同步更新和全体一致,社会转型中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好与坏”、“进步与落后”之类绝对化的两分就能说明问题。

民国开新之后,盛况空前的思想解放与帝制覆灭的凯歌结伴而行,守旧势力的自卫在所难免。文化学术界固然也出现过尼采热,新文化运动中还出现过“打倒孔家店”(吴宓)、“废除汉字”(钱玄同)、“不读中国书”(鲁迅)等过激言论,不过,那时都有特定的语境与值得批评的对象,并非言说者深思熟虑之后的全面论述所得,并非就是欧洲式的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思潮来临。即使常为论者批判的胡适“全盘西化”论,胡适的本义也并非就是彻底否定中国历史与文化,他对此曾诚恳地做过说明。何况,胡适一代人的国学根底远非后辈可以望其项背,无论他们如何言辞过激,谁想指望他们数典忘祖,恐怕比指望曾国藩、李鸿章那一辈真去卖国一样难。及至在 1980 年代,虽然有人重新捡起前贤的某些言论,较之亿万人口的庞大群体,那也只是极少数的微弱之声,成不了气候,而且其中有的略含“恨铁不成



尼 采

钢”的苦心之论或愤激,也同绝对化的欧洲虚无主义不可同日而语。

相比之下,随着学术与网络之声的庞杂与多元,批评或声讨历史虚无主义的文本倒是时常出现。自1990年代初开始,迄于今日,还出现过两次批判高峰。第一次是1990年代初,主要针对客居美国的李泽厚、刘再复发表的兼顾现实与历史、思想与学术的对话“告别革命”而发动,以历史学领域的学者为主体;第二次是2013年,针对“宪政”的主张展开批判,以法学与政治学的学者为主体。由于当代中国的宪政问题并非今天才冒出来,从晚清到民国,再到1949年的凯歌新元,都不乏宪政的遗产,都与近代史有关,研究近代政治史与思想史的历史学者就常被邀入“宪政”话语的讨论。在两个批判高峰之间,还有一些零星的笔战。比如,2006年1月,袁伟时先生在《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引发报社整顿、“冰点”停刊,被称为“冰点事件”,还有此后不久,苏智良教授主编的沪版中学教材《历史》被迫换版事件。

中国学者对历史虚无主义概念的正面诠释与系统归纳还不多。我还没有找到来自批判对

象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自我叙述,只能从批判者的文本中感受二者。

有的文本说,历史虚无主义是用虚无主义历史观来分析和解释历史。在我看来,这样的阐释不啻同义的反复(tautology),属于我国学术界的通病,读者还无法知道,虚无主义历史观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观,还需要具体的说明。

有的学者说,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唯物史观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认为唯物史观是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已经过时,主张用历史选择论取代唯物史观。认为以往近代史研究的最基本的理论原则、体系框架等,都值得从新的角度去检讨和推敲;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社会形态学说、历史发展客观性理论等,主张用人性分析取代阶级分析,以树立一种超乎阶级性的新的评价标准;倡导历史研究应该‘价值中立’,要坚持‘超然的客观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承认西方社会发展道路为‘人间正道’,把现代化预定为‘西化’,以此为圭臬衡量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是与非……”这样的归纳就系统和具体多了,惜乎稍欠简练。

还有学者说得简短些:“什么叫历史虚无主义呢?一般来说就是指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对民族的文化采取轻蔑的、否定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说的一无是处,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另有学者补充说,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是对待历史的态度有问题。

把立场、态度或学风作为归纳与敲问批评对象的首要视角,堪称不同范式与学派之间互相质疑的常见招式。把对待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的不同态度及其论点都归入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克里斯托弗·希尔式的指认还存在推敲的余地,虽然我也不赞成那些顽固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某些基本结论之论,问题在于,马克思等人并没有穷尽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表述,如果马克思、恩格斯还健在,他们也会欢迎心平气和的学术探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历史本身,即使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并不等于就是否定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

有的作者把话说得惊心动魄,认为中国大陆的历史虚无主义“别有政治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潮”。有的文本也说出了相近的意

思：“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否定历史，达到其一定的政治目的，所以，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与自信，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国情教育、历史教育，才能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应该说，这样的指认已经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如果情况属实，需要提交司法程序，予以认真审定。

随手翻阅之后，可知还有一些文本指认以下论者为历史虚无主义者：

1. 对我国大陆当前的历史教科书与正统史观（即革命史观）提出质疑与直接批评的人；
2. 把西方列强入侵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力放在第一的人（包括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的人）；
3. 对“近现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意义”说出一个“不”字的人；
4. 质疑“本世纪中国历史、共和国史著作”遗漏了某些重要史实而自己列举的史实有误的人；
5. 说李鸿章、袁世凯“之流”有智慧，还爱国的人；
-

以上所列的某些论点固然还存在商讨的余地，但同货真价实的历史虚无主义关系不大，他们只是对实化的历史表达不同的解释与评判，没有把历史虚化，也不可能把历史虚化。再说，批判者所罗列的某些“历史虚无主义”之论，不仅够不上称作“历史虚无主义”，也未必完全荒谬，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还存在认真协商的空间，需要坐下来，有话好好说。比如，有的论者对当前的历史教科书与革命史观提出批评，究竟有没有针对性，这是需要批评者认真回答的问题，不要把话扯开。如果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编者自己每隔几年都在不断修改呢？又如，有的论者说李鸿章、袁世凯有智慧，也爱国，就需要批判者拿出李、袁如何笨拙、如何不爱国的论据来说话，只有在论据层面下功夫，才能驳倒对方。

二、问题的症结

如果从1990年代初算起，直到现在，学界对

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持续了20多年，窃以为，为期20多年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成效之所以不大，其主要根源有二：一是批判对象是虚的，并不存在批判者所指认的历史虚无主义，实有张冠李戴之嫌；二是把政治与学术一锅煮。

第一，批判对象未必存在。

胡适当年讲过一则至今不无针对性的真实故事：美国《展望周报》总编辑阿博特在自传的第一篇，就介绍乃父说过的一句话，“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我想补充的是，如果都能紧紧围绕名词本身好好争论一番，再争别的，那也是不错的，问题在于，有的连名词争论的机会都没有，还没搞清楚这个名词的本义或内涵究竟是什么，就开始批判别人，先发制人，这就更糟。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攻势大概属于这一类。

目前，我们只能从批判者的文本中去想象和建构我国历史虚无主义的面目。棘手的是，从以上批评者的指斥中，在诸多批评或笔伐的对象中，也没有几个真正属于绝对化的虚无主义者，他们毕竟还不是货真价实的否定一切者，至少我自己和我所熟悉的许多前辈师长与同辈师友都不是。大致所来，被批判者所要否定的顶多只是有关批评者所服膺、复述、坚守甚至捍卫的革命史观与相关定论，有的甚至还谈不上否定，只是试图质疑和纠偏，未必就是对包括革命史观在内的研究范式与前辈成果的彻底否定，更不是对近代中国历史与民族文化之存在的彻底否定，他们都不是瞎子。

在虚无主义的发源之地欧洲，虽然虚无主义的内涵与腾升出现过几次时空变换，但其所指均有其实在的内容与对象，中国学术界的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却未必存在，至少在今天是如此，还不足以形成气候，不会危及对民族历史的尊重与民族文化的赓续，不必惊慌。也就是说，尼采虚无主义文本与欧洲一般的虚无主义都是实的，中国的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却是虚的。至于个别学者的过激言论，即使在其他学科与其他国家，也是存在的，不必把他们看得很重要。如果把并不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拿到学术论坛示众，当作批判的对象，当心自己会落入学术虚无主义的泥坑。

海德格尔发现,尼采揭露了欧洲虚无主义的源头与本质,以毒攻毒,很深刻。比如,尼采说,欧洲虚无主义者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虚无主义,反而自认为立足于坚实的存在论(本体论)基础之上,感觉良好,从来没有思考过存在本身的问题,只考虑存在者本身的问题,这样理解存在者,就是无根的。恕我直言,在中国,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不少论者也存在类似的错觉与失误。他们只抓存在者,即他们不愿接受的批判对象,却不认真抓住存在本身,即批判对象的论点论据同历史虚无主义之间的真实关系,这就无异于无的放矢。

若就历史的存在而言,问题就更多。批判者一般不去认真考虑他们自己对近代史的概述是否完美无缺?可不可以互相切磋?毛泽东构建的革命史观是否真的完整和科学?如果缺陷真的存在,那么,要不要修补或克服?应不应该允许别人去修补和克服?只把别的研究者与叙述者当作接受者,只注意接受者的态度问题,恐怕就不是正常的学术态度了。

如果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清理尼采的批判武器,还可以发现,尼采仅仅把存在理解成了价值,由强力意志本身来设定价值,存在本身就丧失了其本质的尊严。存在沦为一种价值,撇开了价值的来源,存在没有得以成为存在,最终还是陷入虚无主义。也就是说,尼采并没有重建存在本身,因而在存在论上仍然是虚无主义者。在我们国家,某些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很像尼采式的虚无主义者,在存在论与价值论上滑向虚无主义,因为他们一般不从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功夫,只是否定其他所有的史观/价值,确立和维护自己的史观/价值,当做唯一的存在。他们虽然貌似尼采的那种强力意志,但这种强力并非来自批判者自身,而是来自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的举国宣传体制的支撑。

对那些热衷于投入没有对手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战的作者(包括参与意识形态管理的论者)来说,正是因为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就是虚无主义者,他们常常围绕假问题而战,借题发挥,演绎和曲解对方的论点,不从论据的破与立两个方面下功夫,以为他们的所有立论都是建立在坚不可摧的存在论或本体论的基础上,他们掌握的历史资料

最全面,最了解国情,常常得出一些自相矛盾的结论,使人无所适从,啼笑皆非。例如,一边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普遍意义的真理,一边反对普世价值;一边讲法治,也谈宪法,一边把宪政当做敏感词,连报刊杂志与出版社都不许出现“宪政”一词;一边讴歌历代下层民众的暴力反抗,一边鼓励强行拆迁民地民宅,抓堵任何上访的下层民众;一边强调人民的素质不高,不能推行民主制,一边说中国人民已经很民主,人权状况良好……如果好学多思的毛泽东在世,我想他会向宣传主管部门发脾气的。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连邓小平都多次承认,他和他的同志们还没有搞清楚,既然连他都没有搞清楚(详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116、137页),却要考我们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还有不少像上述有的批判者一样,指责别人“反社会主义”。

第二,政治与学术一锅煮。

在我们国家,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处理好,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很难到位。学术无疑应当为社会与国家服务,这没有问题,关键是如何服务,并非只有让学术研究为现行政策做注释才是服务。常见的情况是,社会上出现什么令秩序管理者头疼和不安的言论或思潮,就从学界寻根;学界出现什么不适的言论或奇谈怪论,就往政治上靠,上纲上线。

1997年出版的《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一书曾对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第一波声浪有比较集中的汇集。该书以批判文章为主体,书末设有附录,分“正”、“反”两面,摘编所谓两个阵营的论点,其中对“反”面的作者不列姓名,只列篇名与期数,或列书名与页码,也许隐含编者对批评对象的爱护之意,但褒贬之意甚明,依然有失作者平等与学术中立。

把学术问题上的某些争论放在“走什么路”的标题下,区分正误,仲裁是非,这本身就有文革遗风之嫌,应予摈弃。学术的问题,完全可以放在学术的平台来讨论。如果真的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潮”,那就不是学术问题,不必占用学术的篇幅来发表不同意见,毕竟泱泱大国,章法俱在,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诉诸法律。当然,对于不同的声音(即便不是学术之声),姑且不说是否应当尽量按照现行宪法白纸黑字



海德格尔

写着的第三十五条等条款,去审慎地执行,至少先要认准,不要继续制造冤假错案,若干年后,再用一纸平反书匆匆了结,以言定罪的时代应该已经结束了。

从反右到文革,从清除“精神污染”与“反对自由化”,历次政治运动把政治与学术一锅煮,造成学术领域与学者伤痕累累,而且风气败坏,许多往事历历在目,如果流风不止,还要继续这一套,多数学者是不以为然的。意识形态的管理者应当培育对学术的敬重之心,学者则应当以守候学术的宁静为主。历史研究者既要关心时事政治,又要适当与时事政治和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为权力所左右,尽可能摈弃杨度的“帝师”之念。杨度虽然满腹才情,却经常攀附权力,东撞西碰,不得要领,才情浩气付东流,可谓教训。如果认为杨度离我们的时空距离已经遥远,那么,“梁效”、“罗思鼎”的故事如在眼前,殷鉴不远矣。我们是职业性的近代史研究者,我们的著述总不能像油画《开国大典》一样,不断地改来改去吧。

三、善意的建议

前人读书,不读三代以下,应该已经成为过去,但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至少存在三个

难处:

第一,与资料太少的古代史相比,近代史的资料太多,而且十分庞杂。就研究而言,资料太少和太多都不是好事,资料太少,就难以研究,资料太多,也挺麻烦,不仅要分清真伪,还要分清主次,都很费时,只有多看,多比较;但人生苦短,只能战战兢兢,能看多少算多少。

第二,近代历史的复杂性超过以往了任何朝代,不可小视。谁要是以为只有他的研究成果才是全面、客观、公正的,别人的成果就是不全面、不客观,不公正,甚至就是胡说八道,别有用心,这样的心态是很冒险的。4年前我说:仅仅就研究对象而言,我们还不能低估近代中国政治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与研究难度。近年来,在我国史学界,已有不少学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领域已经过时了,快要无话可说了,这样的认识其实有些幼稚的。至今为止,除了片面的阶级分析与“一分为二”的派性分析之外,究竟有多少学者能从政治学、法学的学术视野与方法入手,从浩如烟海的中外档案资料中深入研究错综复杂的近代中国政治史,恐怕还是问题。还有,中外档案资料与外文报刊资料的多边运用就是好事多磨,要坐冷板凳,更不用说多种外语的解读能力如何提升。在我们这一辈中,能够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的学者其实都是屈指可数,能够掌握两门以上外语同时又具备坚实的历史学科训练的学者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我们只有期待未来。至于研究对象政治阅历的丰富、政治经验的娴熟与书生谈兵之间的矛盾,历史场景的多变与复杂性,汗牛充栋的历史资料的主次、真假的清理与判断,人脉清理的难度,都是特别棘手而又无法绕过的要塞。谁说近代政治史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已经差不多了?也许只有无知者无畏。(郭世佑:《创新的魅力——在山东大学义和团110周年国际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致辞》,原载《义和团研究通讯》总第46期)

第三,给前代修史,政治因素与利益的干扰很大,自古皆然,求实求真,谈何容易,总得有几个秉笔直书的书呆子去坚守。台湾历史学家杜维运先生说:“历史变动最剧烈的时代,每在朝代更易之际,历史的真相,也最易在此时失去。史学家此时以政治上的因素,往往不敢秉笔直书,

旧朝殉国的烈士,守节的遗民,赴汤蹈火,呼天抢地,其忠义之迹,史学家固不敢为之留传;即旧朝完善的制度,优美的传统,也每被诬蔑或曲解。”杜先生的见解,无论对于我们研究晚清史,还是民国史,都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就拿抗日战争史来说,我们的老百姓也好,大学生也好,除了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流砥柱以外,还有多少知道戴安澜将军、孙立人将军是怎么抗日的?全国人民都知道白求恩,却很少知道以色列举国感恩、犹太人全球敬仰的何凤山。别说晚清史和民国史,即便是我们如此重视的中共历史,也不应该存在许多盲点。

历史乃现实的凝固,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的著述与现实的创造一样,惟有矢志求真,追求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劳作,珍惜文字的表达,少写一些连自己都不愿再看的东西,才不会浪费有限的生命与国力,赓续一族一国之元气。历史既不是胜利者的战利品,也不是胜利者的宣传品。鉴于近代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研究难度俱在,如何从前人的高昂付出中,找出近代历史的真经验与真教训,不卑不亢地走向世界,还是当务之急。学术观点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一样,并非只有正确与谬误或好与坏之分。在正确与谬误或好与坏的两极之间,还有一片宽阔的空间。摆在同行面前的,无论是我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还是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只要不是信口开河和别有用心,人人都有解释权,并非只有部分人的解释动机与效果才是爱国的。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作为历史客体存在的研究对象而言,还是就作为历史学主体存在的研究者而论,还找不出几个货真价实的卖国者,李鸿章也罢,袁世凯也罢,都是如此,爱国问题也是一个伪问题,同没话找话差不多。国家乃人人有份的国家,关键不是爱不爱,而是如何爱,亦即如何改造我们的国家。近代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

为此,围绕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谨向意识形态的管理者、学术研究的管理者与批判活动的参与者奉献三点浅见,敬请赐教:

第一,体制要变革,迫在眉睫。意识形态的管理与教育体制也是如此。窃以为,我国之所以经常发起没有敌人的战争,就是担心某些社会思潮影响学生,甚至还被说成“毒害”学生,我们都

是从学生长大的,请勿低估了学生,特别是信息革命时代的当代学生。与近代史知识有关的问题究竟出在哪?我看首先出在我们的教育理念与教育体制,把本应改变的中学培养模式延续到大学,不是培养学生的怀疑习惯与批判精神,向未知世界挑战,为创新能力磨刀,而是把大学的近代史课程当做政治课,继续搞统一教材,统一标准,引导学生继续充当考试机器,背诵标准答案,试图培养一些只知道标准答案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固化他们的阅读与思考,还把立项垄断与权力腐败的教材流程引向近代史课程教育,这样的教育效率究竟如何,是该认真总结的时候了。应当遵循教育规律,把历史课程回归国民教育系列,从幼儿园和小学开始抓起。大学的教育改革不仅要改变课程的内容,还要重新审视课程的设置,适当减少大学的政治课程,请给学生留一点自学的时间,让他们自己去找书架,读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翻翻孔子、孟子、柏拉图、康德等人的书,不要把大学的近代史课程开成各级党校的近代史课程,把大学变成党校。

第二,心态要调整,尤为关键。在学术的问题上,养成兼听的习惯,在学术研究领域,既不需要征服者,也不需要战士,有话好好说,不要生气,不要轻易把“主义”搬出来,现在毕竟已经远离文革,在历史研究的层面上,资料比主义更重要。仗着主义来批评人,那同仗势欺人没有什么区别。应当尽量摈弃极性思维,摈弃绝对肯定一切,与绝对否定一切的战争思维。既然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要摈弃孔子所批评过的“朋党意识”,不要在学术的问题上还搞党同伐异,关注研究选题与学术观点的互补性比关注对立性更重要。

第三、论据要充足,要在论据上下功夫。就学术研究而言,事实评判比价值评判更重要,论据比论点更重要。只认论点,不管论据的人,是不讲道理的人。■

2014年4月15日匆草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作者为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 黄 钟)

保健护士谈江青(续)

○ 周淑英 赵柳恩 口述 阎长贵 李宇锋 整理

江青的医疗保健

李宇锋(以下简称李):江青对日常生活要求如此苛刻,据你们观察,她的身体状况究竟怎样?比如她经常需要吃药么?

周淑英、赵柳恩(以下简称周、赵):从江青病历及观察她身体状况,我们认为她确实有病。五十年代一些疾病和特殊的治疗造成她从中年就进入内分泌严重失调。一般中老年妇女内分泌紊乱是渐进的,还会有出汗、心慌、失眠、情绪波动等症状,而江青突然进入这个状态,对精神和身体打击很大。她曾说过当时眩晕使她感到天旋地转,自己不能起床;经常出大汗使她十分怕风;而失眠使她多年来必须借助安眠药入睡,对声音也格外敏感。这些我们都能理解。经过十多年来多位医护、服务人员的有效的治疗和精心照顾,到我们为她服务时,她身体状况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周:我接手保健工作时江青53岁,那时她没有出现过眩晕等症状,饮食、日常活动都很好。她对感兴趣的事如骑马、摄影、玩桥牌、逛公园等,几小时都能坚持。可是她并没有动手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如穿衣服系扣子等。延续下来的护理方法仍旧照做,一些苛刻要求也丝毫不变,对她的这些作为我是想不通的——这哪像共产党员啊!

赵、周:江青曾诬陷我们给她吃的药是毒药,为此大闹政治局。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强调,她吃的药不是我们护士定的,是由一个医疗专家组研究商定的。我们接触过参与江青医疗保健的专家有吴阶平、卞志强、吴洁、曾诚富、黄宛、洪民、曹家信、孙震寰、高辉远等。305医院院长,曾经做过毛主席保健医生的徐涛,后来也在江青

这儿工作过。

江青用药的种类和剂量,是由吴阶平召集国内著名医学专家反复商讨制定的。根据江青的身体状况、睡觉情况,制定的处方既科学,又安全,能诱导她安然入睡。对药物疗效和副作用都充分考虑到了,以达到较好的效果。会诊后制定了用药处方,之后吴阶平将专家组讨论的方案报告江青,她看后表示同意。每日镇静和安眠药总剂量是严格控制在安全范围内,绝不会超剂量。

赵:江青的药大致分三类,一是保健类,包括西洋参、复合维生素等;二是助消化的多酶片等;三是镇静、安眠药。取药是到政治局委员专供药房,不到这个级别的领导,必须要中央特批才能到这个药房取药。工作人员不允许用这个药房的药。每次取药必须要两人同去;药量严格按大夫的协定处方。药瓶火漆封口,火漆上还盖着专用章。而且取回的药量大致限制在什么时间段内用完。这些都是保证用药安全的一套措施。虽然江青镇静、安眠药吃的次数多,但每次的量并不大。有些是将药片研成粉末按不同剂量装在胶囊里。这是医生们和药房针对江青的身体状况制定的用药方式,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周:吴阶平是我在江青处接触最多并给我们指导关爱最多的医生。吴大夫医德高尚、知识渊博、待人谦和,善于与不同的人沟通相处,组织协调能力强。毛主席、周总理晚年医疗抢救组都是由吴大夫负责牵头组织的,直到两位老人离世。从1968年开始,江青医疗方面的事就找吴大夫。吴大夫讲话深入浅出,语气平缓,江青见他不紧张,外出到海南岛、上海都请他同去。有吴大夫在,我们就有了主心骨,当江青在医疗上刁难人时,他的承担和解释往往起到化险为夷的作用。

大家与吴老的关系非常融洽,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趣事。那次去上海,吴老想买一块上海



江青拍摄的毛泽东照片

牌手表。交了饭费后没剩多少钱,吴老只好借钱,我们把口袋里的钱包括硬币都凑给了他。回到北京,吴老拿出他的记账单,逐个还给大家,连硬币都分文不差。那时候,大家不管在京还是出差都按制度办事,按规定交纳伙食费,连著名的医学专家吴阶平也不例外。

1999年3月我们到吴老家看望他。提起过去那段工作经历,吴老用了八个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还提到在毛主席生病期间,医疗组日夜守候尽职尽责。江青不但不感谢医务人员,反而威胁说“苏联有个‘白衣党’(指为苏联领导人医疗保健的医护人员)专门害人,我看主席身边就有白衣党,有特务集团”。医护人员人人自危,毛主席得知这件事后当着总理和其他人的面对江青说:“如果说我身边有白衣党、有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这才使江青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些。

为高级领导人治病的医生,本来都是精中选精、优中选优的权威。而为江青请来会诊和专科治疗的专家,不知原来是否了解江青的脾气秉性,见面后江青多疑审视的目光、尖刻的言语和苛刻的要求却常常使他们望而生畏。

举几个例子:

有次会诊,北京医院内科吴主任由于紧张,双腿抖得不停,直往人后挪。

还有一次,301医院曾诚富主任要为江青听诊,江青怕掀被子受凉,又怕听诊器凉,使曾主任

无法听诊心肺,只好回医院取来一个有扩音装置的听诊器,小心翼翼地隔着被子听诊。

有一个时期,301医院口腔科洪民、曹家信两位专家为江青治疗牙周炎,搬来口腔科专用椅和器械,治疗效果很好。江青有一颗牙已松动,她本来同意拔牙,但又说大夫“太紧张了”她不放心,就请周总理和康生与大夫面谈以了解情况。总理听了汇报治疗方案后安慰大夫说:“不要紧张嘛。”后来江青的病牙被顺利拔出。两位专家为了给江青治牙病,在钓鱼台住了近两个月,江青非但不感谢,反而讥讽说:“你们牙科大夫只能看那二三十颗牙,连咽喉病都不会看,算什么本事?我看要革你们的命!”后来还诬陷两位口腔科专家给她吃了毒药。

睡眠是江青生活中的老大难问题,请来中医老专家孙震寰为江青调理。孙老诊脉后开出药方,药煮好后,她只尝了一口便连呼“太苦,不能喝!”孙大夫想用针灸改善她睡眠,江青干脆拒绝了。孙老只好提出用按摩和指压穴位法治疗,江青同意了,还让护士跟着学。江青的几番折腾使孙老越加紧张,头上脸上都滴汗,呼吸都不均匀了。治疗了一段,江青提出护士也学得差不多了,大夫可以不来了,孙老如获大赦赶紧走了。

这些国内、军内著名的医学专家多年为首长看病、治疗,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为江青看病却艰难棘手,正如曹家信主任说的:为江青治牙,其艰巨性、危险性是从未想象过的。

赵:有一位化验员曾多次为江青采血,每次来她都会紧张得手抖。有次采血前她手抖得厉害,我怕江青发现,连忙在她前边挡住江青的视线,让她顺利完成采血。因为江青如果发现她紧张会起疑心:为什么见我这么紧张?心中一定有鬼!

周:从这几位的经历,你就可以想象我们每天都在她身边工作,会是一种什么心境。随便举个令我们工作中为难的例子:在开会时为她送药。因为担心沾上涉密嫌疑,我们尽量不进入会场。但是江青对吃药特别警觉,她的药必须是我们亲自送,别人送她是不吃的。所以怎么既避嫌,又保证她按时吃药,是很伤脑筋的。相比之下,周总理在这方面就坦然得多。有次,总理的医生让我给江青送药时把总理的药也带进去。我把小药瓶儿递给总理,告诉他大夫说您该吃药

了,总理接过药瓶,把药倒在手里,一口水就将药送下去了。周总理对工作人员的信任,使我我心里感到温暖。

赵:有一次江青在福建厅开会,那天可能她在政治局里面闹得不愉快了,一下子生气了。服务员跑出来对我说:“你赶快进去,江青同志在里面发火了,她说你没给她吃药!”我赶紧进去。当时纪登奎坐在她旁边,我说“江青同志你有什么事?”她怒视着我:“我的药到时候你为什么没给我吃?”我说“刚吃完啊”。“什么时候给我吃完的?”我就说“你跟这位首长(指纪登奎)谈话的时候我给你吃的”。那时候总理和政治局其他人都在,都瞪着眼睛看着这边。江青自己觉得没趣,就说“那你为什么不主动进来给我换衣服?我出了一身汗了!”我赶紧说,“那现在给你换吧?”我们那时候谁敢跟她顶啊?实事求是地说谁也不敢跟她顶嘴。我们就去卫生间换衣服,换衣服的时候她说“这些事情你应该主动地进来”。我心里想你开政治局会议我敢主动进来吗?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

护士的行头

李:她这些衣服你们还都随身带着?

赵:是啊。开一下午会,她得换好几次,换下来的来不及洗,我们就马上给熨干(到哪儿人家都得给我们准备电熨斗),不再换就没有干的了,回去以后才能洗,也是我们的事。我们每次出门都得拿什么?衣服包、水箱、氧气箱。装衣服的是一个大包,除了几身内衣还有薄的丝绵的棉衣、小毛巾、她吃的药、酒精棉球等。

随车还得给提着水箱,里面放两个小保温壶,一壶是凉白开水,一壶是开水,还有两个杯子,一个杯子里面搁有茶叶,准备随时她要水喝都可以给她。到哪儿去,不管在车上,电梯里,走廊,她说喝水马上就要喝。

一次去大会堂开会,刚进了大会堂,江青突然说“我要喝水!”小周说“那我赶紧回车里给您拿吧。”江青说“不行,来不及啦!”小周说“要不您到厅里喝?”“我渴啦,不行!”小周忙跑到楼下拿水,双手递给她,江青嫌晚了,火冒三丈,啪,连杯带水扔到小周身上!

周:在场的大会堂服务员和警卫人员都很惊愕。江青进入会议厅后,他们过来安慰我,我强忍泪水一句话都没说。就差几分钟她就等不得了!她经常为一件小事大发雷霆。

江青做过心电图,心脏没有问题。而那时期周总理由于过度劳累,有时心脏供血不好,医护人员就带氧气箱备用。她一看总理有氧气箱,就说“我也得准备”。于是叶群帮她从西郊机场弄了小氧气箱随身带,定期到机场换气。从此行头中又增加了氧气箱。

赵:后来还在卧室外放置了大氧气瓶,连接一条长管子,定时向卧室送氧。

除了小周说的那几样,还有一个鞋箱子呐。提篮式的,放个五六双鞋吧,到什么时候情况之下她该穿什么鞋,立刻可以拿。这些东西护士都得给准备好了,要不然到时候她要,没有,就得发火。那年去广州会见维特克时天很热,她一定要随身带着乔其纱的连衣裙。可是随身带就会叠得全是褶,所以就挂在车上。江青不满意:“我身上随时都出汗,还不给我换连衣裙?”骂了一通。结果那次另一位护士治了她——好吧,你不是要我随时拿着、随时给你换么?她手里就举着那挂在衣架上的连衣裙。你走哪儿,我就这么举着,最后江青自己回头看见了说“是不好看啊,怪不得你们不愿意。算了,还是放回车里吧,我换时随时拿来就行。”那是啊,你说那样雅观吗?其实那个护士是故意的,举得特别高,就是让大家都看着。

服饰与发型——“女人江青”

李:说到鞋和衣服,我想咱们谈谈另一个话题,“女人江青”。我想,江青无论怎么政治化,怎么强势,到底应该有女性化的一面,就是所谓的“婆婆妈妈”,比如她的服装、发型、化妆品、首饰等等,请您二位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赵:刚才说过,她从来不化妆,也没有化妆品。她不喜欢首饰。曾说过:不喜欢那些珠光宝气的东西。在她的房间和手里面我们没见过一件首饰。她只有两块瑞士进口手表和一块怀表。

外国元首送给主席的或是送给她的东西,都统统上缴礼品库了。服装方面,常穿的有十几套

吧。两三套西装，几套中山装和军装。夏天穿的衣服就有几件乔其纱的短袖衣服。有两件棉睡袍和几件棉睡衣，大部分是在苏联治病时做的，都旧了。大衣有三四件。有一套灰派力司中山装是用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穿过的衣服改制的。江青说“主席总也不穿，给我拿去改吧”。还有几件连衣裙（当时叫布拉吉）。她一般就穿纯棉的，化纤的、尼龙的一概不穿。

周：她的西装是灰颜色华达呢的。棉睡衣一套绿的薄一点，黑的厚一点。一件小薄呢子灰大衣，办公的时候经常披一披。因为她怕风，叶群给她做了件军绿色带帽子的毛凡尔丁小大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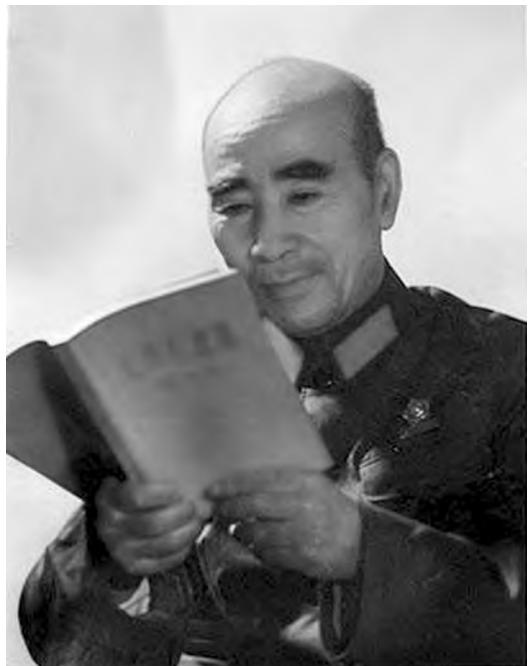
赵：常穿的鞋子也有十几双，许多旧的老式皮鞋都不能穿了，放在中南海库房里。江青穿三十五码的鞋，她穿鞋有个特点，因为她有个脚趾畸形，所以绝对不穿前面露脚趾的鞋。有一年，我穿了一双东北出的带两条杠的凉鞋，胶底白帆布面的。她一看，“哟，你这双凉鞋看着挺舒服，我试试”。她试了一下，就让鞋厂定做两双。前面要封口的白帆布鞋。

周：我也遇到同样的事。我买了一双塑料凉鞋，她看了合意就试穿了一下，然后就拿这鞋到鞋厂，照样做了一双黑色的皮凉鞋，夏天一直穿。江青的脚是“解放脚”。她跟我说过，“我就是有反抗精神，给我裹了脚以后我就放开，再裹还放”。但是对走路还是有些影响，不那么平稳有力。

有次我穿双塑料拖鞋，她看了：“哎呀，你这鞋好，我这鞋太大了，咱俩换吧”。她就和我把拖鞋换了。

由于地位的限制，她出门去商店不方便，因此见到的商品很少。1968年她曾去过一次王府井百货大楼，受到不少群众围观，只好匆忙离开商店。这也使她在选择着装时经常参照周围人的衣着。

赵：有一段时间，她说“出门也不能穿得这么死板，也穿点花衣服嘛”。这样就买了一些素色小花和小格子布，要我们陪着她一块儿穿，“你们做两件衬衫吧”。那时候我们穿的都是军装，谁也不穿便衣。她穿花衣服出去，我们只好穿在里面，外面穿军装。后来又要我们陪她穿裙子，我就穿条黑裙子陪她，因为她要穿你就得陪着她穿。



江青拍摄的林彪照片

李：她那衣服有打补丁的吗？

赵：睡衣有补丁，毛裤也很旧。她的外衣有几件破了拿去织补以后，外表看不出来。她几十年前穿过的衣服都盛在那几个旧皮箱里，这些旧衣服每件都有账。常穿的衣服，连两米宽的壁柜都没挂满。丝绵被和几条毛巾被也是旧的用了很多年了。毛巾她喜欢用最旧的，旧的软，吸汗，用着舒服。用的量很大，一摞一摞的。

周：她让把主席用过的旧毛巾都拿过来。出汗多时来不及换衣服，就用小毛巾垫在前胸、后背处暂时吸汗。

李：她穿的衣服有没有什么美国、法国、意大利生产的？

赵：她没有外国名牌服装，她的衣服多在总后服装研究所或红都服装店做。

周：我记得秋裤是到北京市针织总厂定做的，有长有短，就是随着天气变化而定。我在那时她穿的都是黑色棉纱袜，袜子有长短两种。我们把袜子和秋裤分别钉上按扣，扣上后袜子就不会滑下去，可防止腿部受凉。

李：她比较注意舒适，不讲究什么其他的，是吗？

赵：对，她特别讲究舒适。也很注重仪表，口袋里放一把小梳子，经常梳梳头。她说“我出去要大方得体”。

李：江青很多照片都戴帽子？

周：她出汗多，怕风吹后受凉，外出时都戴帽子。北京饭店的朱师傅给她理发。江青的发型其实也是有讲究的，有人说像男人发型，实际上是为了便于擦汗，后边头发只好推短。而鬓角头发留的较长可梳到耳后，还是保留了女式发型。“破四旧”以后，普通理发店烫头发的东西都没了，人们也不烫发了。江青要烫发，当时北京饭店还有给外宾用的烫发用品。朱师傅把东西都搬来，在17号楼给她做头。给头发烫出几个大波浪，擦汗后就不那么散乱了。朱师傅每次来都是小心翼翼的。有时江青说不行今天有汗，只好改天再来。朱师傅给她做完头以后，很怕她感冒。他说为江青做一次头，一个礼拜都不放心。

李：多长时间做这么一次啊？

赵：起码有半年左右。

看电影——江青每天必做的功课

李：我们都知道看电影是江青几乎每天必做的功课，请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情况。

赵：江青喜欢看《出水芙蓉》《简爱》《红菱艳》等电影。江青常说：“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坏了，睡不好，吃不香，我要休息，脑子转移一下了。”“转移”是她的口头禅，我们都明白这个词的含义。“转移”的主要方式是看电影、照相、听音乐、骑马，有时打桥牌。看电影是她每天最后一项活动。那时会议常开到深夜，散会后还要再看电影。

周：江青说：“我看电影是为了借鉴国外艺术，这是工作。”影片主要是从电影资料馆调来的馆藏国外三四十年代的老片和“过路片”（一些国外片子在国内停留一段时间，不购买再转走）。江青说三四十年代是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片子好看。当时和江青一同看电影的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有时请了康生他也不一定来。17号楼电影厅旁有个小休息厅，江、张、姚常在那休息。有次我给江青送药时，听到江青夸奖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好，说“文元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赵：有时她自己点片名，工作人员也帮助挑选。有些电影看后觉得可以放松，有利于睡眠，就会经常看。工作人员要熟悉这些片名，她随时会提出看哪部，如听不清或记错了，影响她情绪和休息就“犯大错误”了。两位放映员就更熟练

了，江青提出看哪部片子中的哪一段，他们都能立刻找到。

周：我记得江青常看的影片有：《乱世佳人》《恨海香魂》《农家女》《孤星血泪》《煤气灯下》《魂断蓝桥》《鸳梦重温》《瑞典女王》《茶花女》《深闺疑云》《红袖倾城》《蝴蝶梦》《巫山云》《翠堤春晓》《鹿苑长春》《风流女窃》《巴黎圣母院》《罗马假日》《百万英镑》《美人计》《鸾凤合鸣》《悲惨世界》《音乐之声》等。过路片有《女人比男人更凶残》《山本五十六》《虎！虎！虎！》《啊！海军》等。有时她指名看某位明星主演的片子，如：英格丽·褒曼、贾里·古柏、琼·方登、嘉宝、泰伦鲍华、费雯丽、派克、秀兰·邓波儿等。影片中人物对话少数已译成中文，多数为中文字幕，有些过路片是原文的还要请人现场翻译。

李：外边传说江青常看“黄色电影”，这些电影也算不上什么黄色。

赵：由于文化差异、国外片有些搂抱啊、亲吻、穿三点式的镜头，这些在当年是犯忌讳的。不同历史时期看法会不一样，但并不是什么“黄色电影”。

阎长贵：记得1967年夏天，工作人员给她选了部名叫《广岛之恋》的法国影片，事先也没看。片子开头就有男女裸体拥抱的镜头，江青火了：



江青骑马照

“怎么叫我看这样的片子？”她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不过这次她并没追究谁。我并不是说《广岛之恋》是黄色电影，到现在我也没看过这部电影，其故事和内容都不知道。

李：看来，江青对所谓“黄色的东西”并不感兴趣？

赵：她感兴趣的是三十年代的一些片子。她特别喜欢摄影水平高的、演员演技好、风景美、音乐好的影片。

周：看电影还惹出一场风波。1968年夏的一个晚上，她看了电影《格雷的画像》。内容梗概是：主人公格雷请一个会魔法的画家给他画了一幅像，画像中有他的灵魂，格雷因此会青春永驻。画家告诉他不能干坏事，否则画像会变丑，坏事做的越多脸就越丑。格雷做了许多坏事，画像渐渐变丑，而格雷面貌毫无改变。当格雷最后一次进入藏画的秘室时，发现画像如魔鬼般丑陋不堪。他在惊恐中拿刀扎向画像，随之本人也死了。深夜，江青看完这部电影，吃了几次安眠药都无法入睡。不断打铃，把护士、秘书、警卫全都叫到她卧室。我们进去后，看到她抱着头在床上痛苦地来回翻滚，疾言厉色地叫喊：“你们让我看了这么坏的电影！弄得我不能入睡，你们起到了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我被这种场面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我们都做了“深刻的检讨”。等她喊叫稍停，大家建议她再看几本《红菱艳》。看了《红菱艳》后，江青才安静下来。经过这次教训，以后再选电影大家越发小心谨慎了。江青对这部电影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大家始料不及的，也使我大惑不解。

李：这个故事可太有意思了！

赵：她反复看《冷酷的心》，十分欣赏影片的色彩和技术处理。她看电影有个习惯，比如说今天想睡个好觉，就挑片子中有轻松音乐的那段。

周：江青忌讳有蛇、蟒的画面。因此凡是遇到有蛇、蟒的画面，放映员事先要将这个画面遮挡一下，时间掌握得十分准确。看电影是江青一项重要活动，样板戏拍成电影后也在17号楼审样片。放映员技术堪称一流，从未出现过差错。17号楼的通风、温度也要和江青住处一致。放映员和服务员全天守候在岗位上，工作小心翼翼，十分辛苦。

李：说到电影，我们知道，江青是电影明星出

身，文革中，她对这段历史十分忌讳，甚至不惜动用各种手段销毁历史资料、迫害知情人。您对此有所了解么？

周：我经历过这么几件事。1968年春的一天，在11号楼二层，江青按铃叫我给她换衣服。进了她办公室，只见室内一片狼藉。桌面、沙发扶手、睡榻上到处都是照片、报纸等。我工作中信守的原则是对办公室的东西不看。她把睡榻上的东西挪了一下，坐在中间，我给她脱衣服擦汗。忽然她盯着我的眼，我请她抬胳膊擦一下腋窝，她却转身把照片翻过去，忙用衣服遮挡了。我收拾衣服时，看到掉在地上一张照片，能看得出是江青年轻时的照片，忙捡起放在睡榻上。她敏感多疑盯人的眼神，使我忙抱着湿衣服赶紧离开办公室。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江青进了二层一间门朝南窗向西的小房间，不许别人进。一会儿烧东西的烟味飘到楼道，越来越浓。过了很长时间，江青出来了，她头发散乱全身烟味，衣服被汗水湿透。事后打扫卫生的同志说西边窗户大开，大花盆里的纸灰都满了。

此后过了一段时间，有天晚上江青发话让11号楼全体人员，在第二天上午她起床前时组织学习。学习材料有两个，一是鲁迅的《论人言可畏》，二是三十年代蓝苹的一封公开信。大家学习后由于不知时代背景，没弄清事情的始末。江青得知我们一头雾水后，就说“我在三十年代的遭遇就像阮玲玉一样，被反动小报攻击，流言蜚语唾沫星子到处飞。人言可畏啊，阮玲玉了却人生。我要抗争，发表公开信回击他们，我是发着高烧和他们斗争的。现在有人还造谣中伤我，你们太无知了，不要上当！”

粉碎“四人帮”后，我才知道江青十分在意并不择手段掩盖三十年代她那段历史。文革初期江青伙同叶群派上海驻军战士，化装成红卫兵抄文艺界曾和她共事过的人的家，所抄到的有关江青三十年代的照片和书报，作为绝密材料送给了她本人。不仅如此，还关押了一些知情者。三十年代她房东家的保姆秦桂贞，曾在生活上关心、照顾她，就因为了解江青那一段历史被“请”到北京后关进秦城监狱。■

（责任编辑 黄 钟）

“李世农反党集团”冤案始末

○ 董忠义

195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采用异乎寻常的方式将“李世农反党集团”一案公之于世。一版头条刊登社论《对敌人必须专政到底——论安徽省委揭露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巨大胜利》,刊登通讯《肃清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从李世农反党集团手中夺回了专政职能的刀把子》;二版用整版刊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总结发言;三版用半版刊登《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议》。一时震惊全国。

其实,这是一条迟到的新闻。因为早在43天前,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已经开除李世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检察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锐(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的党籍,并将三人定性为“李世农反党集团”。

《人民日报》为何此时公布该案?这与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多次讲话有关。谈到党内的思想动态,毛泽东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反党集团,如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甘肃、青海八省区就有,他们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另一种情况像四川那样,有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毛泽东说:“许多人过去看不清楚,如李世农过去就未看出来。”

震惊全国的反党集团

1949年4月至1952年1月,曾希圣先后担任皖北区党委书记和安徽省委书记,李

世农任副书记,是曾希圣的主要助手。两人在工作中产生一些龃龉,逐渐引起曾希圣的不满。

1957年2月,曾希圣提出要在政法部门反右倾,主持全省政法工作的李世农对此持有不同意见。5月,全省政法会议召开,李世农在报告中指出,反右是必要的,但是有偏差。强调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政法部门要发挥互相配



195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社论《对敌人必须专政到底——论安徽省委揭露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巨大胜利》,刊登通讯《肃清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从李世农反党集团手中夺回了专政职能的刀把子》。



李世农



杨效椿



李锐

合、互相制约的作用,要依法办事。杨效椿、李锐与李世农持相同观点。

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开始。7月中旬,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研究部署反右派斗争。曾、李之间的分歧迅速升级,曾希圣认为李世农思想右倾,包庇政法系统中的大批右派分子。7月份以后,省委多次召开小型会议,要求李世农检讨所犯的“右倾错误”。

8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强调运动“一方面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根据中央的这个指示精神,安徽省委在全省展开更为积极的反右派斗争,对李世农等人的“右倾错误”进行更严厉的批判。

11月21日至24日,安徽省委召开一届四次全体会议,向与会的45人公布李世农的“右倾错误”,要求全体委员克服“温情主义错误”,进行面对面的批判。李世农、杨效椿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既为自己申辩,也为政法部门的干警主持公道。

杨效椿对曾希圣的这些做法有意见,11月22日分别给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组部长安子文写信反映情况和申诉。由于省公安厅在合肥、蚌埠等6个交通枢纽城市设立检拆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在安徽寄不出去,他派外甥董忠义到外省投递。没想到省公安厅早已对在职的李世农、杨效椿等人动用了技术侦察手段,掌握他们的一举一动。省公安厅派3人跟踪董忠义到南京,连人带信押回合肥。

12月15日,安徽省委召开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专门对李世农、杨效椿等人展开批判,以解决省委领导层内部的“右派”问题。会议伊始便充满了火药味,把李世农等人的“右倾错误”上升到“右派言行”。李世农、杨效椿对召开全委扩大会议推行强压政策的做法表示异议,并在会上多次向与会者解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认为全省政法部门执行的是中央的方针、政策,是在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不存在“右倾”思想,更没有“反党罪行”。

12月17日至1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曾希圣汇报说李世农坚持资产阶级的法制观点,早在肃反运动中就包庇和宽纵反革命分子,今年又反抗省委提出的在政法部门反右倾的斗争,并且组织右派分子在政法战线上向党猖狂进攻。毛泽东听后表态:“看来李世农是个坏人。”曾希圣拿到了打倒李世农的尚方宝剑。

由于前一阶段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目的,12月25日,安徽省委在报经中央同意后,决定延长会议时间,并将会议规模扩大为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各地(市)、县委书记及各级政法部门负责人,省直机关处以上干部,共1524人。此外,还有1834人列席会议。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口头发言261人,书面发言920人,张贴大字报6250张。省委办公楼贴满大字报后,又将大字报移至合肥市新落成的新华书店大厅内,组织各界人士参观。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会议出现一边倒的情况,一些发言者无限上纲,指责李世农等人“是长期隐藏在党内、进行反党活动的右派分子”、“是阶级异己分子”、“要新账老账一起算”,把安徽政法部门特别是检察机关说成是“解放以来就成了反革命、坏分子的庇护所”。李世农、杨效椿被剥夺了发言权和申诉权。

在批判斗争42天后,1958年1月27日,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决定开除李世农、杨

效椿、李锐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的一切职务,并建议有关方面撤销他们党外的一切职务。这是在反右派斗争中,继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被打为右派后,在全国挖出的又一个由省、厅级干部组成的“反党集团”。

同日,曾希圣在会议上作了《巨大的胜利,深刻的教训——关于李世农反党集团事件的总结发言》。他说:“这次会议的一个重大收获,就是挖出了李世农这个危害很大、隐藏很深的大右派分子……毫无疑问,这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次会议不仅挖出了李世农这个大右派分子,而且还挖出了他所结成的反党集团。现在已经查明,这个集团的几个主要成员均在政法部门……毫无疑问,这更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

曾希圣指出李世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罪行”:一、组织反党集团向党猖狂进攻。二、包庇和宽纵大批反革命分子。三、庇护自首叛变分子和坏分子。四、夸大灾情,否认合作化的成绩。五、反对生产改革,实行促退主义。六、篡改党的方针、政策。七、处心积虑,破坏党的团结。八、隐瞒错误,伪装朴素,欺骗组织,欺骗群众。

杨效椿被认定是“李世农反党集团的一员主将”,主要罪行是亲手宽纵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一百余名,错误地释放了大批被劳动教养的人,并且诬蔑1955年的肃反运动是“犯了扩大的错误”,包庇右派分子,甚至公然提拔已经暴露了的右派分子,反对统购统销,搜集农业合作化所谓偏差等。

李锐被认定是“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又一主将”,主要罪行是将不少反、坏分子引进国家机关,甚至对明显的右派分子加以提拔。常常借口“人民内部问题”、“犯罪未遂”、“后果不严重”等,拒绝批准逮捕和起诉,为大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开脱罪责,并亲手宽纵了三十多名罪犯。一贯抗拒省委决定,把省检察院变成独立王国,并竭力煽动检察干部反对党的领导和监督,阴谋改变国家检察机关的性质,甚至公然宣称检察机关是保护犯人的。



1958年1月5日,周恩来在合肥观看揭发批判李世农的大字报,左起:周恩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安徽省省长黄岩。

“李世农反党集团”一案株连伤害了一批干部,被直接株连的属中央管理的干部33人、省委管理的干部77人,政法系统、检察系统被批判、处分的3000余人中,大都也是被株连的。省检察院被划右派分子和坏分子21人,占总人数的27%,其中被判刑和劳教的8人、被监督生产的13人。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机关干部葛布奇一家15人,因此致死的就有9人,葛的爱人因生活困难,将两个孩子遗弃在合肥街头,三次改嫁,也未逃脱饿死的命运。地(市)检察院正、副检察长16人,被打成右派分子11人,另外还有1人斗争之后给予纪律处分,未被批判斗争的仅有4人。芜湖市副检察长周玉志和马鞍山市副检察长林钧源等在劳改中含恨离世。

在宁“左”勿右的思想指导下,全省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魏心一(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岳(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被打成“魏心一、戴岳反党集团”。全国共划右派552877人,安徽划右派分子31472人,占全国的5.7%。

苦不堪言的罹难岁月

右派分子如何定性,怎么处置?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就是所谓的‘地、富、反、坏’,现在要加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叫‘地、富、反、坏、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都是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右派现在反社会主义,我们就把他看作是敌人了。”

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点名批评“李世农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毛泽东认定李世农的问题是闹分裂,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李世农、杨效椿等人在劫难逃了。李世农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行政级别由7级降为12级,省委安排专人抄家之后,被赶出省委领导居住的小花园,搬到合肥市庐江路边的一栋小楼的底层,家里住着省公安厅的便衣干警,24小时面对面监督。李世农失去人身自由,继续接受审查。

李世农的夫人江音原任省人事局副局长,因受株连也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行政级别降3级,发配到合肥郊区的一个农场劳动改造。

1959年7月,李世农夫妇被发配到歙县商业局沙溪饲养场监督劳动。让他们愁肠百结的是孩子们怎么办?7个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只有2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把老五和老七交给老阿姨留在合肥抚养,夫妇俩带着5个孩子去了歙县。

歙县地处皖南山区,离合肥300多公里,与浙江省临安县交界。这个地点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既有利于监督劳动,又能切断李世农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李世农在这里度过了近三年与世隔绝、饥寒交迫的生活。夫妇俩承担饲养场最脏最累的工作,李世农养兔子,江音先养鸡后养猪。时隔不久,饲养场发生猪瘟,两人被诬蔑为放毒犯,受到残酷的批斗和体罚。

一年后,安徽发生亘古罕见的大饥荒,农村大量饿死人,李世农一家陷入困境。看着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李世农从此不吃早饭,以水充饥,把省下的口粮让给孩子们吃。夫妇俩在田头路边种南瓜度饥荒,才使一家老小逃过这场灾难。

李世农的老战友,江苏省委常务副书记刘顺元一直牵挂着李世农的安危。1960年9月,他冒着很大的风险约李世农到安徽滁县见面,一看到骨瘦如柴的李世农,刘顺元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他决心要替李世农申冤。

刘顺元回到南京后马上约中监委副书记钱瑛来宁,详细介绍了李世农冤案的来龙去脉,请钱瑛向中央报告真实情况。钱瑛在党内有“女包公”之称,回到北京后如实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李世农苦熬四年之后,于1961年12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分配到寿西湖农场任副场长。

杨效椿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行政级别由9级降为每月借支100元生活费。省委安排专人抄家之后,被赶出省委大院,搬到合肥市仁爱巷2号,家里住着省公安厅的便衣干警,24小时面对面监督。

杨效椿的岳父周仲衡因受株连,195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先关押在合肥,后转到芜湖看守所,两年后在狱中去世。1958年夏,安徽省委派人到杨效椿的家乡山西省万荣县外调,在村里召开群众大会,批判杨效椿的反党罪行。杨效椿的外甥董忠义因替其寄信,中专招生时政审不合格,只好报考一个不需要政审的农业技校,造成终身遗憾。

1958年5月,杨效椿被发配到宣城县周王农场监督劳动,他把12岁的大女儿留在合肥读书,把2岁的小女儿送回山西老家,带着两个小儿子到宣城县。

周王农场是省委财贸部下属的农业生产基地,大部分职工都是省直机关在几次运动中被审查的对象或内控人员。杨效椿最初分配在农场的副业队养兔房,一个人要喂养几百只兔子,精饲料不够,要漫山遍野去割青草和山芋藤,杨效椿承受着精神和体力的双重折磨。副业队女头头经常板起面孔,用对待阶级敌人的口吻大声训斥。

“大跃进”进入高潮后,一部分职工陆续调回原单位,农场撤销了几个边远分场,把人员集中到南长山分场。分场场长爱喝酒和贪占小便宜,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把专政对象看成是十恶不赦的罪人,稍不如意即大声训斥和处罚。

分场认识杨效椿的人很多,为避免不必要的

麻烦,每逢召开全场职工大会时,他总是独来独往,提着小板凳,低垂着头,回避与熟人打招呼,坐在后排不显眼的角落,跟着大伙举起拳头喊口号。

一年后,农场开始闹粮荒,一家人忍受着饥饿的折磨。浮肿病在农场蔓延,杨效椿患上浮肿病和肝炎,腿上一按一个坑,瘦得不到90斤,整日卧床不起,眼看命在旦夕。在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等人的关心下,允许回到合肥治病。

病情稍有好转,杨效椿被分配到安徽大学图书馆,先是被罚打扫卫生,后到出纳组工作。由大学保卫科负责监督劳动,要定期汇报思想,指定专人收集他的言行。图书馆大多数人善良友好,个别人百般挑剔,当众直呼老右派,常常是他已将工作场地打扫干净,却非要责令他重新再扫一遍。

1960年9月,第一次全国改造右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要求加大甄别平反工作力度。杨效椿是开辟和恢复淮南根据地的功臣,又是模范共产党员,被打成右派后有很多人替他鸣冤叫屈,曾希圣也承认他“在干部和群众中有较大影响”。一个月后,杨效椿摘去右派帽子,分配到省化工厅任副厅长。杨效椿要求恢复党籍,曾希圣搞了一个折衷,1961年11月安排杨效椿重新入党。

李锐的境遇最惨。1957年底李锐在北京开会,12月23日通知他回来参加会议,大会小会进行批斗,强迫他认罪和诬陷李世农、杨效椿。李锐不服,批斗随之升级,采取单独关押,24小时监视,窗户封闭,电灯高悬,房门洞开,理发、洗澡、大小便等一切都要报告。关押的6个月,精神的折磨足以使人崩溃。

李锐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行政级别由10级降为每月发70元生活费。1958年4月,李锐接到劳动教养通知后,给曾希圣写信反映身体有病,被认为是企图翻案,省检察院再次组织批斗,并扣发当月生活费。李锐被迫给省检察院写了一份认罪书:“我5月4日报省委的材料,也(是)把我想说的话向党说清楚,并不是翻案,对我的错误与罪行我是知道的。从现在起就安心的改造,不再作其他的胡思乱想。在前天下午的帮助下,我坚决执行党对我劳教的决定。”

我6个小孩今后的生活与读书问题,还请党给以照顾,请转报省委。”在李锐彻底“认罪”后,才补发了当月的生活费。

7月份,李锐被押送到白湖农场劳教,后转到华阳河农场。农场安排一名小流氓监视,向他身上吐痰,吃饭后在他身上擦碗。李锐向小组长汇报,得到的答复是:“你如不划为右派,他是不敢的。”他见了农场的干部和工人没有立正报告,为此多次受到大会点名批评。总场管教科的一名干事,召集生产队长会议,通知李锐参加会议,明知故问“你是坏分子还是右派分子?”李锐回答:“右派分子。”他一听就破口大骂:“你这个老坏蛋、老狐狸,过去做了很多坏事,有很大罪恶,到现在还不老实。”李锐只能毕恭毕敬站在那里听训。

李锐初到农场每月发8.1元,两个月后改发14元,伙食费、医药费等每月10元,剩下4元按规定2元储蓄2元零用。三年多后增加到30元。长期饥饿和超强度的劳动,李锐患上浮肿病和腹泻病,多次晕倒过去,大便时必须四肢着地才能拉出来。吃不饱饭,饿得要命,又不能向其他犯人那样偷吃偷喝,只好摘些野菜煮熟吃,被发现后批判他妨碍贯彻粮食政策,多次责令检查。

李锐的夫人下放到合肥市丝绸厂,非要她搬出省人委宿舍,不允许在省人委食堂买饭菜,再三苦苦哀求都不行。李锐的哥哥李瑞珠和嫂子罗智文受株连,1958年1月被捕,后送普济圩农场劳改,罗智文最后死在农场。

李锐在农场劳教四年,直到1962年3月才跨出炼狱之门。

五年之后的甄别平反

五年后国家形势逆转。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李世农、杨效椿、李锐的政治命运发生重大转机。

会前,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已经了解和掌握了安徽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曾希圣:“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

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霸王虽可怕，党内有精英。蚌埠市委副书记马謇参加会议，1月25日他给中央写了检举信，说会前抱着一肚子希望，要在会上把肚子里的意见讲出来，但是现在看来不行了。希望中央会后将安徽的与会者留下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或者派工作组到安徽了解情况。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写检举信要冒很大的风险，马謇做了坐20年大牢的准备，白天参加会议，晚上躲在被窝里写检举信。

这封检举信触动了中央核心领导层最敏感的神经，为了统一思想认识，迅速扭转全国的困难局面，毛泽东、刘少奇决定延长会期，会议转入“出气”阶段，鼓励大家讲真话。刘少奇率华东局柯庆施、中监委钱瑛等人，用10天时间坐镇安徽大组，亲自调查处理安徽问题。

安徽与会人员听了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特别是听了刘少奇在安徽大组会议上的讲话后，群情激愤，反应强烈，对曾希圣的错误开展揭发批判。李世农、杨效椿、张恺帆等人的冤案成为揭发的重点。

2月9日下午，曾希圣在安徽大组会议上围绕“封锁掩盖”、“宗派主义”、“过火斗争”三个问题作第二次自我检查时说：“在几次斗争运动中，我犯有严重错误，主要对中央政策掌握不稳，界限划得不清，伤害了一些好人，有的斗争过火，没有按照主席指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办事。”

曾希圣检查说：“把他（李世农一笔者）主张晒垡地、多种高粱，说成是对抗‘三改’而定为一条罪名，这是完全错误的。下面把不同意‘三改’，列为右派分子的罪状之一，是由此产生的。在斗争李世农时，把李世农对我有意见写联名信问题也拿出来批判，并逼使其他一些同志也作了检讨（吴光、郑日仁等），这是夹杂着个人成见的”。直到此时，曾希圣仍坚持认为“李世农是有错误的。他的错误还应该进行审查”。殊不知，当年被他整得死去活来的李世农，42年后以德报怨，担任《曾希圣传》编纂委员会顾问。

曾希圣检查说：“杨（效椿一笔者）的错误是与李世农的错误有联系的，但这个同志过去一贯表现很好，在干部和群众中有较大影响，我当时对他缺乏

治病救人的精神。是否要定成右派，那是值得考虑的。现在他已经重新入党，是否要以平反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可在审查中再行讨论。”

当晚，刘少奇在安徽大组会议上说：“曾希圣同志马列主义觉悟不很高，他不懂得团结大多数，不懂得跟各种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很多干部受到他的批评和打击，有几个案子，张恺帆、李世农、牛树才、杨效椿、陆学斌，这只是几个人，这几个人下面还有一大批这些案件……根据现在的观点，大家的认识，重新审查。中央准备派人到安徽，华东局也要派人去和省委一起审查、研究这些案件。受过处分、批判、打击的人，需要重新作出结论的话，可以重新做出结论。”

刘少奇宣布：“中央决定将曾希圣同志调动工作，曾希圣同志检讨时也讲了，要求中央把他调离安徽，中央接受他这个要求……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当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安徽的历史终于翻篇了，曾希圣在会议期间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霸王别姬”。

七千人大会尚未结束，会议的情况便通过各种途径传到安徽。一天，李世农在农场突然接到一封合肥来信，信中谈及会议情况，落款是“知名不具”。五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看到熟悉的笔迹，李世农知道是杨效椿的来信，热泪夺眶而出。

安徽的甄别工作艰巨而复杂，等待处理的案件数以万计。4月下旬，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率中监委工作组到安徽，指导改组后的安徽省委做好甄别工作。省委成立甄别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李世农专案甄别小组”。“李世农反党集团”被视为铁案，曾希圣虽然调离安徽，但仍担任华东局第二书记，甄别工作阻力很大。

钱瑛和安徽省委积极慎重地做好“李世农反党集团”的甄别工作，对原结论认定的问题，每件事、每句话都认真进行核实；耐心听取原专案组领导人和办案人的意见；安排专人分别找有关当事人谈话，亲自约谈重要证人；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代表，分别召集座谈，最后查明“李世农反党集团”一案确属冤案。

首先对杨效椿进行甄别示范。1962年5月18日，安徽省委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用一天时间审查了《关于杨效椿同志问题的甄别报告》，会议认为：杨效椿所以被划为右派分子，主要是由于

他在批判李世农时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伪造材料按照曾希圣等同志的意图进行检举,曾希圣等同志便认为他不能和李世农划清界限,把他认定为“李世农反党集团主将”,并以右派分子论处……决定给予平反。杨效椿在会议上发言,衷心感谢党的关心,表示今后要搞好团结,做好工作。过去对他进行错误斗争的同志,主动检讨和赔礼道歉。

随后对李世农进行甄别。1962年6月20日,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关于李世农同志问题的甄别报告》,会议认为:李世农所以被错误地批判、斗争和处理,主要是因为这样几件事:一、在1950年整风时,李对曾希圣缺乏民主作风等问题提过善意的批评意见,曾记恨在心。二、从1955年开始,李对曾提出并强制推行“三改”的办法持有不同意见,曾把农业生产技术改革的具体方法当作政治原则,作为硬性决议,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看成是反对省委。三、更直接的导火线是由于李对1957年春全省政法部门反“右倾”持有不同意见,与曾发生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对1957年春季安徽政治形势的分析,李认为许多闹事事件,主要是由于粮食问题和干部作风问题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曾却认为主要是地、富、反、坏分子的煽动、破坏,并提出在政法部门反“右倾”,把逮捕权下放到县,硬要用压服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而且更严重的是从此以后,使党的民主生活和国家法制遭受了更加严重的破坏,使敢于如实反映情况、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遭到了更加严重的压制,使曾希圣等同志的错误得到了更加肆无忌惮的发展机会,终于使安徽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损害……决定给予平反。

7月18日,中央监委批复:“安徽省委并省委监委:中央同意你们对李世农同志的甄别处理意见,撤销省委第六次全会(扩大)‘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议’,恢复李世农同志的党籍、名誉、职务和级别,并在原来宣布、传达的范围内予以公布。”这份批复里有玄机,“李世农反党集团”是件通天大案,“中央同意”应该是指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同意。

杨效椿、李世农问题甄别后,李锐的问题迎

刃而解。7月18日,安徽省委常委会审查了《关于李锐同志问题的甄别报告》。会议认为:李锐与李世农和杨效椿之间,仅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根本不存在什么“李世农反党集团”的问题……李锐之所以被划为右派分子,主要是由于他对1957年省委反右倾持有不同意见,如实地反映了反右倾中发生的偏差,以曾希圣同志为首的原省委认定他是所谓“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又一主将”并以“极右分子”论处。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决定给予平反。

与此同时,因“李世农反党集团”一案受到株连的大批冤假错案得到甄别平反。至此,该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8月12日,中监委就案件甄别工作向中央作了专题报告。报告说:“尤其是对一些重大案件,如安徽李世农(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河南潘复生(省委第一书记)、福建江一真(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魏金水(省委书记处书记、省监委书记)、山东李广文(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卓如(省委常委、副省长)等案件甄别平反以后,效果更为显著。这些案件甄别过程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的过程。同时,也是深刻教育干部、总结党内斗争经验教训的过程”。

李世农甄别平反后到北京开会,《人民日报》副总编胡绩伟向他当面道歉,坦承当年《人民日报》社论《对敌人必须专政到底——论安徽省委揭露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巨大胜利》是他根据安徽省委上报的材料撰写的。

五年的非人生活,给李世农等人造成无法愈合的创伤。1962年甄别平反时,李世农在寿西湖农场接到通知,赶到省委小礼堂听传达文件,突然发现自己听不清扩音器里的声音,后诊断为神经性耳聋。两年后又患脑溢血,经抢救,命虽然保住了,但此后一直无法坚持正常工作。杨效椿在农场监督劳动时患肝炎,后转为肝硬化、肝腹水,65岁病逝。李锐临终前要孩子们把他写的一首诗刻在墓碑上:“五七逆转怨六载,十年浩劫全非人”。■

(作者为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棉花品种研究室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 黄 钟)

顾准《商城日记》的背后

○ 李素立 王晓林

1959年3月13日凌晨,44岁的顾准与中国科学院另外五名右派被遣送河南省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起先他们随下放干部在西大畈国营农场劳动,后来商城县委执意要将六人调到铁佛寺水库工地,与省城郑州和商城本地右派集中监管劳改。

“6月12日,到劳动队时,肯定了这是一个集中营。”(《顾准日记》60.1.12.)这句话是顾准初见劳改队现场时心理震撼的写照。

水库工地如一只巨大的盆子,以高地为其边沿突然就凹了下去。“盆子”里是蚂蚁一样的民工,车拉肩挑,沿着一条条为减缓坡道陡峭度而不断折返蜿蜒的狭窄车道向外搬运土石方,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面黄肌瘦。

这是个典型的大跃进工程,没有勘探,没有设计,没有图纸,没有规划,没有工程师更没有总工程师。1958年县委王书记就决定了要在两山之间修筑大坝,拦河蓄水,修建铁佛寺水库。王书记三月激情燃烧,六月就开了工,火速从各个区、镇、村抽调了几千民工开始修筑大坝。商城县志办公室收藏的一本油印本《商城水利志》中载有铁佛寺水库专篇,其防洪、泄洪、疏浚、承压……等等筑库常识均不在考量范围之内,施工的唯一标准就是“多、快、好、省”,为一年后必然的大坝垮塌——“人或为鱼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溃坝前已回到北京的顾准,其实是个幸存者,只是此刻的他什么也不知道罢了。在1960年5月18日凌晨三点的水库决堤中,商城百姓1140人罹难,其中包括在水库劳改的右派19人。这是根据实际埋葬死人数量的官方统计数字。若加上失踪者、外乡民工、过路人、“流窜犯”等,死亡人数已超过2000人,伤者近600人(中共商城县委《关于蜕化变质分子张念仲罪恶事实的综合报告》)。顾准在“商城日记”中提到过五十多次、被他认为是“有自己的政治信念”、“应该成为全体农民政治上的代言人”(《顾准日记》59.12.22.)的青年右派徐云周就是罹难者之

一,死时年仅35岁。

到顾准到来的6月,水库工地仅剩下1千人左右。相当于服徭役、一分钱工资也没有的几千民工从工地上大批逃跑,开始施建时数千人的队伍现在只剩下500人左右。县委将全部右派,包括商城本地的,省会郑州的,加上顾准六人,也是500人左右,统统当做了徭役人员。

肯定了自己身处的是一处集中营,顾准反倒踏实下来。当天他就成了蚂蚁窝中的一只“工蚁”,但时间不长。“到劳动队之初,我参加了几天修筑大坝的运料工作,以后一直在自给菜园”(《顾准自述》P258)。但这并非是要照顾他,而是劳动队怕出人命。谁也不愿,不敢和这位44岁的老右派搭班推拉一辆架子车,坡陡车重,半道上泄了劲那是要出大事的。让他自己推独轮车更不可能,连小右派们都搞不成这活儿,他一个半老头要了他的老命也枉然。挑担吧,没几天他右腿就瘸了,再让他挑,疼死他事小,挡了大家的道事大。只好把他调到菜园组去。菜园组就在“盆沿”下边,以种菜自给自足,有多余也卖一些给工地民工。

从此顾准就成了“菜园顾”,许多人都这样唤他。比起监狱的叫号,他多少感觉好受一些。

1958年6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信阳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3530.75斤、西平县城关公社小麦亩产7320斤这样有零有整、貌似真实的消息,在全国首次放了“卫星”。灾难从此开了头。信阳也是“全民大办钢铁”的先驱和“先烈”,1958年占全地区劳动力总数30%的120万人被迫参与所谓“大办钢铁”,商城县更是放出日产钢铁29074.6吨,震惊全国的“超级卫星”,中央冶金部曾在商城召开现场会并拍成纪录片,《人民日报》配发消息和社论向全国宣扬。还有50多万劳动力大办所谓“滚珠轴承”,120万人大办水利。

1959年信阳大旱,春播时滴雨未下,地委却提出“大旱大丰收”的口号。在向中央预报粮食产量

时预估了64.27亿斤,省里根据这个数字将征购任务定为16亿斤,比丰收的去年多出近7亿斤,最后确定数额时,地委又向各县追加了5%——总征购近17亿斤。而当年全信阳地区的实际毛粮食产量只有28.3亿斤,征购比例高达60%[赵定远(原信阳地委第一书记)、纪涵星、丁石《关于“信阳事件”的回顾》]。

如此酷吏苛政,也就是说官僚们在做计划时就准备连农民的口粮、种子都搜刮一空。

还有个更要命的“大兴水利”。

1958-1960年,信阳地区共修建中型水库68座,其中商城投资18万元兴建了包括铁佛寺水库在内的5座(《河南日报》1958年4月14日报道)。商城县还另外建小型水库969座。这些水库大部分都被冲毁了,一是商城本来就是个洪涝灾害比较严重的地区,中共建政的头36年,15年都是涝年,1960年的洪涝并不是最严重的;二是这些水库大部分是大跃进的产物,豆腐渣工程。

商城原来在信阳、在河南也算得上是个富裕县。1958年夏铁佛寺水库开始兴建,信阳地区各水利工地上的200万劳力曾一度“放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干活”。但是到了1959年夏,农民嗅到了危险的味道——饥饿——大饥荒——大恐怖近在眼前。去年的“青壮炼铁去”尚还有“收禾童与姑”,今年则连“谷撒地,薯叶枯”的景象也没有了,却还在强征“青壮”修水库,分文不给,还要求自带干粮。一年前许诺下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无望了,“水利带来大丰收”是无望了,“全国都来支援”是无望了,“万不得已政府也会补助”是无望了……一切都是瞎话。

一切“无望”都不打紧,最令他们颤栗的并非春旱(那是比较常态的事情),而是因为压根就没有正经的“春种”哪里来的“秋收”?轻信而迟钝的农民开始恐慌。他们竭力藏匿起一点口粮,希望能熬到第二年春末,至少能收获些瓜果果腹以求不死,却遭到“反瞒产私分”的血腥镇压。仅仅商城县,因被搜出私藏口粮而遭斗争的1125人,捆绑吊打的663人,酷刑致死的76人,残废41人(中共商城县委1960年8月26日《关于对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检查》),这个数据还是当时尚在台上的县委公布的官方数据。

饥饿这只猛兽来到铁佛寺水库右派劳改营要稍微晚一些,毕竟右派们的粮食还是县里统发的,

到了顾准一行到达水库,右派们还没有一个死于饥饿。让我们顺着《顾准日记》的脉络把事情叙述下去。

“6月12,到劳动队时,肯定了这是一个集中营。”(《顾准日记》60.1.16.)顾准日记中最震撼的部分——“商城日记”其开端应该是这里,而不是起始于10月14日的“X/14晨四时[1959]年菜园所种白菜(畦菜)”(《顾准日记》59.10.14.)并且还因为那天日记是用铅笔写成的,因受磨损字迹不清,被编者“故略”了。

“这六个月,真正经历了一场严格的锻炼。”(《顾准自述》P258)顾准“历史交代”中轻描淡写的这一句话,需要到他实时写下的“日记”中去找出全部的注释。多年后,人们把他1959年3月到1960年1月的十个月日记编纂成《商城日记》,除了多处因“不便与公之于众”的缘故而删去的之外,基本上可以当做原生态日记阅读。这是一部迄今为止唯一面世并正式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亲历者写于1959年中大饥荒的日记。

起初,右派们至少吃得饱,粮食不够但自种的蔬果很多,可以花一点钱买了吃。右派们除了北京的六位还保留了原单位的一点生活费(例如顾准从原来的260元工资降为50元生活费)都是没有任何收入的,靠在劳动队中干活和对队长沈万山的“态度”每月评级,领取从6元到12元的生活费,可以用来买果蔬吃。

沈万山是劳动队唯一的共产党员,也是唯一的统治者。据说是在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时为我军送了情报,这是他参加革命的开始。他最喜欢对右派们说的一句话是“你们简直不像样子!”,最愤恨的是右派们“骄傲”,就是瞧不起他。尤其顾准,沈队长特别在乎此人的“态度”,降服了他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在拒绝了沈队长要他做北京右派联络员(组长)的青睐、惹得他恼羞成怒后,顾准给自己也找了个“大岔子”——原来可以在国庆十周年“大赦”时由商城县委给“摘帽”的机会就白白送给了别人。可此人根本不在乎摘不摘帽,将其称为“政治勒索”(《顾准日记》60.1.16.),再说商城县委的摘帽也根本就是个乌龙,完全做不得数。

为了“帮助”顾准,批斗会是常常要开的,但绝不能占用劳动时间。到了盛夏,每天的劳动时间延长到了十五六个小时,有时从清晨二三时起,晚上还要夜战。为了能早点睡觉和不占用睡觉时间写

检讨,顾准常常轻易就认了错,无非是骄傲自满、人道主义什么的,他早就驾轻就熟了。现在人人都可以教训他,他也绝不辩解,并很快理解了古人所言:“人有唾面,洁之,是违其怒,正使自干尔”之意。

劳动上他也进步不小,可以穿着胶鞋下到粪窖底部去清底,用手把大粪抓到粪筐里;也能挑起一百多斤的粪筐走上二三里路。夏秋间菜园要巡视,防着水库民工偷菜。轮到他时,晚上12时起巡夜,第二天白天可以照常整天劳动。可左股骨开始下挫,他写信向妻子要钱好看病,但妻子不相信他信中的叙述,怕他不好好改造,不肯寄钱来。

生活上,他早就忘掉了“翩翩君子”是个什么意思,夜里冷上茅房是个苦事,他也用瓦罐做尿壶,大通铺房里人人尿得山响,谁也不在乎。“起身大便,束装上班”(《顾准日记》59.10.14.)充满“豪情”,大便在他的眼里早就成了宝贝。到了后来,在因为饥荒,人根本拉不出大便的日子里,他会老练地蹲守在茅房门口,等着拉屎的人们留下点宝贝好抢在自己的粪桶里交到菜园组。他蹲守劳改队的茅房,也蹲守民工的。可是“眼下民工拉的屎都没什么肥料了,有时全是蛔虫”(《顾准日记》59.11.4.)。

可就算这样,县长书记们还要搞什么商城的“中山公园”,什么“万头养猪场”,沈队长赏脸要顾准参与设计,又被他以“不熟悉”为由坚辞。这个老右派太给脸不要脸了,沈万山恼怒万分,可他哪里能懂得顾准此时在想什么——“将来还是让猪吃人呢?还是计划落空,浪费一大笔钱呢?”(《顾准日记》59.11.27.)

秋天很快过去,野兽般的大饥荒的从乡村迅猛扑向劳改队。果蔬没有了,粮食是绝对不够的,主食变成了红薯和胡萝卜。人们开始浮肿,十人九肿,顾准也肿。农村已经开始人吃人,“除民间大批肿一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内公审,据说20日要宣判。二起人相食,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顾准日记》59.12.22.)。杀活人吃要公判,吃死人的就不追究了。我们的调查对象亲见过吃了饿死的孙子尸体的祖母。胖一点的人不敢上街,怕被吃掉。实际上哪里有“胖子”,都是肿的。

劳改队成了天堂,右派们虽然也开始饿死,可好歹到目前只有一个,他们的家属今天饿死两个,明天饿死三个已成常态,有全家都饿死了只剩下

一个孩子被乡亲给送到劳改队的,还有全家除了右派自己一个都不剩下的……“劳改队是天堂与避难所”(《顾准日记》59.11.4.),顾准这么说。

他和一位郑州的右派C(老人如今还健在)结成了一个“吃”的联盟,他出钱(因为有北京的汇款,顾准在劳改队算个财主),C出面,出力,去搞吃的。年轻的C凭着从未离弃他的好哥哥好嫂子和北京显赫的亲戚,永远有本事搞到吃的。是时商城的货架上连咸菜都没有了,早就买光了,许多人当街就能把一斤咸菜吃下去。唯一剩下最昂贵的虎骨酒和果汁鱼肝油,C就买了来给顾准,但很快连虎骨酒鱼肝油也没有了。有一次,C千方百计搞了一袋代乳粉,顾准接过去,抓起一把就直接填进嘴里。有时C什么也弄不来,饿得七荤八素的顾准就去地里偷两条生胡萝卜吃。

人在饥饿面前是没有尊严的。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活还要干,粪还要抢,检讨还要写,批判会还要开。沈万山照样骂人,还打,打“流窜犯”,打偷菜的民工,打不听话的右派,他因为能吃饱而格外有力的双拳是可以把人往死里打的。我们采访的所有当年的右派老人对他的称呼都是“牢头”。《顾准日记》中对他的描述不是过分而是不足。

许多人肿了之后开始发烧,顾准也发烧,医生起初还给量体温,后来干脆免了,谁都知道病因是什么——在身体逐渐冰冷之前会有一段持续的发烧,在浮肿之后。最后连沈万山也害怕了,动用了和县长的私人关系买回一副牛骨架,熬了豆腐每人一碗。

商城的大饥荒从1959年初冬开始,直到1960年仲春第一批瓜果长出才有好转。据一份官方文件——中共商城县委1961年3月30日《关于蜕化变质分子张念仲罪恶事实的综合报告》统计,其间共死亡人口96256人,占全县总人口21.7%。死绝的村庄453个。撇下孤老2447人,孤儿3667人。张念仲1960年3月—9月出任商城县委第一书记,而商城开始饿死人始于上年11月初,他的前任似乎应该负有更大的罪责。

据另一份官方文件——中共商城县委1960年11月4日《关于商城县委所犯错误的主要经过和后果》对当时行状(情况)的统计,1678个人民公社大食堂停伙,占全县总数41.95%;14680人死亡,34023人发生浮肿病,4435人外流,分别占全县总人口

3.67%、8.26%和3.67%。但这个文件提供的数字肯定是被大大缩小了的,根据是目前《商城县志》记载的全县人口总数,1958年为437284人,1960年为339619人,两者相差为97665人,除去正常死亡,可以认定至少9万多商城百姓是因大饥荒饿死的,这是死亡人数的下限。

万幸的是1960年1月19日,六名右派回到北京。中科院方面也怕出人命。

比起《夹边沟纪事》,比起《定西孤儿院纪事》,商城故事可能也就是一般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顾准亲历了它,观察和记录了它。还有特别了不起的,在国人还毫无“名单”的概念或者认为“名单”根本不值一提的年代,他留下了一份“顾准名单”。

“顾准名单”——1959年商城右派劳动队部分队员名单,就在他1959年12月26日的日记里。除第一名——队长沈万山之外,名单中的人全部是右派分子。其中科学院右派六人,其余为郑州和商城本地右派,他们大部分原是中小学教员、小职员、小干部。根据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1959年4月编纂的《右派分子汇集》所列,全县公职人员2659人,划为右派者456人,所占比例为17.1%。而6名“畏罪自杀”者连在册的资格都没有。

顾准的“商城日记”中提到铁佛寺水库工地的右派为242人,实际上从1958到1960年垮坝之前,先后有四百左右右派在此劳改,“商城日记”列出名字的右派仅占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即不足100人,但日记留下了很大的推测空间——上述名单仅限于他日日接触的“劳动队统治层”、“里厨房”、“外厨房”、“缝纫室”、“理发室”、“菜园组”、“七组”、“八组”和“几个病号”以及几个“其他突出人物”(《顾准日记》59.12.26.)。既然有“七组”、“八组”,那么必然有一、二、三、四、五、六组,例如他曾提到饿死的“三组的周百风”。在五十多年后我们的实地采访中又发现还有一个“宣传组”,很可能就是被他列入“劳动队统治阶层”的部分。另外,在这份集中的“名单”之外,还有若干散在日记中的人物,也是可以算在“顾准名单”之内的,名单中有些人是够得上列“志”的,他写的也确实是“劳动队人物志”(《顾准日记》59.12.26.)。

看这些“人物”,这些“志”,你需要将他们的事情、事迹、轶事、故事从不同的日子里,不同的语境

下摘出来,Puzzle着(拼起来)看,方能看到一个个纪事本末和人物志异。和许多描写1959年大饥荒的纪实性作品不同,“商城日记”不是“人”淹没在事件中,而是恰恰相反,事件几乎要淹没在人海中。所以你看“商城日记”若非从“人”中读“事”,就不可能读清楚事也不可能读清楚人。“事”的震撼也好,悲惨也好,要批判也好,要颂扬也好,都是靠“人”来呈现,一个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父母兄弟姐妹,有妻子丈夫孩子,有七情六欲,和你我一样的男人和女人。

这份名单是“商城日记”最震撼人心之处,也是彼时十分罕见的人文关怀个例。顾准在暴戾环境中对人性的追问,在仇恨宣传中的悲天悯人和在丑恶生态中对美善的追求都是超越时代的。这里仅举一例:

人们都知道顾准写于1964年的《粮价问题初探》,对我国的粮食价格政策提出了至今也不过时的思路。可谁能想到他首次提到“粮价”问题,是在腹中已经没有一粒粮食的1959年年底的商城。劳改队已经饿死了三人,人们面对着致命的饥饿,恐怖到极处的饥饿,别说“粮价”,连“粮食”两个字都无从谈起。

12月22日,这一天的日记他写了将近四千字。很难想象在腹中没有一粒真正的粮食,饿到需要“偷东西吃”境况中的顾准,是怎样挣扎着写下这些文字的。

晚饭是红薯和胡萝卜,腹中没有一粒正经粮食的顾准开始考虑粮价问题:

“真正的改弦易辙,必待农村财富积累,可以从生产资料这个盆边溢到消费资料;必待糊口经济的强力改组已消耗完了它的生命力,放宽,有利于生产发展之时才行……在中国,这意味着粮价提高,农村粮食供应尺度放宽,公共食堂方向取消而代之以严格的工资制,公社有力量为农民营缮新宿舍等等的时候才行。新制度是工资制度,新制度不仅不是吃饭不要钱,而是吃饭很贵,少一张嘴,生活水平提高很多的制度。”(《顾准日记》59.12.22.)

就是在此处,他首次提到了粮价问题。四天后他又写道:

“饿死人究竟是可怕的,然则57年前的局面不会再有了,直到实行下列的根本改革为止:提高粮价,农村全面实行工资制度,粮食自由供应,公共食

堂自由化。”(《顾准日记》59.12.26.)

顾准各个年代的文字多次提到“回到1957”，“Return to 1957”，也多次哀叹“回不去了”。正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终结了自1907年秋瑾为武装创立共和牺牲，各省开始筹备选举成立咨议局始的、中国五十年宪政民主追求的进步历史。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国家粮价”是顾准一生都在摸索、探索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在亲身经历了“粮食问题”的残酷性和恐怖性后，他认为自己有资格，有能力去论证它，为国为民献上正确的国家粮食政策。这才有了后来的《粮价问题初探》。

“商城日记”中类似的思考还有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还在商城，顾准就下了“历史要重写的。谎言连篇，哀鸿遍野，这一段历史如何能不写？”(《顾准日记》59.12.27.)的决心。回到北京，他立即着手书写《铁佛寺水库记录》，可人们最怕的恰恰就是他要“记录”些什么。临行前沈万山场长的“千叮咛万嘱咐”还不清楚吗？

“沈场长老实不客气地指示了。其内容是接上头接不上头，我对你们的教育如何如何等等。所说的话只有一点是有内容的，就是要从大处看党的成绩。这意思就是说，说谎、饥饿、死亡都是小事，你们回去说话要小心。这个王八蛋居然自称我对你们指示……！”(《顾准日记》59.12.29.)

没有人要他“记录”，更没有人要他“汇报”。就算不提那些明示、暗示、指示、威胁他的人，连妻子和孩子们也全都不相信他们的丈夫和父亲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一切。他还没来得及说出看到、听到的十分之一，就被他们冰冷仇视的目光吓住了。

(上接第64页)

毛泽东对林彪不能主持工作，不能出席会议也给予充分谅解和关照。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已成为接班人的情况下，毛泽东也多次说过“林有病，可不出席”一类的话，或者明确指示让叶群代表林彪开会。林彪本来就不爱参加会议，经毛泽东这么一讲，也乐得逍遥。

当然，林彪也有以身体不好为借口推逃公务的现象。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过一个星期了，林彪还赖在大连不回北京就是一例。1967年2月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大闹怀仁堂”后，毛

一家人，除了母亲，都以为他是因为右派下放劳改而精神分裂了。

可他就是要写，要记录！

他推测，饥荒最严重的还不是商城，甚至还不是信阳，这种状况应该是全国范围的。

“59年的旱灾，看来是以湖北为中心，二头扩展的。河南确实还算较好的。”(《顾准日记》60.1.18.)

“还有四个半月，谁知道会出什么事？……中央知道这些下情吗？那么1960年上半年还会有些什么措施呢？”(《顾准日记》60.1.15.)

忧国忧民的情怀一览无余。

从商城地狱回到北京人间的顾准，眼下最急于要做的，除了记录下他所观察到的恶性社会病株，还有就是坚决要“脱出二十年的拘束，走上自由批判的道路”(《顾准日记》60.2.3.)。既然一切改变都始自批判，就让我来做这个始作俑者吧。

“我将潜伏爪牙忍受十年，等候孩子们长大”(《顾准日记》59.12.31.)。

很惊叹他居然敢在日记中写下如此“变天账”式的语言。

顾准的“铁佛寺水库记录”如今不知在何处。

一个大饥荒的亲历者，思路宽广、清晰，文笔平实、流畅，假使保存下来将会是一份何等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不要太遗憾吧，好在如今，毕竟中国有了《墓碑》，有了《定西孤儿院纪事》，顾准地下有知应得安慰。(本文所有引文均出自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顾准文存》)■

(李素立为河南教育学院教育系教师，王晓林为退休电讯工程师)

(责任编辑 黄 钟)

毛泽东召集会议批评他们，林彪不出席也是一例。1970年12月，毛泽东让林彪见斯诺，林彪说，“斯诺是熟人，见面后他什么都问，不好回答”，于是也以身体不好为由拖着不见。至于平时以身体不好为挡箭牌不开会、不会客的现象就更多了。

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在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同时，也喊“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的口号，殊不知，林彪是个弱不禁风的病号。■

(作者为唐山市开平区政府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黄 钟)

毛家湾林彪琐事

○ 李根清

内勤

1964年底,我从北京到上海担任林彪内勤的时候,林彪住在徐汇区太原路的一座房子,那里的内勤有两个人,一个叫刘文儒,一个叫屈真。我去了以后,与刘文儒一起照顾林彪,还为林彪抄写读书卡片,渐渐地林彪也找我记录他口述的一些东西,誊抄他报送毛泽东、中央或中央军委的信件、公文稿等。

林办工作人员大体分为四摊,即秘书、内勤、警卫人员和外勤。内勤除刘文儒、屈真和我三个人外,还有王淑媛。我们四个人是林彪一家人的贴身侍卫,所以叫内勤。外勤是指司机、厨师、通讯员、管理员、锅炉工等,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不经传唤不进内宅,所以叫外勤。

内勤除负有一般性的近卫安全职责外,主要任务是负责林彪的饮食起居、健康护理、传唤接待等。除王淑媛外,我们三个人都是从部队挑选的现役士兵。刘文儒、屈真两人都受过专门的医护训练,有一定保健知识和护理经验,唯我是个门外汉。

刘文儒是内勤组长,每天要记载林彪的《病程日志》,像朝廷的史官一样,把林彪当天的主要活动、言论以及饮食、健康状况等情况一一记录在案,文字简要,是研究林彪的重要资料。1966年8月,刘文儒下部队后,屈真过来照顾林彪,这项工作即由屈真来做。他们两个都是极端踏实、极端细心的人。刘文儒调走后,林彪一边踱步,一边不停地叨咕“大刘,大刘”,一天竟停住脚步问我:“大刘呢?”我说:“大刘下部队了。”他听了仍像犯魔怔一样嘀咕:“大刘下部队了,下部队了。”

内勤几个人一天到晚跟林彪一家打交道,几乎像林彪的家庭成员一样,对林彪的日常生活、工作习惯、脾气秉性以及健康状况等细枝末节,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时时注意。林彪怕风,人

从他身边走过时产生的那点“风”,他也会设法躲开。但内勤无论什么时候从他身边经过,他从不会躲。因为我们从他身边经过时都会放慢脚步,尽可能不让风生。林彪爱吃烫嘴的饭菜,我给他送饭时就尽量脚步快点,不让饭菜变凉。林彪入睡后,我们都会脱掉鞋子悄悄离开卧室,然后轻手轻脚地打开客厅的窗户通风、清扫。

林彪每年都要去外地住些日子。每到一处,内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扯电线、安电铃。在林彪居住的卧室、活动的客厅、走廊,乃至卫生间,都装上电铃按钮,电铃指示牌装在内勤值班室。电铃指示牌上的每个编号都对应林彪活动的每一个场所,比如,1号牌是卧室,2、3号牌是客厅,4号牌是走廊等等,林彪只要按一下电铃按钮,内勤就会很快来到跟前,把林彪交待的事情立即去落实。

我给林彪当了两年内勤,1967年起又当了五年保密员。随着时间推移,林彪在我心中的感觉,渐渐由崇高变为平凡,由尊敬变为亲切,由新鲜变为平淡。然而,林彪的睿智、深沉、清廉、奇特,却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林彪不是神,也不是鬼。林彪是人。

火柴与黄豆

我在上海见到林彪的时候,他正在客厅踱步。李文普对林彪说:“首长,小李从北京来了,今后就由小李和大刘负责照顾您。”因为是第二次见林彪了,我站着没有给林彪敬礼。李文普告诉我,林彪不让工作人员向他敬礼,林彪不伸手不要伸手与之握手。这样,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七年,就只是第一次见林彪时跟林彪握过一次手,敬过一个礼。林彪看着我,口气和蔼地说“好啊”,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回到内勤值班室没多长时间,电铃“嘟,嘟”响了两下,刘文儒告诉我:“首长在客厅呢,你

去吧。”当我见到林彪时,林彪还在背着手踱步。他看见我进来,抬起右手用三个手指在空中连续做了两个捏东西的动作,便又踱步去了。我回来看刘文儒:“首长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刘文儒轻轻笑了笑说:“首长要吃花生糖。给,你给首长拿去,他抓了糖你就回来。”我接过刘文儒递过来的一个糖盒,快步返回客厅,林彪果然抓了两块花生糖便转身离去了。我回值班室也就二十多分钟,林彪又按电铃了,这一次还是比划着要糖吃。从这天起,我知道林彪在踱步时有吃零食的习惯。他吃我们自制的花生粘、炒黄豆,有时还吃炒蚕豆。每次只抓两三颗,但是一天要吃六七次,至于什么时候换样儿,由他说了算。

林彪踱步时有个爱好,就是划火柴。我常常看见他在踱步过程中,随手拿起茶几上的火柴盒抽出一根“噌”地一下把火柴点燃,站在那里若有所思地望着眼前闪动的火苗,然后再轻轻甩动手腕,等火苗熄灭后把冒着一缕青烟的火柴梗凑到鼻子跟前,饶有兴味地嗅一嗅残留的硝烟。

我们专门买一些梗又粗又长的高级火柴摆在林彪客厅、走廊的茶几上,随他去划。燃烧过的火柴梗林彪便随手往地毯上一扔,只要他不睡觉,也不让我们清扫。所以平时不管秘书进来或者有客人来,都可以看见满地的火柴梗。

叶群曾经解释说,林彪打了一辈子仗,忘不了战场上硝烟的味道。

踱步的学问

踱步,是林彪的一个重要习惯。一天当中,他除去睡觉、吃饭、会客、听秘书讲文件,其他的时间都在踱步。客厅、走廊都是他踱步的地方。北京毛家湾住地有东西两个客厅,面积加起来有近百平方米,东西走廊也有三十多平方米,给林彪踱步提供了很好的场所。林彪到外地去住,都注意选择环境安静,卧室和客厅宽敞的居所。

林彪踱步慢条斯理,平缓而有节奏。脚下穿一双老北京布鞋,似乎总是故意用脚后跟擦着地毯,每踱一步脚下便发出细微的摩擦声。他微微低着头,双手反剪,眼睛瞅着脚尖前方一两米远的地方,永远沉思的样子。时而会停下脚步,双臂合抱,抬头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语;时而会擦亮

火柴,看着火苗,闻闻硝烟;时而会叫内勤拿点零食来;时而会拿起茶几上的铅笔,在纸上快速地写些什么;有时则叫内勤或秘书来,口述他的所思所得或对军国大事的意见。从这一点讲,客厅就是林彪的办公室,踱步是林彪办公的一种方式。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在客厅、走廊、卧室以及卫生间这些凡是能走到的地方都摆放茶几,在茶几上摆好纸和笔,使他能随时随地写下他的“思想火花”。

每天,我们都会在林彪上床休息后,抓紧时间把他写了字的散纸收集起来,放在客厅他座位前的茶几上。林彪早起洗漱后会坐在那里整理一遍他头一天写的东西。他认为重要的,会让我记录下来。他认为无用的,就随手往地上一扔,最后我会给他收拾起来送炉膛烧掉。因为林彪写这些东西的时候,眼睛不瞅纸和笔,因而写在纸上的字常常横不横,竖不竖,龙飞凤舞,字迹重叠,非常难以辨认,他如果认不出就会冒出一句话:“我也不认得啰!”

林彪的许多指示,是在踱步中作出的。林彪的许多“黑话”是在踱步中写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国的林彪的几次讲话,也是林彪在踱步中构思而成的。

在林彪看来,踱步是休闲,也是思考方式、工作方式。他甚至把“闲着”、“踱着”上升到领导科学的高度,几十年持之以恒。他写道:“空着——即是在想着——不要以为空着是白过,是浪费了时间,踱着、躺着、玩着、静着,皆是想着……”“忙着——就是没有想,没有可能想,故不可忙。”

“闲着——即是在做思想工作,在进行领导。”

林彪也有不踱步的时候,那就是他自己感觉“生病”的时候。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情绪低落,踱步的时间一天比一天少,有时甚至整天蜷缩在沙发里,一动不动,不声不响,像活死人一般。

独特的读书法

我到林办的第一个工作日是为林彪抄写读书卡片。卡片内容不是林彪自己选出来的,而是林彪出题目,由秘书李春生从书上查找的。

那天上午一上班,李春生就给我抱来一摞

书,有马、恩、列、斯的著作,有《毛泽东选集》,也有其他人的著作。书中夹着许多一指多宽、三寸来长的白纸条,从夹了纸条的地方打开书,可以看到李春生用铅笔画的一个个括号,每对正负括号之间的那段文字,便是应该抄写在卡片上的内容,也就是林彪要读的“书”。李春生交待我上午抄完,说下午便要给林彪看。

卡片是专门印制的,64开纸大小,正面上方依次印有“分类”、“标题”、“来源”和“编号”、“年月日”,“内容”以下印有横格,正反两面可以抄写二百多字。不过,很少有写得满满的时候,大部分卡片内容有一百多字,有的只有几十字。

为林彪抄写卡片是我的一项重要工作。我的字写得并不好,只是工工整整,从不敷衍,所以林彪愿意让我抄写。有一段时间曾经试用打字机打印卡片,林彪认为不如我写的好,便放弃了。在林办工作七年,由我制作的读书卡片不下万张,都是李春生查找我抄写的。

李春生,江苏常熟人,1936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高材生,在1964年调林办前是解放军政治学院哲学教员,矮个子,极善辩论,常口衔白沫,侃侃而谈,不论马、恩、列、斯的著作,还是费尔巴哈、黑格尔的“本本”,他都能像背“三字经”一样顺口背出一段,因而秘书们送他雅号“学者”、“小夫子”。由于他常年戴一副深度近视镜,又被戏称为“眼镜”。1966年8月,张云生调林办后,他被降格为“小眼镜”。因为他常年啃书本,不谙世故人情,不善办理事务,叶群也叫他“书呆子”。

李春生走后,我便一张一张抄写起来。因为要给林彪看,我用楷体抄写,努力写得工整些,每个字的大小、间距都差不多。如果抄错了,我会撕毁重来。

好在每张卡片内容都不算多,快到中午的时候,一摞书里的纸条就被我抽完了。正当我准备交活的时候,李春生走进来,又给我放下一摞书,要求我抓紧抄写,在下午两点前交给他。我不敢怠慢,决定放弃午饭。当我在下午两点前抱着书和抄写的一沓卡片放到李春生面前的时候,他又递给我几本夹着纸条的书,对我说,“下午把这些抄出来,”然后指指桌面上还没有夹纸条的书本说:“这些我看完再给你。”

这是我到林办的第一个工作日——没有吃

午饭。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发现李春生看书的速度极快,准确地说,他不是在看书,而是在翻书。他既能快速准确地从《马恩选集》、《列宁全集》中找出某篇著作,又能快速准确地从这些著作中找出有关论述,然后用括号一一标记出来。听说,李春生的前任李德也有这个本事。

从浩瀚的马列主义著作中寻章摘句,然后制成语录卡片,通过读语录卡片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这就是林彪的读书法。1965年他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除了读语录卡片外,还要李春生把书中阐述的理论关系用图表体现出来,然后由我抄写在一整张图画纸上,挂在客厅里供他阅读。林彪还用过“剪贴法”来读书:在读一篇文章或是一本书时,选择他认为“有用”的话剪贴起来。据老秘书讲,一本《共产党宣言》被他剪到最后只剩下“大工业、大机器”几个字。

我发现林彪读书有很明确的目的性,总是围绕着他当前考虑的问题来读书。一个时间段,围绕一个什么专题制作卡片,主要从谁的书上选择卡片内容,都是林彪自己提出的,秘书只需照他的要求看书,从书中把相关论述查找出来就行了。1964年10月到1965年初,他主要是围绕军队工作要“突出政治”这个问题读书。所以,那段时间制作的卡片都是马、列、毛泽东关于政治与经济、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以及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等有关论述。1965年春他重点学习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制作了大量关于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有关论述的卡片。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集中的读书活动少了许多,直到1969年初为准备“九大”政治报告,他才一面让陈伯达起草那份《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稿,一面自己着手研究马列主义关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这方面的论述,为自己在“九大”作口头报告做准备。

林彪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实际上,是他自己读书学习的切

身体会。

林彪为什么不去一本一本本地读马列原著,系统地、完整地掌握马列主义理论,而只热衷于读书中的语录呢?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从林彪1960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找到答案。在那次讲话中,林彪说:“什么东西是‘完整’的、‘系统’的?我说这些都是糊涂观念。不同的对象,应该有不同的学习方法,对自然科学的学习,是应该比较系统的。比如说,学数学、物理、化学,前面不学,后面就没有办法理解。对社会科学,就不一定那样去学,这是另外一种对象。社会科学无非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它是用不同的形态,渗透在每一个问题中间去的。在个别中间有一般,这个一般就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你学一部分东西,就可以了解这个一般。”“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他们并没有编出一本书,叫你从第一课学到最后一课。”“搞什么‘完整的’那一套,把那个东西神秘化,费力大,得不到什么好处。费力很大,使用很少。”“应该是用啥学啥,需要什么东西,学什么东西。”林彪强调:“我们要站在书上来读书,不要爬在书下来读书。要批判地读,要吸收地读。书应该为我服务,而不是我为书服务。让书牵着鼻子走,我不干。”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林彪读马列著作的态度和方法:做书的主人,学书中渗透着的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啥学啥”,而不是为了“系统”、“完整”而“让书本牵着鼻子走”。

林彪认为,围绕专题做卡片是读马列著作的好方法,卡片法帮他从本本中跳了出来。

1964年3月,林彪口授说:“经典著作有黑格尔文风,难读。”“卡片办法解决了食古不化、融会贯通、茫无头绪、浩如烟海的困难。早有此法,思想就会更成熟,费力会更少。”

林彪在盛赞卡片法的同时,对怎么看书、怎么选语录、怎么做卡片也有过明确要求。他交待秘书说:“看书做卡片。卡片分两类,一类是基本卡,一类是临时卡。比如宗教、艺术、道德;又如农业合作化等等,可以随时查找,做临时卡。而历史唯物主义这方面的问题做基本卡。”“书主要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这些著作中主要是看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最重

要的理论贡献是历史唯物主义。如生活、生产与消费、技术工具的作用;如论人的作用、思想的作用以及上层建筑的作用;社会生活、社会划分为阶级、阶级斗争;论党、论无产阶级组织政党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散在他们的著作中,(通过做卡片)把分散的论点按问题集中起来。凡属于同一内容、同一含义的都要,字句差不多的也要,不要怕重复。只有一两条就记不住,有几十条就可以加深印象。”林彪说,这样学力量就够,才可能,不然力量不够,也不可能。这也要集中精力打歼灭战。

林彪从读马列语录中尝到了甜头,因此他就倡导部队干部战士学习毛主席语录。从指示解放军报每天结合头版头条内容刊登一段毛主席的话,到指示总政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像发武器一样”发给部队每一个干部战士,都是基于他自己学习马列著作的体会,从当时部队文盲成分多,干部战士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出的决定。士兵和老百姓读毛选四卷有困难,读《毛主席语录》就比较容易。《毛主席语录》是林彪发明的现代《论语》。通过它把毛泽东思想普及给全中国人民,应该说是一个创举。

我抄写的读书卡片到了林彪那里,他会先让秘书或内勤念给他听一遍,然后再精挑细选,反复研读。从我每次给他念卡片的情形看,他听得很认真,对感兴趣的卡片会让挑选出来,只有他让选出来“留下”的卡片他才会自己拿着看。常常是,几十张、上百张卡片读完后,留下的不过一二十张。而当林彪戴上老花镜或拿起放大镜用自己的双眼阅读这些卡片的时候,又会扔在地毯上一些。经过这样一遍遍阅读、筛选程序剩下来的卡片常常仅有几张、十来张而已,这才是林彪留着自己反复读的“书”,而“书”中哪些字句是“有用”的,哪些字句是“废话”,他还要甄别。

林彪对他选定的“书”读得很认真,边读边用红油笔在“书”上圈圈画画、勾勾连连。有的句子下面画一条横杠,有的画两条横杠;有的在某个字、词上画一个圆圈,有的画两个圆圈;有时把这一句与那一句用红线连起来,有时也会把这个字与另外一行的那个字用红线连起来;有时还会在卡片上写下心得体会,有时也会把心得体会写在另外的散纸上,或者口述让我们记录下来。

所有林彪读过的卡片,亲笔写的或让我们记录下来的心得体会,叶群都精心整理,妥善保存。

说林彪“不看报,不看文件”确实接近事实,说林彪“不读书”或说他只翻药典,则离实际太远。林彪是个爱读书、善读书、善思考的人,读书贯穿在林彪的日常生活中。

文化大革命前,林彪就拥有私人图书室,有马恩列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文史哲学、释儒兵道、农桑医药等等,各种各类的书籍几千册,都是林彪几十年来读过的。叶群视为珍宝,要我兼管。翻阅这些纸张有些泛黄的书籍,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林彪在书中眉、腰处或扉页上写的读书心得,尤其是在他读过的马列主义著作中,林彪的批语更是密密麻麻,随处可见。这些批语或是所思所得,或是对书中观点、人物、事件的臧否,都胸臆直抒,毫无掩饰。下面列举几例,可以看出林彪读书的态度:

例一,林彪读《共产党宣言》后写道:“论团结的书。以论敌团结起,以论自己团结终。”

例二,林彪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时,感悟团结与斗争的哲学,写道:“斯氏(指斯大林)有错:只斗不团,只团不斗,皆错。”“只斗其坏部分而团其好部分[对一个对象皆当又打(坏部分),又拉(好部分)才对]。”

例三,林彪在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时写道:“为六亿人口衣食住行的满足而斗争,离此则文不对题;党要在增加衣食住的供应上去努力,为民生而奋斗。”“缺粮食,粮食第一。缺啥啥第一”。“一切以能增加生活资料为原则,何方法能达这些目的即用何法。”林彪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称作“为大众主义”,说必须“从大众经济需要上规定政策。”

例四,林彪读《大学》和《四书章句集注》时写道:“孰为大(一)格物——万事之首,不脱离实际,(二)民主——治国之首,不脱离群众”,“政治之本为德”,“德为先,爱民为先”,“爱民并从生产上治国安邦”是“得天下、保天下之总路线。”

例五,林彪读《毛泽东选集》后写了一个“座右铭”:“反热情主义[以此语代替‘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更易警惕些,并代替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等名词]。”

林彪认为“最易不觉得犯的错误是凭热情办

事,把热情当了政策。最重要的是自觉的防犯热情主义的错误,就能保证胜利。”

他说,“斯毛(指斯大林、毛泽东)之区别于人者在凭热情还是不凭热情。”

从以上寥寥数例便可以看出,林彪读书不仅很多,而且不走过场,学而必思,有感必发,有得必录,因而他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很熟悉,常能脱口而出。

“永远健康”的病号

从到林彪身边工作那天起,我就不断从叶群和周围人的口中得到这样的信息:林彪一生转战,受过五次伤(叶群说七次),尤其1938年遭阎锡山匪军冷枪,伤及中枢神经,致使交感神经功能失调,因而怕风怕水怕光怕声响;见林彪不要行礼,不要主动说话,不要快步从身边走过;林彪召见问事,站得不要距他太近,说话声音不要太高,不要啰嗦,谈话时间不要太长;林彪的客厅、卧室平时门窗要关闭严实,他睡觉后要保持环境安静,等等。如此这般,约定俗成,信号逐渐加强,慢慢成为守则,人人严格遵守,连其妻子儿女也不例外。我虽然从未听林彪本人提出过诸如此类的要求,但我发现林彪本人从不反感人们这样做。

在上海太原路住的时候,有一天,林彪告诉我:“你检查一下,是什么声音?”我仔细辨认许久,才听出从卫生间里传出的“咝,咝”声,原来是抽水马桶关闭不严有水漏出来。我看见,林彪显然有些烦躁。

林彪身体最常发生的问题是“出汗”。因为爱出汗,所以常“着凉”,且常伴有低温。林彪“出汗”不分四时、不论昼夜,随时随地都会莫名其妙地出起汗来。每到此时,林彪便会靠在沙发上,微闭双目,一动不动。这时,不管有天大的事他也不听,不论何方神圣来访他也不见,一般两三个钟头以后才会起身重新踱步,或叫内勤来,口述他总结的出汗的“原因”。

下面列举几条林彪20世纪50年代亲自总结的“经验”:

“胡桃吃后背发冷”;

“茶叶吃后膀胱出汗,容易受凉”;

“扁豆吃后着凉,青豆吃后出汗”;

“芝麻吃后感觉不佳,今后禁吃”;“过去能晒太阳时有低温不退,自从吃红豆后有低温能退”;“长春吃猪肉后能减少汗,北京吃猪油能使手心出汗”;“在上海有一次从无光的地点转到有光的地方坐,感觉身上不很冷了,可见光很重要”;“低温时不可刮脸,不可散步(放风),只可穿好衣服起床坐着……”;“勿出城,勿坐车,城内城外,车内车外,冷热相差甚远,最易受病。”

类似这样的“经验”林彪几乎每天都在总结,内勤负责记载的林彪的《病程日志》几乎每天都有类似内容。

除了爱“出汗”之外,林彪另一个常发生的问题就是失眠。他每天上床睡觉前都必须先吃安眠药、打催眠针,否则便不能入睡,往往半夜里还要加服一次,甚至两次安眠药,或者再打一支催眠针才能睡一会儿。他用的安眠药、催眠针剂都是从外国进口的安全有效的速眠类药品,如鲁米那、巴比妥等,但用在林彪身上只有大剂量才管用。

林彪在他的疾病问题上常持唯心主义、片面性态度,不仅使人觉得有些荒诞可笑,而且也使他讳疾忌医,因为无法及时获得有效治疗而常年深受折磨。我曾多次亲眼看见林彪发病时的情景:瘫痪似地坐在那儿,头倚歪在沙发上,双目不睁,面色煞白,嘴唇紧绷,一动不动。如果有人进来,他就微微抬起一只手掌,简单地摇摆一下,示意不要打扰他。遇到这种情况,内勤会及时向叶群和秘书通报,他们便不讲文件、不报事。秘书们谁也不怀疑林彪是无病装病。

林彪不相信医生,也不知道有保健医生在为他服务。保健医生也从不去见林彪。有人说他相信药典,但我给他当内勤两年没有见到他翻过一次药书。我在整理图书时发现,他曾经看过的《药理学》一书中写了不少批注,其中一条写道:“中药不可服,错、对,均无案可查,无经验可用。”这说明林彪也不太相信药书和中药。他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感觉,相信自己的经验。1966年春的一天,林彪说青蛤“止汗”,点名要吃福建漳州一带产的青蛤。韩先楚很快派人给弄来了,林彪只吃了两个就不吃了。他总结“经验”

说,吃青蛤“手背疼”。1968年夏初,林彪连续几天发生不明原因低烧,叶群与保健医生商量,决定给林彪做一次体检,但是无论怎样劝说,林彪就是不去医院。无奈,只好说服他同意请解放军301医院的几位专家来,把X光机等设备搬进毛家湾他的卧室,才做了一次体检。结果表明,林彪身体内部器官并无大的毛病。但是,林彪的表现依然是一副病态。

林彪1938年那次负伤捡回一条命,但却给他留下终身不愈的病痛。林彪的病到底是什么病,我在林办那些年并没有听说哪家医院、哪个医生给下过明确的诊断结论。所谓交感神经功能紊乱只是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解释了林彪为什么对风、声、光、温度等外界刺激反应敏感。保健医生蒋葆生认为林彪有精神病。林立衡也说,叶群曾对她说过,林彪的病是精神系统的病,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精神压力过大造成的,只要辞职,不让他当接班人就会慢慢好起来。林立衡说,为此林彪曾向毛泽东提出辞职,不当接班人,毛泽东不准。

据我观察,林彪用脑过度,入睡困难,睡眠奇少是影响他健康的一大因素,加之清教徒一样极其简单的饮食,且常年不做调剂,造成一定程度的营养不良,也严重影响他的身体健康,以致常年体重不过90来斤,50多岁时就像一个耄耋老人。

在当时的中央和军委领导高层,林彪身体不好不是什么秘密。即使在林彪死后,也没有听毛泽东说过,林彪是没病装病,是韬光养晦。毛泽东、周恩来都十分关心林彪身体,支持他休养调整。

在林办的档案里保存着毛泽东1963年12月14日写给林彪的一封长信,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林彪同志:你的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信尾,毛泽东又写道:“曹操有一首题名《神龟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毛泽东把他亲笔抄写的曹操的《龟虽寿》诗全文寄给林彪:“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幅珍贵的书法作品在林办档案中保存多年,1971年8月8日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叫吴法宪索回转送给了病中的康生。

(下转第58页)

随卫中央领导人的经历

○ 华方治

选调北京

1951年初,军委给华东军区发电报,要在山东的部队中选调排长一名,班级干部和优秀战士55名来北京保卫党中央毛主席。

条件是:25岁以下,家中经过土改,贫雇农成分,党团员,战斗勇敢,立过战功,识普通文字,身体健康。

具体任务下达给华东步兵100师,在全师范围挑选,一个连选一二名。在299团选一名排长,选了七名均不合格,选第八名小董(我们一起当过警卫员),他因结了婚,嫌离家远不愿意,团首长说:“让小华去吧。”我当时在团部侦通队任通讯排排长,别人都体检,我没有做,团副政委和我谈话,说:“组织要挑一部分干部战士到北京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让你去。”又说:“到那里可能装备待遇会高,但你要有思想准备,可能会降职使用。”回到队里,队领导和各排干部一起吃了一顿饭,我们团选的人从驻地大北曲村赶到师部(驻即墨县城),师董政委和保卫科长忙着搞审查工作,师首长请我们吃了一顿好饭,师长政委都讲了话,提了各种要求,晚上坐卡车到城阳火车站,上了火车到济南下车住在山东军区招待所,住了三天,又搞审查,才上火车向北京开去。坐的是装货物、牲口的闷罐车,一股牲口屎味,没有水和厕所,解小便,拉开门缝就撒,解大便可就麻烦了,拉开门两个人拽着拉屎人的手,他撅着屁股朝外,一旦失手就掉到车外去了,幸好一路上只掉了一顶军帽没掉下人去。

车到前门,没人接,因是个星期天,找不到人,在前门呆了三个多小时。

在西交民巷找到了总政治部,通过他们找到中央公安警卫师,师部派李在明参谋带卡车把我们拉到旃坛寺师部。在师部,又搞了四五天审

查,进行了分配,师部警卫连一部分,我和大部分被分配到一团二营。我们进了中南海,到万善殿二营营部,营长邹以孝,是老红军,给我们讲话,讲了几句,就没词了,说:“让你们连长给你们讲吧。”各连领导点完名后领着我们去了各连驻地。

我被分配到二营六连二排任排长,住在怀仁堂西边靠北。

我们连担任居仁堂军委办公厅,迎春堂统战部,庆云堂中宣部和福禄居林伯渠住地,怀仁堂会场,乙、丙区检查站等处任务,从此开始在中南海——中央机关所在地工作生活了近40年,直到离休。

熟悉钻研警卫业务

人民大会堂修建前,中央的大型会议活动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怀仁堂的安全由警卫师一团六连担任,会场设立的一切哨位,都是机枪班担任,机枪班的战士都是1948年前入伍的老兵。那时,怀仁堂会议、宴会、文艺晚会比较多,每周有三五次之多,门口入场时,设一干部(个头要高,五官要好)着便衣,佩带绸缎条,上写“工作人员”,负责验证,进完人后,就到主席台后边,找个椅子坐着,负责主席台安全。

我到六连后,此任务就由我负责。我记得1957年2月27日、3月1日毛主席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了两个半天。周总理做过多次报告,如1951年9月29日给学者教授讲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等。

在门口入场验证时警卫部门的负责人都在场,如治安科陈群海科长,警卫科李树槐科长等。他们看到某首长,或社会名人,都是提前告诉我:“这是×××。”我就不看他的票证了,他们有时热情上前握手问候。当时我就想,他们熟悉那么多人,我为什么不多熟悉一些呢?从这时开

始,我就开始熟悉首长和社会名人,直到1954年当了警卫参谋后,就一直这样做,所以我们警卫参谋中,我的业务属最熟的了。

先熟悉首长。中央常委(当时叫五大书记)都已熟悉。政治局委员,“四副两高”(副总理、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各部部长,军队元帅,大将,上将,部分中、少将,人民团体负责人,文学文艺界名人,社会名人,特赦战犯等。我利用开会时记,一次一二十人,后来发现此法不行,人多了就互相混了,反而记不清了,于是,就采取:1. 一次记五六个;2. 熟悉名而不认人的,重点记他的面貌特征;3. 认识人不知其名的,一对名就记住了。采取自己记,请问别人,到1955年就基本上把上述范围的人都熟悉了,这样就便利工作。对于多数首长,你熟悉了不验他的证,他特别高兴。

熟悉住地、会场、外出随卫的业务。

熟悉中南海(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及外面几处大的住地(如新六所、玉泉山、钓鱼台、大会堂、北戴河)和几处小的首长住地(如东交民巷15、17号,园恩寺街、宽街、米粮库、吉安所、富强胡同等处)。所有这些地方设几个哨,哨兵位置、任务及各处住的兵力,战斗方案,基本上都熟悉或熟记。

解放初期,无系统的成套警卫业务,当时只有《中南海会客住宿制度及规定》和哨兵任务、战斗方案,是书面的,别的什么也没有。

1963年全军学习郭兴福教学法。郭的教学法,主要是实战,根据实际情况训练战士如何处置,体现了灵活、实际。当时常务副团长张荣温,交给我一个任务,怎么把郭兴福的教学法用在我们警卫业务的训练教育上。

我和科长商量,中南海西门分队业务最熟,以西门分队为基础,专门系统研究整理警卫业务和训练方法。经研究,整理出:警卫工作的方针、任务、政策、路线、制度规定,怎样验证及注意事项,如何接待客人及办理会客住宿手续,如何挡车放车,如何接待和处理群众上访,如何抗击坏人及敌人袭击,熟悉及熟记业务,背任务、制度规定、会客住宿批准人名单、电话号码、首长名单(中央常委、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委员、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军

队上将以上)、首长车号,最后,队员们都能熟练地背下来。

当时,全军号召培养各种尖子,我们叫做警卫业务尖子。

经过几个月的训练,这个警卫业务尖子分队给中央办公厅领导和公安部领导及机关干部作了汇报表演,还在公安军作表演比赛,因保密的关系不宜在更大范围表演。

外出随卫,一是熟悉专列车警卫方案、行车、停车及战斗方案,熟悉列车负责人及有关人员。到住地后,熟悉当地的地形及通道,门窗位置,哨位位置,通行办法及有关警卫、服务人员。搞好和列车及当地的警卫服务人员的配合和关系。

后来根据多年积累的经验,参照兄弟部队的教材,参与主持编写了中央警卫团警卫业务教材。这是第一次有了比较系统的警卫业务教材,也是我近40年警卫工作的心得体会的总结。

警卫胡志明主席

1960年夏天,胡志明主席秘密乘飞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

周总理、陈毅、王稼祥到机场迎接。

我被派和马尚志、纪和富同志担任他的安全警卫工作。从机场接回后,住在北戴河中直疗养院西区(原李富春、蔡畅的别墅),东边是周总理住处,前面是彭真住处,早饭后到一浴场与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会谈。



1960年胡志明主席在北戴河与工作人员合影(右一为作者)

一天凌晨，哨兵按响电铃，我在睡梦中被惊醒，急忙穿上衣服跑了出去一问，哨兵说：“客人已向下面去了。”我从树林中小路跑下去寻找客人，因天还黑着，看不见人，一直到海滩，一看胡主席坐在沙滩上，胡主席穿着越南人喜欢穿的黑布裤、白衬衣。

我问了胡主席“早上好”。

胡主席说“好”。

我说：“胡主席这么早就起来了。”

胡主席说：“睡不着。”

我们便聊起了天。胡主席问我：“水字上边加个工，念什么？”

我说：“念‘汞’，水银也叫汞。”

胡主席说：“有道理。”

他又问：“水字上加个石头的石，念什么？”

我答：“念泵，水泵的泵。”

他说：“这个字念法没道理。”又问：“小球藻是怎么回事？”

我说：“这个我说不清楚，只看报纸上报道过。”

他说：“回北京后我想看看。”

他让叫车，我把车叫来。上车后，他说：“去王稼祥家。”我们去了王家，王和夫人还未起床。他和王稼祥夫妇谈了一会话。出来后又去杨尚昆家，杨夫妇也没起床，他们急忙起来，一起交谈，李伯钊同志谈她在苏联学习时的生活。出来后要拜访蔡畅大姐，车又返回到蔡大姐家，李富春和蔡大姐热情欢迎胡主席，一起畅叙。蔡大姐说：“什么时候喝上胡主席的喜酒啊？”胡主席说：“这要你们的帮忙啊。”出来要去东山军委疗养院，到叶剑英元帅的住处，一问，叶没来北戴河。又去聂荣臻元帅处，与聂帅谈了一阵话，便告辞回住地。

下午请了首长的孩子们。我记得有刘少奇家的，朱德家的，王稼祥家的，杨尚昆家的，十多个。准备有糖果饮料，孩子为胡伯伯唱歌跳舞，胡主席高兴地和孩子们玩了半天，还和我们警卫服务人员合了影。

第二天起早去山海关机场，周总理、陈毅、王稼祥去机场送别。

中央领导同志送给胡主席一只熊掌补养身体，因胡主席走得早，没吃得上。头一天夜里，厨

师黄师傅（据说黄给冯玉祥当过厨师）想着要用微火炖熊掌，还得拔毛，一夜没睡。我们接待工作人员从机场回来后，吃早饭时吃了熊掌，这是我头一次吃熊掌，只记得像猪蹄似的，有一股腥味和粘糊糊的感觉，究竟补不补身体，那就知道了。

北戴河暑期警卫

北戴河地处河北省抚宁县（1950年代）。据说，在民国初年，英国工程师甘林，发现此处是块避暑的好地方，开始在这儿建房，供夏天避暑。为了纪念他，将莲花山北边的小山命名为甘林山，从此开始一些富商、官僚和洋人在这里兴建豪华避暑别墅。有段芝贵、张学良、朱启钤、金城银行的别墅，外国人的希腊楼，东山一美国人自修的怪楼等等。当地还形成了顺口溜：“张家楼，段家墙，河东寨的二姑娘。”是说张学良的楼，段家的墙建得豪华漂亮。张学良的楼确实漂亮，房后还有操场、阅兵台，据说是护卫队演练和张学良检阅卫队用的。

解放后，这些房屋统由政府管理，中央首长每年暑期都到北戴河避暑。1950年代，毛主席就住张家楼，后又在楼前专为毛主席建了处别墅，编号为一楼。董必武住段家楼，刘少奇住二楼，周恩来住三号楼，朱德住四号楼，陈云住五号楼。后周总理说刘少奇孩子多把三号楼给刘住，自己搬到西区27楼住了（此楼据说是北洋军阀张绍宗的别墅）。后来，为了加强对北戴河地区的管理，把北戴河地区改为秦皇岛市海滨区。中央这片叫做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疗养院，简称中直疗养院，由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管理局管辖，开始设管理科，后改处。

一、暑期前的准备工作。

我是1954年开始去北戴河工作的，1955年领导确定要我筹划暑期警卫工作，先是制定计划，确定警卫方案：哨位、领班员、机动兵力总数、需要兵力数；确定哪些部队担负此任务；物质准备：便衣、草帽、电话、手电等。

二、前站：由我和后勤一军需员前去。

根据方案与疗养院管理部门商定部队住房、和铺板、办公桌椅、炊具等。

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联系部队油粮副食供

应办法及供点。

与友邻部队联系,商定联络方法及有事时的配合。

各级指挥所位置。

通讯工具及证件的制定。

检查游泳排的训练情况,每年都抽调一部分人组成游泳排,训练划船和水上救护工作,作为暑期首长和工作人员的救护工作。

三、实施:与北京保持联系,迎接和安排暑期部队驻房、设哨、交待和检查任务落实情况,及时处理任务实施中的问题。

1955年毛主席游泳上了渔船与渔民亲切交谈,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担心毛主席的安全。毛主席那天特别高兴,上岸后在东浴场和工作人员合影并请吃饭,那天我因提前回去替值班,很遗憾,照相吃饭没参加。到8月,首长陆续回北京。周总理在北京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很晚才来。毛主席已回北京,突然又回来了。后来知道是在写《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总理休息一段时间也回京了。这时,只留下一中队一部分人,汪东兴和兼团长张耀祠,参谋只我一人,还有军需员侯府文和一通讯员。毛主席每天中午还下海游泳,水温都凉了。直到9月26日才回北京,赶上27日毛主席给元帅授衔,给元帅、将军授勋。

1956年夏天,最早到北戴河的首长有徐特立和刘伯承元帅。一天,刘帅和夫人及孩子在海滩散步,我去随卫,刘帅坐在西浴场休息,刘帅问明我担任的职务后说:“参谋工作很重要,我也做过参谋工作,你们现在的条件很好,我们从前的条件很差啊!”说他和朱德总司令是老乡,他和朱老总为了反满清,都是18岁投军的。他说他刚从苏州到青岛,到青岛遇上有两个人被鲨鱼吃掉了,说他去过好多地方,比较起来还是北戴河这个地方好、安全。

暑期,北戴河浴场外,有巡逻艇负责安全巡逻。毛主席要从岸边游上艇去。相距约有5—6华里。汪东兴局长事先和巡逻艇商量好,风浪不大就游上去,若风浪大,岸上用红白旗左右摇摆,艇就开走。毛主席开始游了。过了一段时间,风浪开始大了。汪东兴说:“华参谋,摇旗!”我高举红白旗摇了起来。巡逻艇看到信号开走了。主席知道巡逻艇开走了,就往岸上游来。上岸后主

席不高兴了。生气地说:“这是汪东兴在和我作对!”当然,主席怎能不知道,这叫人不快的举动,乃是为了他老人家的安全呢。

1960年北戴河中直疗养院有较大的变动,增加了东区,为各省市第一书记建了20余栋小楼,新修了俱乐部,可以演戏放映电影,设舞厅及中小会议室多个。为毛主席在莲花山下建了新别墅95号楼。罗道让局长召集会议,讨论为毛主席别墅定楼号。有人提议毛主席原来房子叫一号,还是叫一号;有人说已经有一号楼了,再叫一号重复了;还有人建议叫100号好记。我提议:要考虑一是好记,二是要便于保密,我的意见是否叫95号。后来采纳我的意见,定为95号楼。

1960年暑期,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北戴河浴场。早晨发现尼龙防鲨鱼网缠在一个角落里。一拽拽了一条已死的大鲨鱼,一米半多长。据分析,可能是夜间鲨鱼靠岸觅食撞在防鲨鱼网上,越缠越出不来,最后死在里面。当时,中央正在北戴河召开一个会议。把鲨鱼用一大澡盆盛着放在会议一个入口处,让与会首长观看。晚上又放在舞厅门口,让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看看。像这样大的鲨鱼定会对人造成致命的伤害。

我去北戴河工作和打前站,1954、1955、1956、1957、1960、1962年共六个暑期,其中随专列往返北京、北戴河多次。1955年还随卫邓小平、董必武、陈毅、张鼎丞、徐特立等首长去山海关、秦皇岛参观游览。山海关城楼上的说明是文言文,徐老给大家作讲解。1950年代山海关的汽水很出名,当时地方上拿出很多汽水供大家喝,因去了很多孩子,汽水喝了很多,陈老总风趣地说:“我们这是打歼灭战啊!”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是一拨蝗虫。”

由于多次去北戴河工作,对中直疗养院的地形道路、首长住的楼号及部队住地哨位和任务都熟记在脑子里。

毛主席水性好,可以在水里游上几个小时。虽然他不讲究什么姿势,但他能在水面上躺着休息。首长中游泳技术最好的是杨尚昆主任(那时他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他从中直浴场可以一直游到金山嘴再游回来,有10多华里;首长的夫人中游泳最好的是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大姐,她也能向金山嘴游;再就是王光美大姐,游的姿势好,又游



1983年金日成访问旅顺时作者(左一)和朝方护卫局金副局长(左二)去打前站,在“中苏友谊纪念塔”前合影。

得远;对于游泳技术好,又距离远的首长,我们都派二三个游泳技术最好的干部队员陪游保护。

周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南京、杭州警卫纪事

1960年12月,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宾努首相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陪同到南京、杭州参观。

我和三中队范廷山等同志专车随卫,专列从北京开出经天津、济南时,当地军政首长均到车站迎送。过长江时,当时长江无铁桥,火车用轮渡过江。到达南京时还有群众在车站热烈欢迎。参观了总统府、中山陵,还游览了玄武湖。在参观中山陵返回下坡的路上,周总理问几个参观女青年是哪里人时,女青年回答:“是淮安的。”总理高兴地说:“噢,我们是小老乡啊。”又说:“淮安从前叫淮城。”于是要和她们合影留念,西哈努克亲王已走出几十米远了,问:“是怎么回事?”经翻译说明情况时,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宾努首相夫妇都返回来要与总理的老乡合影,大家的情绪到了高潮,几个女青年有说不出的幸运心情。

在参观南京无线电厂时,受到了全厂干部工人的热情欢迎,周总理给广大职工讲话,他要求大家努力钻研,提高产品数量和质量,他特别要求广大工人、技术人员研究一下提高灯泡的质量,美国的灯泡能用2000多个小时,而我们生产的灯泡只能用二三百个小时,这是很大的浪费。他说,将这件事作为一项任务交给你们。

江苏省政府宴请贵宾时,上菜较多。在离开南京的列车上,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召开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对浪费现象提出了批评。周总理说:“在我的车厢,服务员给我泡了茶,我到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首相车厢时又分别给我泡了两杯,有的只喝了一口,有的根本没喝,这不是浪费?要不把我车厢的茶杯端过去也好嘛。”又说:“我一个总理浪费不了多少,但这是个风气。”接着批评了南京宴会上的菜太多。陈毅副总理风趣地批评说:“不行端上一大盆大杂烩!”

到杭州,参观了灵隐寺、龙井及龙井茶生产大队,观看了茶圃和社员采茶,请外宾和陪同人员喝了龙井水泡的龙井茶。参观了岳飞墓和六和塔。晚上周总理陪同客人观看盖叫天演出的京剧。当时盖叫天已经70多岁的人了,从桌子翻跟斗跳下来的高难度动作,足以证明盖老先生功夫之深。还乘船畅游了西湖。

杭州参观后,客人乘飞机返国,总理坐飞机回北京,我们工作人员乘专列回京。

邓小平胡耀邦出行的两次随卫

一、在大连会晤金日成

1983年8月14—21日,金日成秘密来华,邓小平、胡耀邦乘专列从北京去大连,在棒槌岛宾馆与金日成会晤。朝方还有吴振宇大将。晚上散步时,跑出一蛤蟆,金日成用中国话问:“这叫什么?”我答:“叫蛤蟆。”金又重复了一句“蛤蟆”。会晤完后邓小平陪金日成去海域。又从旅顺海军基地乘船游了近海,从海上观看了大连的市容。为此任务,时任海军司令员刘华清专程来旅顺接待。看到宾馆女服务员,个个细高个,我对陪同的大连市市委书记、市长笑说:“大个姑娘都长到你们大连了。”书记说:“我们大连是你们山东的殖民地。”又说:“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从山东来的。”也是,大连人说话的口音

我知道的三反与肃反

○ 晏乐斌

三反运动

1952年3月31日,我结束了在湖南资兴县和广东钦州专区(现属广西)的土地改革回到汉口的工作机关——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执行处。机关里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三反运动。我们这个处与钱、财、物接触的人要多一些,被列为三反重点之一,派来了由中南公安干部学校副校长王泽民(我刚参军时就分配在这所学校学习)和中南公安部二处一位姓张的副处长率领的三反工作组,到我们处里开展三反工作。三反的重点实际是抓“老虎”,已逮捕关押了我所在的行政科的科长雷志宝,隔离审查了第一犯人伙房司务长王德凯,第二犯人伙房司务长彭生长,生产科长张玉阶,看守员车轩富,审查了干部伙房司务长郭文、行政科采购员王来运,撤销了我们处长李子惠的职务。在一次斗争王德凯同志的会上,有人追问他贪污了犯人伙房多少钱财?王说:“我没有贪污公家一分一毫的钱财,我母亲从小就教育我老老实做人,怎么还贪污公家的财物!”卫生所护士邓喜文追问:“王德凯你是听党的话,还是听你妈的话?”王回答:“我听党的话,也听我妈的话。”邓又说:“放屁,听你妈的话。”他一上来就让王跪在一条板凳上,接着追问,王答非所问,邓喜文上来将王跪的板凳踢倒,王摔倒在地上,鼻子与头部撞的鲜血直流,站不起来,又有人说他装死,用脚踢

和烟台、蓬莱一个味。后又于8月21日去海城参观了一大化工厂,完后邓、胡送金日成乘专列回朝鲜,邓小平、胡耀邦坐专列回北京。此次外出一切安全顺利。

二、参观东陵

1983年8月22日,邓小平、胡耀邦参观清东陵,我带七中队的同志去警卫。专列从北京出发到遵

他,接着继续批斗,令其交代问题。就这样轮番地对他刑讯逼供,批斗、折磨了大半天,王一直坚持他没有贪污。

4月初的一天,组织上令我与派到我们处里来开展三反运动的工作组成员、中南公安干部学校的陈丹炼(陈与我是一同从湖南岳阳县参军的学生,同时被分配在中南公安干校学习,后他留校工作),到汉口一些商店,调查采购员王来运是否有贪污、吃回扣问题。在路上闲谈中,对他谈起了我昨夜做了一个怪梦,说我在大雪纷飞的地方放羊,冷得发抖而冻醒。就讲了这么一个情节,回到机关后,陈丹炼却为此编造了一个故事,向王校长汇报说:“晏乐斌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贪污判刑,在新疆劳改队里下雪天放羊。”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陈讲的是真的,怀疑我有贪污问题,晚上还做噩梦,知道情况的王校长对陈丹炼的汇报付之一笑,说:“你不要说了,晏乐斌前几天刚从参加土改的地方回到机关,哪有什么做梦劳改?”

几天后,我从执行处预算科看守员夏仁义的宿舍门前经过,在夏的宿舍里我们行政科犯人第二伙房司务长彭生长同志叫住了我,我便进入这间房,彭问我何时从土改工作队回来的?彭刚说这一番话时,夏仁义走了进来,问我到这里来干什么?是不是同彭生长通风报信,互相勾结?我说不干什么,老彭问我何时从土改工作队回来的。他不信,这样我便离开这间房了。当时我不知道彭生长被隔离审查,误进了他被隔离的地

化县城停下,次日早饭后,乘汽车去马兰峪参观东陵。我记得孝陵规模大,乾隆陵石雕最漂亮,慈禧的陵都开了,还有香妃陵较小,也开放,在乾隆陵侧。

中午吃野餐,后又乘汽车到遵化城坐专列回北京。■

(作者曾任中央警卫团常务副团长)

(责任编辑 黄 钟)

方。第二天预审科的预审员刘建中张贴了一张“内奸分子晏乐斌”的大字报，把我与彭生长“相勾结”，与他“通风报信”的“事”写在大字报上。这是我参加工作一年多以来第一次蒙受不白之冤。对此，当时的组织审查了我一段时间，好在当时的组织与领导公正、公平，实事求是地对待了我。

那时的三反运动有一点乱箭齐发，凡是与经济、财物有接触的人，都被列为贪污嫌疑、审查对象，我们执行处是预审、关押在押人员的场所，与经济、财物打交道，又新建了一栋办公楼，所以被列为三反重点单位。1952年7月三反结束时，被逮捕、隔离审查的8人，没有发现一人有贪污等问题，还他们以清白，全部解除了对他们的审查。

当时中南公安部有200多名工作人员，三反运动中有几十个被审查，逮捕8人，逼死7人，运动结束没有查出一个真正的贪污分子。在被审查撤职的人中，有我们的部长卜盛光（原是抗日时的129师保卫部长），工作认真负责，在镇反运动中是全国有名的功臣，但生活作风不够检点，有男女关系问题，三反一开始被撤职，新闻媒体公布后，引起了国内外极大震动与反响，后被降职调任武汉钢铁公司副总经理。80年代，他三反中的问题，在邓小平干预下为其恢复了名誉。我们的副部长钱益民原是四野战军保卫部长，1950年调任中南公安部副部长，三反开始后，他任四野保卫部长时的秘书苏烈，从部队向中南公安部写诬告信，诬陷钱在解放天津时贪污黄金。为此，钱被撤职查办。后经查实，为诬告陷害，为其恢复名誉，调任湖北省法院副院长。政治保卫处境外调研科科长张一萍，抗美援朝时因挪用过科里同志们的捐款40多万元（旧币一万元为后来的新币一元），算作贪污，由我们的副部长文敏生以“人民革命法庭”的名义，宣判张一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三反结束复查，系挪用，而不是贪污，为其纠正，恢复名誉，后分配在武汉市一个劳改单位工作。

内部清理、肃反运动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出席了会议。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指示和批示，

于4月3日晚，由公安部长罗瑞卿带人执行，在北京饭店以“内奸、特务、反革命”罪名，逮捕了潘汉年。4月12日，又以“包庇坏人，反革命”罪，逮捕了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经毛泽东批准，5月18日，由公安部执行，逮捕了胡风。从此，拉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掀起的内部清理、肃反运动的序幕。这一运动历时5年，直到1960年结束，据我的同事丁明清（化名）同志提供的数据，全国共审查、清理了625万人。

当时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公安部全面地展开了内部清理、内部肃反运动，像筛子一样，对全部工作人员进行了审查清理，其中重点审查了60多人，我所在的劳改局就有裴嘉、夏冰夫妇、龙继和、卞剑锋、郭正纯、役儒、吴祖森等8人被重点审查。

郭正纯，河南洛阳人，曾在旧政权洛阳专署下属一个县法院当过书记员，当地解放，被新政权留下工作时，他将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作了交代。1949年初随部队南下到武汉市被分配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1953年他和妻子吕佩珍与我同在一个处工作。1954年7月中南大区撤销后，我们同调北京中央公安部劳改局工作。1955年内部肃反开始后，他被隔离审查，追查他的历史问题，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1956年夫妻二人调青海省农垦厅（农垦厅与省公安厅劳改局合署办公）工作。“文革”开始，定为“国民党残渣余孽”，开除公职，与其妻吕佩珍，遣送回原籍河南洛阳，交群众监督改造，后被迫害致死，其妻吕佩珍疯了。

卞剑锋，江苏武进县人，1949年前在武进县中学曾集体加入过三青团，1949年10月进入无锡市江苏省江南公安干部学校学习，1950年初分配到公安部劳改局工作，内部清理时，隔离追查他“三青团骨干”的问题，轮番对其追逼，他不堪忍受，跳楼自杀，摔成残废，送当时的公安部公安医院（现为北京复兴医院）治疗四五个月，后痛死在该医院。

吴祖森，福建人，劳改局农业处干部，他在原籍上中学时加入三青团，内部清理、肃反开始后，被隔离审查，追查其“三青团区队长”问题，查无结果，调出公安部，后分配到河北省承德地区一个农场。

龙继和，四川人，原在南京中央大学学习，1949年参加工作，后在西南公安部工作，1954年大区撤销后，调北京，分在公安部劳改局与我同

一个单位,1955年内部清理、肃反开始后,隔离审查,追逼他参加“三青团”问题,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但一直不信任他。

役儒,原在广东省公安机关工作,1954年上半年调到中南公安部,同年7月,我们同调公安部,他被分配在公安部政治部工作。内部清理、肃反开始,将他列为“国民党特务嫌疑”审查。他原名徐文硕,原籍吉林长春人,从小由外祖父母抚养成长,有一位舅父在共产党根据地佳木斯市工作,他便前往投奔舅父参加工作。1948年解放军占领长春前,他父母对共产党不了解,又害怕,便举家南迁到北京。就因为“他父母全家南迁,唯独他一人前往解放区”,故而怀疑他是“国民党派遣特务”,受到审查。当时的公安部政治部曾派殷奇同志等二人前往佳木斯、广东省等地调查,查无实据,组织作出结论:“查无实据,予以否定”,后调我们劳改局挂起来,不受信任。1957年公安部整风、反右运动结束后,12月23日,将他与刚从河南省调到北京的妻子张淑曾,同我们一起下放到河北南皮县城关乡翟官屯村高级农业社,“劳动锻炼”了一年后,他与其妻被调出公安部。分配到石家庄市河北省人民医院工作。

裴嘉、夏冰夫妇,抗战时期,曾被党组织派遣打入日本情报机关内部,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二人先是由组织分配到华北公安部工作,1954年大区撤销后,又调公安部,可是公安部组织不信任他们,怀疑二人是“叛徒、特务嫌疑”,调到劳改局。内部清理、肃反开始后,劳改局隔离审查他们二人,由该局李中秀、陈守达同志负责他们的专案,但查无实据,不了了之。1956年将二人调往高寒地区的青海省公安厅劳改局所属八宝劳改农场。农场受上面的指示,继续审查他们,夏冰不堪党组织长期对他们的不信任和审查,后忧郁而死。妻子死后,裴嘉孤苦伶仃一人,艰难度日,并一直为他们夫妻的遭遇向组织申诉,要求对他们的问题做出结论,结束审查,以正名分。当地组织以“无理取闹”的罪名,对其作出“劳动教养三年”的决定,他听说之后,上吊自杀身亡。这对夫妻离开了这个可怕的人世。

于直,马来亚华侨,抗战时期满腔热忱回到祖国,投入到新四军从事文艺工作。建国初,他被调入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政治保卫处从事

侦察工作。1954年7月,大区撤销后,他与我们一同调中央公安部。他分在公安部政治保卫局。1955年内部清理、肃反运动后,党组织将他作为“外国间谍”隔离审查,审查近二年,毫无结果,不了了之。1957年3月,发配到贵州,后分在贵阳市一个街道办的工厂工作。80年代中期,与他同在政治保卫局工作的张镇同志到贵州出差时,通过多方查找,找到了于直。到他家里去看望,只见家徒四壁,破烂不堪,生活十分艰难、凄惨。对张镇同志谈起这几十年的遭遇,于直夫妻俩都痛哭流涕、泣不成声。

以上这些人的遭遇,就是当时内部清理、肃反的现状。可是号称中共中央第一支笔、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却把内部清理、肃反的错误当成成绩、政绩来宣扬、歌颂。朱正先生发表在2011年11月号《炎黄春秋》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读后》一文中说:《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发表的胡乔木撰写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60~569页),为肃反运动辩护。这真是一篇只有文章高手才写得出的文字,能够把缺点和偏差解释为成绩。这篇社论列举了四项“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的成绩”,第三项是这样说的:“在肃反运动中,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这就是说,130多万人肃反对象写出了并非反革命分子的定案材料。在给这130多万人做出并非反革命分子的结论之前,必定都曾经立案审查……这些人在经过坦白交代、清算斗争、内查外调等等这一系列必经的程序之后,他还是够不上定案为一名反革命分子。所以,肃反运动对于这130多万人肃反对象来说,是肃错了。■

(作者为公安部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黄钟)

启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邮政编码:102488 收款人:崔秀岭

父亲汤用彤的矛盾心态

○ 汤一介

1952年,全国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由沙滩搬到了西郊原燕京大学的校址。父亲身为副校长当然得随校搬迁。但据我了解,他和我母亲一样都不想搬迁,他们都喜欢独门独户的小院,宁静、安详。可父亲一向“明哲保身”,逆来顺受。学校要他搬到新址北大燕南园,他就只身先搬去了,但我们全家仍然留在了靠近北海公园的小石作胡同。父亲想着也许等迁校完成,我们可以再回到小石作。是年,暑假后,北大派两辆卡车来小石作帮忙搬家,我父亲没有同来。派来的人要我母亲爬上后车箱,母亲大哭大闹说:“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爬上去,你们还有心肝吗?”来人和司机无法,只得让她坐在卡车的副座。这件事给我父亲留下了深深的歉意。他知道,不搬到西郊是不可能的,不能违背组织的决定;但对母亲亲手修缮的房子和院子的情感能无动于衷吗?父亲在两者之间选择了服从组织的决定,而心中一直对母亲抱有歉意。

搬到燕园后,校长要分工,当然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的父亲是不适宜主持教学、科研和人事等方面工作的,于是就分配他管搬迁后的“基建”。由于要按照苏联模式办大学,所以自1952年起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学生的数量大大增加,教室、宿舍当然不够用,所以要修建新房。父亲既然还有副校长的头衔,总得分个工作,于是组织上就让他管基建。因为是组织上分配的,从父亲的性格来说,他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接受了。于是,人们每天上午常见他拄着拐杖,或由他的副手化学家张龙翔教授,或由秘书、工友陪着,到处走走看看。然后回家吃中饭,小睡一下,又出发。这样的生活似是悠哉,但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想的也许是,能不能写完《隋唐佛教史》?完成他《魏晋玄学》一书?或者是希望免去他的“副校长”职务?父亲没有对我说过他内心所想,这些都是我今天无根据的猜

测。因为他一生都是奉行“明哲保身”,不想让组织上认为他想“索取”什么。但我从他每日沉默寡言,无所事事的状态,感到他内心的矛盾与苦恼。

话又说回来了,在1948年底,他本有两种选择,一是南下,因为傅斯年先生一直想聘请他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他从未同意。他深知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无能治国,垮台是早晚的事。他常吟诵《桃花扇》的《哀江南》中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表现着他的心情。二是留在北平。父亲留在北平是由我们地下党的大量工作促成的。我想,汪子嵩同志的作用最大,这其中有一插曲。在1948年12月解放军快要围城的时候,我的一位很熟的同学陆钦筠忽然找我。他说:受地下党的领导人何正木委托他向我父亲说,快围城了,也许战火可能在北平打响,他劝我们全家到解放区正定躲一躲,闻一多的家属全在那儿。我父亲想想回答说:现在国民党要垮台了,共产党马上就要胜利了,因此,我不能去解放区,但我会留在北平不走。这是父亲当时的心态。当时我对这段话,没有理解,今天想想也许“此中有深意,欲辩已忘言”了。

父亲虽对政治毫无兴趣,他深知贪污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根本不可能把中国治理好,对中国共产党却无所了解,而且心存疑虑。解放后,由于事实使他思想有了转变:一是毛泽东主席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觉得中国有希望了。二是,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的清廉自律,使他颇敬佩。三是,他读了一点马列的书,特别是英文本的《反杜林论》,曾对我说:“这本书讨论了许多哲学问题,值得深思。”此前,他也许读过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日丹诺夫的《在西方哲学史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觉得把哲学问题简单化了。这些他亲身

感受到的事情或许对他的为人为事发生了影响。后来,我看到北大党委给中宣部的报告中说:汤用彤的思想有所变化,不同程度克服了他的“明哲保身的态度”。

事情往往不是直线的,总会有曲折。1951年,在中国大地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劫难逃的劫数。当然北大每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必须在无产阶级(共产党)燃烧起来的炼狱中经受考验。父亲作为旧北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一自然要被置于“洗澡”、“割掉资产阶级的尾巴”、“脱胎换骨”的批判。这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共产党指引的政策中的群众运动自然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有指导的群众运动摧残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平时,父亲很少和我谈话,有一天他参加了一场批判会,回来后他沉默着,思考着,忽然他对我说:“不应这样对待一位老教授。今天我去太庙参加批判工学院的老教授,大家围成一圈让这位老教授站在中间,在各种辱骂的批判声中,大家把老教授推来推去,推倒在地。我看着,心里十分难过,中国人的‘不忍之心’还有没有了?”正因为由于“极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使我的父亲又陷入矛盾之中。但他的为人很少臧否人物,议论时事,以“明哲保身”为重。

自1950年下半年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一波一波地进行,持续下去,起初对他还没有什么大影响。直到1954年批判胡适,对他震动颇大。父亲一向对政治无兴趣,和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们很少来往。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一部分参加国民党,一部分是反对国民党的民主党派(如民盟等)人士和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曾邀请父亲参加“民盟”,他一口拒绝,并说:“教授只是应该教好书,政治是政客的事。”但是批判胡适,他是躲不掉的,一日由人民日报召集一些学者参加批判胡适的会,父亲也被邀请与会。据张岱年先生说:父亲的发言较长,但忽然他把桌上的酒杯打泼了,就没再发言下去,并由郑昕教授送他回家。我们把他送上床睡觉,但母亲觉得他神情不对,就请校医院的医生来看,而医生来时他已昏迷不醒,一早送入协和,诊断为重度脑“中

风”。经过一月治疗,终于清醒。在我另一文中说到,此次重病或可谓为“不幸”之“大幸”。“不幸”是自此以后,由于身体原因,他所念的《隋唐佛教史》最终没有完成。所幸的是他在此之后可以不再参加各种受到折磨和痛苦的“运动”和“会议”,此后,他连一次“政协”和“人大”的会议都未出席过。这样他反而可以有点时间看看书,写点短小的“札记”。正如老子所说,“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吧!

“批判胡适”为什么会使父亲有如此大的反应,我猜想或与应该如何办好北大有关。父亲的办学理念大体上是继承着严复、蔡元培和胡适的路子。在1948年12月14日胡适去南京前留一便笺给汤用彤、郑天挺谓:“今早及中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方,决不忘掉北大。”于5月17日他又单独给父亲一封电报:“……筹划空运同人事……请与梅(贻琦)袁(同礼)二校长切实主持……此次在校庆前夕远离同人,万分惭愧。”这两电报有促我父亲南下意,如不走,也有希望他尽力维持北大传统意。但解放后,经院系调整,全盘学习苏联,他自知能力有限,要想维持北大传统是根本无望。因此,在1949年5月13日由叶剑英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父亲为“北京



汤用彤为归国志愿军签名留念

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时，他说了一句话：“还是集体领导为好”，且在会议中和会后都有校务委员提出：汤用彤任主席不合适；因为他与胡适过往密切，没有参加反蒋民主党派。对于“明哲保身”的父亲，他乐得大事都听从党的安排，小事有时也说点“违心”或“半违心”的话，但有时也说点“真心话”，如1957年在科学院学部会议上的发言。总之，小事出来讲讲，奉命应景时也写点短文：如“批判《武训传》”、“反浪费”、“鼓励同学去修十三陵水库”以及代表

学校在一些会议上的致辞等等。所有这些父亲当时是如何想，他都没有和我谈过。我猜想，他认为我是中共党员，有些想法是不能对我讲的。我向组织汇报了对他、对我都于情于理有违。

1956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所松动，周总理在广州讲话说，要重视知识分子，为他们创造发挥才能和智慧的条件，这时父亲的身体渐好，于是为他配备了两名学术研究助手。但是，1957年党提出“整风运动”，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原来民主党派的领导层以及一些民主人士，对党的领导提出不少意见。有些记者访问他，他都以身体不好谢绝了。有一天父亲拿出《诗经》找出两句话：“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他问乐黛云：“你说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乐黛云一时茫然，答不出来。父亲说：“你是中文系的，连这两句话都不懂！”乐黛云查查书，渐渐懂了，知“其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了。

1957年5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会议，父亲因身体原因没有参加，但他有一书面发言，此发言全文已找不到，只是在《光明日报》（1957年5月28日）上有一发言摘要。《光明日报》以《改善科学院与高等学校的关系》作为书面发言的标题。内容主要谈不应把“教学”与“科研”分开，认为科学院是搞“科研”的机构；高等院校只是搞“教学”的机构。这样不仅不能提高高校的



汤用彤与孙子汤双在一起

教学质量，也不利于为“科研”的后续力量培养合格人才。他说：过去科学院在推动我国科学文化工作上虽然起了一些作用，但我认为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错误和缺点，其中之一就是科学院、高等学院和生产部门的关系上有着很大的隔阂，造成这种隔阂的主要原因就是本位主义（实质上是宗派主义）的思想。父亲特别提出把原来稍具规模的高校，经过院系调整、学习苏联高校的一套东扯西拉地拆散了，实际上对大学教育是有害无益的。对这一点，我认为父亲是想到

北大，因为北大自蔡元培、经过蒋梦麟到胡适确实已“稍具规模”，并形成一定的“教学”与“科研”并重的传统。因而在如何办好北京大学问题上，作为在院系调整后有职无权的副校长，这样把北大办下去，内心总觉得很可惜，故其心态常处于矛盾之中，对应如何办教育他是有些想法的，但时机不对，无力回天，真可谓“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偶尔，我读到于光远同志的一篇短文，文中说：“怀念母校是个普遍现象。人老了更觉得青年时代之可贵。不过现在我怀念清华，是同自己的教育观点有关。我是一个‘今不如昔’论者，但坦白说，如果我是一个要上大学的学生，要我在旧时和现时的清华中进行选择，我毫不迟疑地选择前者。”（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10日第七版）我为什么写那篇《我在沙滩的北大和未名湖的北大》？（见《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版）和光远同志一样，我更喜欢沙滩北大。认为“大学”应是引导学生追求真理的地方，而不应是为什么“政治”服务的地方。我想，这也许是众多知识分子对现实教育不满的根本原因。逝者长已矣，来者犹可追，我们得有耐心等待着教育春天的到来，那时父亲心中的矛盾或可释然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红色福尔摩斯”布鲁的遭遇

○ 吕 璞

从一只手掌说起

2013年10月齐心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纪念习仲勋同志百年诞辰的文章,文中写到1944年他们结婚时,“时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布鲁同志,还为我和仲勋拍了两张照片”。这使我又想起了我丈夫布鲁。

我是在1938年1月来到延安的。在陕北公学学习三个月就被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延安保安处)发展为秘密侦察员,联系人正是保安处侦察科科长布鲁。同年7月,我正式调入保安处,在保安处第一期侦察情报干部训练班(又称七里铺特训班)学习。这是保安处第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知识青年,改变了保安处清一色的工农干部和几个地下党的干部状况。

参加七里铺学习的共30多人,其中有8个女生。由布鲁领导的特训班教员都由他骑着马去请,当时给我们讲课的有陈云、李富春、李克农、潘汉年、刘鼎、邓发等。领导讲课,没有讲稿,都是通过自身的地下工作经历讲述。如果领导同志有事不能来,布鲁就随时顶上。布鲁讲到他在1926年入党,1928年被敌人追捕,逃到海外,在马来西亚共产党中国支部领导下担任纠察总队队长期间,一次马共中央派他诛除原新加坡区委书记、大叛徒李锦标,临行时在住所检查自制炸弹,突然有人敲门,他一回头,碰到了引信,引爆炸弹,他顿时被炸得晕死过去。在敌人控制的医院里,切除了他伤势十分严重的左手掌。警方人员见布鲁苏醒过来,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青年,却表现出坚定沉着、机智勇敢的气魄,一口咬定自己是被人扔的炸弹误伤。因为制造工具在另外的地方,警察找不到自制炸弹的工具,他在公开的法庭上理直气壮地要求警方捉拿凶手,为他报仇。当时,法庭旁听席上有地下党的同志、工

友,听到布鲁巧妙、强硬的辩解,无不暗喜称赞。

当时我们特训班的同学正是20岁左右的年纪,听布鲁的讲述,受到深刻的教育,都很佩服这位无名英雄。因为平时他总把左手插进左口袋,周围的人并不知道他没有左手,当他伸出左臂,看到他没有手时,在场的人无不大吃一惊,有的女生还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不幸得很,这一只手的英雄业绩却成为党内“左”倾陷害布鲁一辈子的把柄。首先在1943年康生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时,就怀疑布鲁的一只手是“王佐断臂,是敌人的苦肉计”,撤销了他时任的保卫部长职务,下放到绥德。在那里,布鲁幸运地遇到了地委书记习仲勋,及早地把他解放出来,并留他担任绥德保安处处长和地委委员。

然而,“一只手”的遭遇并未结束。1951年初,布鲁又成了“王佐断臂”“英国间谍”类的敌人。首先是撤了他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的职务(变成第一副局长),第二年初(1951年1月24日深夜)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到广州将他和公安局副局长陈坤突然羁押,27日押送北京,正式逮捕。我、陈坤的妻子和孩子同时押送北京,住在前门城墙下一个破烂的骡马小店,等待发落。同时,在广州因“两陈(布鲁即陈泊)案”而被捕的达700多人,一时间震惊了华南及全国公安系统。1952年习仲勋调北京工作,我去习仲勋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家哭问布鲁的问题,我尚未开口,他就说:“英国间谍,见鬼啰!”(当时新加坡是英属殖民地)然而到了1953年,在布鲁的判决书上却没有了这一只手的问题,而成了“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严重违法乱纪,致使党和国家遭受严重损失。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81年5月,公安部在布鲁平反追悼会的悼词上明确写着“……1927年在海口和1931年在新加坡被国民党反动派、英属殖民地当局两次追捕,在敌人面前,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在法庭



布 鲁

上和敌人牢狱中,斗争坚决,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在地下工作期间,布鲁同志英勇斗争,机智勇敢,不怕牺牲。他曾接受组织命令,执行消灭大叛徒任务,因使用炸弹,不慎将自己的左掌左眼炸伤,断去左掌。在造成终身残疾的情况下,长期为党艰苦工作……”直到这时,才把颠倒了30年的历史翻转过来。

红色福尔摩斯

1936年夏,布鲁从上海调往延安。途经西安时,博古看到布鲁的档案,知道他在上海地下党办过油印小报,主要是画报头和刻蜡版,同时卖报,于是就将布鲁留在西安,和李一氓、陈克寒三人为“红中社”(新华社前身)工作。布鲁主要是画报头,刻蜡版。1936年底,他们就撤回延安。布鲁在“红大”(后改为“抗大”)学习半年后,调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从事党的锄奸保卫工作。

布鲁在延安九年,东北三年,江西半年,广州一年,都从事公安保卫工作,除延安外,都是接管大城市负责入城治安工作。布鲁是叶剑英从江西第一书记陈正人手中要到广州担任广州市首任公安局长、市委常委(副省级),在广州,其敌情

之复杂,治安之混乱,各种谣言之多,土匪(包括政治土匪)之猖獗,反动会道门的惑众以及流氓、偷盗、地下钱庄等等,工作之累,可想而知。在那些年里,布鲁领导着同志们出生入死,日夜拼搏,侦破的各种案件和缴获的枪支弹药、秘密电台等不计其数。布鲁还亲自在对敌斗争第一线破获了多起重大的难以破获的复杂案件,平反了一些难以平反的大案要案。

1939年,布鲁冒充国民党军统特派员,巡视延安军统特务组织,获取到延安国民党县党部在延安进行特务活动的重要材料。这一行动虽然受到康生的批评,但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方以此为依据,将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公开设立的县党部赶出了边区。当时延安县党部书记高正干不甘败走,进行反抗,说他们是奉公守法的。布鲁的副手王范随即拿出了那份特务活动材料,铁证如山,高正干大吃一惊,无言以对,只好乖乖低头,灰溜溜地离开了边区。

1941—1942年,军统头目戴笠将在汉中培训的一至九期军统训练班特务打入边区(延安最多),布鲁得到这一情报后,亲自领导、周密安排,将56个特务一网打尽,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1941年在关中边境,胡宗南部队的一个团长非常反动,经常率其部下蚕食关中边区村镇。干掉他,虽然痛快,但又会留下其他方面的隐患,布鲁只好采取迂回的方式。利用统战关系,定期约他饮酒谈天,见面后,不谈政治,没有正经话题,而是故意鬼鬼祟祟。这一举动不仅让他的同党及部下起疑,也引起上司的怀疑,不久将其调回西安。

1942年,布鲁率延安保安处工作组巡视,来到陇东的庆阳,此前这里发生了一件事——县民政科长为掩盖自己贪污巨额公款的罪行,栽赃乡文书盗窃,并拿出一封乡文书写给一个特务头子的信。县保安科鉴定此信笔迹确实是乡文书所写,就以特务与盗窃罪将乡文书抓了起来。布鲁通过分析,反复验证,终于弄清是县民政科长诱骗乡文书写一封亲笔信,用烟头烧掉一些字,使外人怀疑是给敌人送情报,从而达到陷害他的目的。真正的贪污犯县民政科长被抓捕了,受害者被关了一年多,出狱不久就病死了。为此,陇东专区召开了几千人的大会,进行平反追悼。本来头年才解放的庆阳群众对共产党不甚了解,对受

害者深表同情,开了大会,才深切感到共产党就是比国民党好。后来边区政府文艺工作者李建玲将此事件改写成秦腔准备上演,那时正是“抢救运动”期间,康生害怕引起要平反的连锁反应,就命令停止上演。

1944年,布鲁担任绥德专区保安处处长时,习仲勋书记给了布鲁一个任务,要他搞清在头年“抢救运动”中,绥德师范发生的杨典(教务主任)遭暗杀未遂和黑头帖子(即匿名信)案。具有丰富经验的布鲁,经过仔细调查和思考,并对打杨典的那块石头当着杨典的面亲身试验,证明杨典是自己打自己。再看那个黑头帖子,上面写的是“精兵简政要民主”,内容并不反动。但是谁有这个要求呢?学校的勤杂工,不存在被精简的问题,学生更没有这个要求;教职员中,是党员不存在这个问题,还有四个教职员不是党员,其中就包括教务主任杨典。杨典是从敌占区来的,这段历史无人证明,所以暂时入不了党。于是,布鲁就在社会上找了四个善于辨字的老秀才。黑头帖子虽然只有几个字,但勾勾画画中总有本人的笔迹。四个老秀才经过反反复复的对照,于是真相大白——写黑头帖子的不是别人,正是杨典。

那么如何处理杨典呢?保安处的同志都认为,杨典在抢救运动中躲避受审查,制造假象,转移目标,破坏运动,应当抓起来判刑。布鲁却不同意这种处理方法,认为黑头帖子的内容并不反动,自己打自己是想达到入党的个人目的。与此同时,当时在此案中担任一些任务的我,又到绥师领导那里了解杨典的平时表现。领导介绍说,杨典在学校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在师生中印象是好的,这次交代也是诚恳的,在检查中还痛哭流涕地后悔不已。布鲁又去请示习仲勋书记。经研究决定,考虑到知识分子爱面子的特点,不在学校公开,作为工作调动,到农村基层安排。后来搞清了杨典的历史,他还入了党,参加土改时被敌人抓住牺牲了。

1946年,我随布鲁到了东北。布鲁在松江省担任省委常委、省委社会部部长、公安厅厅长期间,破获哈尔滨国民党地下党部,抓获111人,受到东北社会部通报东北九省表扬。当时邹瑜同志和我都在松江公安厅,分别担任治安处正、副

处长,参与了此案的破获。

布鲁在延安时期,人称“福尔摩斯”。一方面是他破案比较多,而且大都是比较难破的无头案件,破这样的案又不能搞群众运动,只能秘密进行;另一方面,在用人方面,凡是有可能接触敌人、能够搜集敌人重要情报、打入敌人内部策反敌人、破获敌特案件者,都在他的视线之内。所以说他用人十分广泛,三教九流,四面八方,不看重身份、不过多考虑个人历史复杂与否。在直接接触和使用过程中,他要通过眼去观察,用心去分析,看重的是他们言行对革命事业是否同心同德,正如作家雷加在纪念文章中所说:“他对任何一个案件和对人的观察都在进行一种心理把握。什么叫心理把握?那不仅是斗智,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侦察与征服。”

此外,布鲁的性格是活泼爱动,非常乐观,在他身上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劲。他工作起来,三天三夜不睡,废寝忘食;玩起来也是兴趣广泛,不但爱玩,而且会玩,画画、骑马、打猎、照相、游泳、打球、下棋、打扑克、搓麻将,样样感兴趣。他的仪表洋气,像个华侨。为了能品尝到喝咖啡的滋味,他把从厨房打来的窝窝头在火盆里烧焦、压碎,用水煮好加糖,美滋滋地当咖啡喝。如果说经过长征的工农红军干部还带点土气的话,那他就是十足的洋八路了。

万言申诉书

1954年,一次我到监狱探视布鲁,我们在吻别时,他将一个纸团悄悄塞进我的制服口袋,我回来一看,是他的申诉书,让我转交给党中央毛主席和罗瑞卿部长。洋洋万言,字写得很小很小。我经过压缩誊抄,复写数份,然而又能找谁递交上去呢?我是反革命家属,手拿的又是中央批捕的“反革命”的申诉书,谁敢替我转交呢?但是,天无绝人之路,世上就有这样的人!这就是我的上级曾宪植(叶帅的前妻,人们亲切地称呼她阿曾)。阿曾当时是全国妇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是我的直接领导。她和华南局方方、连贯、古大存、尹林平等领导都很熟,知道一些他们对“两陈案”不同的态度。她心中有底,愿意替我把申诉书转交给妇联领导邓颖超大姐。很快,她就

把申诉书转给了邓颖超大姐，并附了我给邓大姐的一封信，提出我对“两陈案”的怀疑。万万没有想到，邓大姐看信后通知阿曾，约我到中南海西花厅面谈。我又惊又喜，我是反革命家属，怎有资格到总理家去呀！我分析是阿曾起了作用，一定在邓大姐面前反映了华南局叶帅等领导对“两陈案”的不同看法。我鼓起勇气按时去了。在邓大姐面前，我痛哭流涕，把心中的冤屈统统倒了出来。其间，周总理路过客厅，见我那样伤心，也坐下来听了一阵。邓大姐听我讲完，想了想才开口。她首先表扬了我在妇联三年的工作是积极的，其次，说我对布鲁问题的看法是有见解的。这两句话一下子消解了我心中的委屈，心情一下子开朗、畅通了。走出西花厅，走出中南海，我感到轻松、欣喜，似乎变成另外一个人。后来，周总理果然向公安部调“两陈案”卷宗，这就引起了公安部领导的紧张，找了一些人，来了个“墙倒众人推，痛打落水狗”。一时间，谣言、诬蔑、歪曲一起上，把布鲁从“丧失革命立场”上升为混进党内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写成书面报告，报送总理和中央。在这个报告后面，还附了公安部长一封信，要求报告在党内公布，理由是此案在党内还有不同意见，如吕璜。这真令我啼笑皆非，我无名小卒一个，用得着他们大动干戈吗？

怕串供，案犯在未判决之前（现在称犯罪嫌疑人），亲属不能探视，判决之后，就允许探监了。我在布鲁判决之前和之后都可以探视。然而自从我向邓大姐和周总理申诉以后，公安部就不允许我再去了。我再三要求最后探望一次，告知布鲁今后不能再探视他了，最起码的要求也遭到了拒绝。罗瑞卿对蔡畅和邓颖超说：“吕璜一个共产党员，还去探监，不像共产党员。”

在1956年召开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上公安部罗瑞卿部长的报告中，对“两陈”和上海“潘扬事件”的扬帆的“罪行”向全党公布。自此，人们对“两陈案”谈虎色变，全党齐喑。

1958年反右后期，我被迫在全国妇联全体大会上检讨和“反革命”丈夫布鲁划清界限。由于我不愿意违心地说假话，让人听起来不是在检讨，而是在为丈夫辩护，引起在场人的愤怒。最后是举手表决，开除了我20年的党籍。当时面对那个群情激愤的阵势，我无可奈何，只好签字

同意。阿曾是机关党委书记，很了解我的思想，知道我过不了这一关，她没去参加那个会，晚上到我房间来安慰。

接下来我就是下放劳动和三年“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当彭罗陆杨也被打倒后，北京工业大学红卫兵来向我了解前公安部部长是如何制造“两陈冤案”的，因为1953年时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向我宣布两陈判决结论时曾说“这是党内处理的案件，不许往外说，这是纪律”，所以我拒绝了来访人。

1967年8月的一个晚上10点多，突然有人敲我的小院门，我开门听到北京工业大学学生及顺德说：“布鲁在门口等你。”这突然的情景，令我又惊又喜，14年了，今天终于重逢相见，那感觉真是如梦如幻。彼此相见，一时间竟无话可说。月光下，我俩从灯市东口向王府井方向默默漫步，及顺德在远处监护着。当时的情景真可谓是一切都在不言中”。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及顺德骑自行车要带布鲁回北工大。临上车时，他没有改变那老习惯，抱着我狠狠地一吻。

布鲁在北京约半年的时间，我看到他整天都在埋头写申诉材料。有次洗澡给他搓背，我听到他右胳膊嘎吱嘎吱地响，就问他原因。他先是不说，在我的追问下，才说有次放风的时候，他把申诉书包了一块石头，上面写着“请过路君子拾到转交总参首长收阅”，使劲从监狱厕所的高墙扔了出去。隔了不久，有个监管跑来，把他从牢房强拖到大树下，拴上右手吊着打，他撑不住，肩膀脱臼了。事后他不顾疼痛，把肩膀在墙上拼命一撞，才就了位，胳膊立时肿了起来，他疼得差点昏了过去。我听后伤心至极，放声大哭，他的眼里也含泪了。他怕我难受，从此不再提狱中的事。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布鲁在北工大学生的帮助下进行申诉，得空时，我陪他到医院检查治疗他患的严重胃病。那时，他平时住在北工大，有时也住我的宿舍。这就被妇联造反派所不容，于是他们便和公安部的造反派一起，在布鲁来我宿舍的大街上将他绑架，由公安部武装押回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

“左”祸的残害

上个世纪，我党长时期受到“左”的严重干

扰。在内战时期抓杀“AB”团,1943年“抢救失足者”运动,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在“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宁左勿右”“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在党内和人民内部制造敌人,自己人整自己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到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我和布鲁大半辈子就是“左”祸的直接受害者。革命者一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被党误打成敌人,很多同志、人民的功臣和党的著名友人,经不住凌辱痛不欲生而上吊、跳楼、跳海、吃安眠药片。

1953年,中央公安部部长到广州指导广东省“三反五反”工作,他在向中央的报告中称:“广东党内有相当一大批坏分子(包括贪污腐化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恶霸分子、与敌人始终保持联系的内奸分子)占据着重要工作岗位,很多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现有几万土改队员中亦有大批坏分子……”当然也包括“两陈案”中的人。于是广东就大搞“土改整队”“整理内部”“反地方主义”运动,搞得人人自危,风声鹤唳。华南局书记叶剑英、副书记方方同志认为,当时(三反五反)最大的“纠偏”莫过于制止对自己同志和朋友的伤害。这就使我联想到“两陈案”已经查出是桩冤案,而公安部坚持判刑。对认为是假案的公安部审案人员范祥、郝力光、郭松年(都是三八式的老干部),经过批判斗争,分别进行了留党察看、党内严重警告、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而后统统调出公安部。“两陈案”本来发生在广州(又是广州干部),知情人、证明人都在广州,但不回到广州宣判,而就在公安部布鲁所在的监狱食堂临时当做法庭,用军法处的名义非法向他宣布了判决结论。当时他高喊冤枉,但哪容他分说,立即强行拖回牢房。这虽然完全是违法的,但在当时没有民主、没有法制的情况下,权力就是真理,谁的官大,谁就代表党,谁就决定一切。我们把党比作自己的母亲,母亲错打了孩子,既不能反抗,也不能埋怨,只有申诉。然而申诉就是翻案,其结果只能是罪加一等。为此有人曾说,这种遭遇,还不如关在敌人的监狱里,在那里同狱人可以联合起来继续斗争,还有狱外自己的同志营救。如果被杀,那就是烈士,人民永远纪念他,烈士子女也无上光荣。可是,被党错打、关押、凌辱、自杀就是“活

该”“畏罪自杀”“叛党”,连子女都受到歧视,升学和分配工作等等都受到影响。子子孙孙受牵连。

布鲁的性格是开朗的,心境是透明的,尽管受了那么多的冤屈,他不但不自杀,反而害怕狱中有人暗害他。他认为他的问题是公安系统有人诬陷他,一旦党了解了实情,就会平反,所以他千方百计要活下去,千方百计向党申诉。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仍然与癌症进行着最顽强、最痛苦的斗争,表现出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争取平反的强烈愿望。

永相守不分离

1980年12月4日,公安部“两陈案”复查小组通过全国妇联党委正式向我宣布了“两陈”复查结论:

原认定陈泊(即布鲁)丧失革命立场,严重地违法乱纪,包庇反革命罪行,主要根据不是事实,应予否定,系属错案,宣告无罪……

不久,全国妇联党委在妇联全体党员大会宣布,无条件恢复了我在1958年被开除的党籍。

我从1951年(31岁)受到丈夫问题株连,到1980年正式平反,整整30年,平反时我已61岁,恰恰是离休年龄。我的身体还健康,还想重新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工作几年,以弥补过去30年受株连之遗憾。经中纪委副书记章蕴大姐同意,我借调到中纪委做特约检察员,查处大案要案;四年后又借调到中央整党办,查处中央领导批示的大案要案;又一个四年之后,担任了延安女子大学校友会副秘书长。现在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

今年,我已93岁。常言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现在我唯有一个愿望:我和布鲁在延安结婚,相敬相知相爱一生,不到十年的夫妻生活,换来长期的强制隔离,但愿死后,两人的骨灰一起送回博鳌老家,合葬在一棵大树下。在那个梦幻的天堂里,我俩相濡以沫,永远相守,不再分离。■

(作者为全国妇联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黄 钟)

中外历史上的改革困境与成败周期

○ 章立凡

改革及改革家的困境是什么？改革的成败在历史时空中有无周期性的轨迹？这是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中外历史上，也确有不少著名的先例可供参考。

梭伦与商鞅：困境相似结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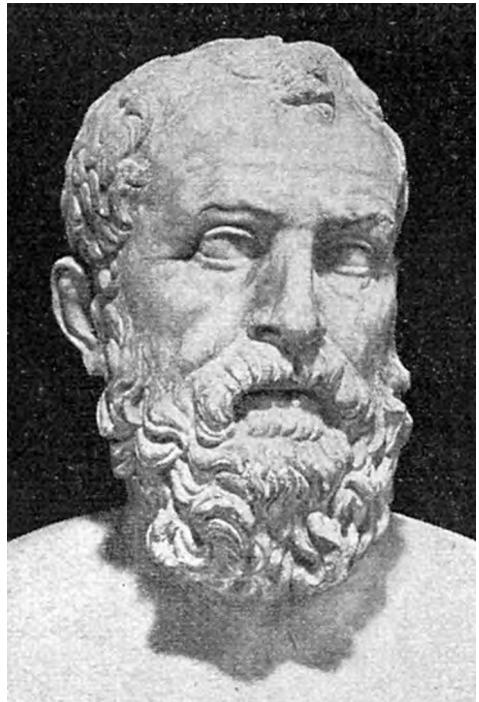
公元前594年，梭伦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废除债务奴隶制和残酷法律，按财产分级赋予政治权力，建立三权分立架构，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

梭伦改革在贵族与平民的夹缝中进行，既帮助了穷人又恪守中道。他曾以诗明志：“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

亚里士多德曾在《雅典政制》一书中，谈及梭伦在改革中的困境：

当梭伦完成上面所述的宪法时，平民时常来找他，并且为着他的法律而使他感到烦恼，批评这些，问问那些；他既然不愿变更法律条文，又不愿居留而受谤，所以旅行埃及，以经商和游览该地为目的，声明十年之内，将不回来，因为他认为他没有义务留下来解释他的法律，大家应该遵从他所写的法律条款。而且这时他的境遇也很不顺适……因为人民期待他制订法律，重新分配一切财产，而贵族则希望他或则恢复以前的制度，或则只是略加变更；但梭伦双方都不讨好，尽管他如果随意袒护一方，就有成为僭主的可能，他却宁愿遭受双方仇视，而采取曾是最优良的立法，拯救国家。

公元前572年，梭伦在执政二十二年后放弃权力，前往埃及、塞浦路斯、小亚细亚等地漫游。他出走之后，雅典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图以武力成为雅典僭主。但这



梭 伦

位僭主继续推进改革，原有的改革成果得以保全。梭伦游历十年后返回雅典，退隐在家从事研究和著述，死后安葬在故乡萨拉米斯岛。

相形之下，东方的改革家商鞅，就不像梭伦那样知进知退。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于公元前356年、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战国策》）“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而利益在变法中被侵犯的贵族们，则强烈反对他。

据司马迁记载，智者赵良曾当面批评商鞅的为政风格：“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峻刑，是积怨畜祸也。”他指出商鞅“危若朝露”，“秦王

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劝其急流勇退。商鞅没有接受赵良的劝告。

性格决定命运。公元前338年孝公薨逝,秦惠文王继位,商鞅失势出逃。他在位时法令森严,逃亡中投宿旅店遭拒,被捕车裂而死,后人讥为“作法自毙”。司马迁认定他“天资刻薄”,“刑公子虔,欺魏将卯,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

抛开道德评价,两位改革家的共同之处,是在顶层与底层的夹缝中奋斗,而其新法在他们下台后均得以继续实行。不同在于个人结局:一位执政二十二年全身而退,换来新法十年不变之约;一位行新法十年大治,专政十八年最终势败身裂。

中外改革周期:多以五至十年为一节点

尽管上述两场改革时空各异进程参差,但梭伦的十年约定和商鞅十年成功,还是引发了我的思考。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阶段性,检索中外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改革,大体上以五至十年为一节点,越到近代越有节律感。

北魏孝文帝改革:公元471年即位,自484年起开始改革,首推俸禄制,翌年颁布均田令。十年后(495年)迁都洛阳,全面实行汉化政策。499年崩逝,在位28年。

北宋王安石变法:公元1069年出任首相,陆续实行均输、青苗等新法。五年后(1074年)罢相,翌年被召回复职,1076年第二次罢相。下台后新法犹存,1086年司马光为相,尽废之。

明朝张居正改革:自公元1572年起,连续十年任内阁首辅,创制“考成法”“一条鞭法”。1582年病卒后,被褫夺官爵,查抄家产。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改革:1856年召见莫斯科贵族,提出自上而下改革农奴制的设想,翌年成立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五年后的1861年,颁布农奴制改革法令。1881年准备启动君主立宪改革,遇刺身亡。

日本明治维新:狭义的明治维新,自1868年宣布改元“明治”始。广义上则可从1867年起算,包括“大政奉还”、“王政复古”等政治事件。五年节点上(1872年)废藩置县,十年节点上(1877

年)结束西南战争,维新大局底定。

列国改革历史进程中,还有不少以五至十年为一节点的情况,例如:俄国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06-1911),中国清末新政(1901-1911),美国罗斯福新政(1933-1939),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1986-1991)等。节点本身未必十分规范,同时也存在着例外:如中国唐代的“永贞革新”和清代的“戊戌变法”,皆历时百日即告失败;而欧洲的宗教改革,则长达一个世纪……等等,需具体分析其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殊原因。

失败标本之一:斯托雷平改革(1906-1911)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后,罗曼诺夫王朝的改革停滞。1905年革命后,尼古拉二世被迫颁布了等同于宪法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成立国家杜马实行多党制。沙皇俄国最后一位改革家斯托雷平,于1906年由内务大臣升任大臣会议主席(首相)。

斯托雷平改革从矛盾冲突最激烈的土地问题入手,可谓切中肯綮。斯托雷平努力将传统村社份地私有化,改善农民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境遇;同时通过地方管理和自治机关的政治改革,试图扶持起一个保守忠君的富农阶级,维持帝国的经济和政治稳定。

按当下的说法,斯托雷平是个标准的新权威主义者,改革与镇压两手抓,两手都很硬。为强推土地改革方案,他不惜得罪贵族地主,曾于1906、1907年间两度解散国家杜马;同时建立军事法庭网镇压国内“敌对势力”,在1906至1909年间,就有逾3000人被处于绞刑,被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

斯托雷平的铁腕式改革手法,曾受到另一位改革家维特伯爵的批评。他在顶层与底层之间腹背受敌,处境略似两千多年前的梭伦和商鞅,且逐渐失去沙皇的支持。在五年节点上,政治改革惨遭滑铁卢,地方自治方案于1911年遭第三届杜马否决,斯托雷平被迫辞去首相职务。同年9月14日,他被革命者刺杀,挽救沙皇俄国的最后一次改革宣告失败。五年多之后,“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相继爆发,罗曼诺夫王朝倾覆,政权

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

失败标本之二：大清新政 (1901—1911)

斯托雷平改革失败之际，邻国大清的新政也进入了弥留时刻。

义和团事变和八国联军入侵，导致了《辛丑条约》的屈辱结局，也成为大清最后一次改革的起点，其方向与三年前的戊戌变法雷同——学习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新政期间，官制、行政、军制、法律、财税、币制、教育等改革逐步推开，并废除了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

五年后新政出现第一个节点，朝廷于1906年9月下诏预备仿行立宪，设立专门政治体制改革机构“考察政治馆”。各地纷纷成立立宪公会。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公布了以九年为期的筹备立宪时间表，同时放宽报禁党禁，推行地方自治，各省选举咨议局。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及光绪帝同日逝世。近年考古发现证明：光绪系中毒身亡。此前这对母子的权力斗争，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此后则令新政在临近第二个节点时出现变数：满族亲贵担心在政治改革中失去权力，1911年5月成立了以“太子党”为主体的“皇族内阁”。13名内阁成员中，满人占8名（其中宗室6人、觉罗1人）、汉人4名、蒙古人1名。

满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汉族士人多取利用而不信用的政策。朝廷用人，满汉之别由来已久。钱穆先生曾指为自私的“部族政权”，余英时先生亦形象地称之为“族天下”。同光以来，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汉臣，在太平天国之乱和洋务运动的历史机遇中，获得了政治、经济实力，并在“东南互保”中培育了地方政治势力。

1905年的废科举，断绝了多数汉族传统知识分子的仕进之途，一时怨望甚多。1910年，汉族士绅组成的各省咨议局，曾联合十数省督抚请愿向朝廷施压，要求提前立宪及速开国会。自私的“皇族内阁”，更重燃起沉寂二百多年的满汉仇恨，令汉族官员和士绅转而倾向民族革命。咨议局还在铁路国有化问题上与中央政府对抗，四川



慈 禧

保路运动成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索，宪政改革逆转为排满革命，导致了大清王朝统治的覆灭。

余 论

历史上的改革家，处于不同阶层利益冲突的夹缝中，一步不慎，全盘皆输。梭伦和商鞅两位改革家，是古代史上政治成功、下场迥异的范例。斯托雷平改革和清末新政，是近代史上同期失败的一对典型。反思改革成败得失，不免令人感叹：梭伦的政治智慧，的确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恒星。

革命家列宁和孙中山都曾担心，朝廷改革的成功，将令他们的革命抱负失去机会。执政者凭借“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目标都是避免革命。如果利益圈子太小或无法平衡各方利益，其后果往往是人亡政息，甚至犯下“颠覆性错误”。

纵观中外改革史，多数改革都不太可能持续太长的时间。如果改革在启动后的五至十年间不能取得势头，就不大可能继续。■

（责任编辑 黄 钟）

俄国记忆版图上的竞争

○ 吴思

一、争夺彼尔姆-36

彼尔姆-36(Perm-36)是苏联时期的劳改营,现在是纪念馆。我们去参观的时候,一家民间组织正在与官方争夺主办权。

争夺的一方,是彼尔姆-36的现任馆长维克多·施米罗夫(Viktor Shmyrov),他们是俄国最大的NGO“国际记忆协会”的一家分会。另一方,是彼尔姆州州长。

彼尔姆-36坐落在彼尔姆州首府彼尔姆市的东北方,开车要走两三个小时。这里靠近乌拉尔山脉西麓,人烟稀少。纪念馆就是由四层围墙和铁丝网围起来的两处院子,院内有一栋小楼,几栋作为车间和住处的平房,废弃的宣传栏,高高的岗楼。不远处有一座小村庄,周围是无边的旷野。

我们去的那天,2013年10月12日,秋雨飘洒,全天只见到两拨访客,十几个人。参观门票200卢布,以当时人民币1元兑换5.6卢布折算,这点游客量,一个月的门票收入不过1.5万人民币,按照莫斯科的工资标准,只够两个人的月薪。

这里有什么值得一争呢?介绍手册上说,彼尔姆-36是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古拉格时代的劳改营。

苏联时代存在过476个劳改营联合企业,由数以千计的独立劳改营组成,每个劳改营的囚犯少则成百,多则上万,总管是“劳改营管理总局”——简称“古拉格”。古拉格创始于上世纪20年代,斯大

林时代全盛,劳改犯常年保持在200万人左右。据估计,大约有1800万人进过古拉格系统,此外还有600万人被流放到哈萨克沙漠和西伯利亚森林。这些人建成了无数水库、运河、铁路和城市,生产了几乎所有种类的产品。(《古拉格:一部历史》,安妮·阿普尔鲍姆,新星出版社,2013年,序言第2页,正文第637页。)按照彼尔姆-36介绍手册的说法:“没有古拉格廉价的奴隶劳动,斯大林完成国民经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计划是不可能的。”“古拉格不仅是包含了数千所劳改营和数百万受害者的巨大的劳改管理系统,而且是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说,彼尔姆-36是人类另类文明的物质遗产。

彼尔姆-36创建于1943年,主要用来关押政治犯,1988年关闭。上世纪90年代,国际记忆协会组织当年的劳改犯,包括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总共70人,重访彼尔姆-36。他们筹集资金,把荒废的劳改营改建为纪念馆,1996年作为“政治迫害纪念中心”对外开放。



彼尔姆-36一角 (秦晖 摄)

在70人团回访彼尔姆-36的时候,现任副馆长塔吉亚娜·库尔希娜(Tatiana Kursina)已经四十岁,结婚生子,在学校里教历史,日子过得很安稳。她说,她热爱这个国家,听说家里有政治迫害受害者,很是愤怒,不肯相信。她在彼尔姆-36见了70人团,听了他们的故事,才意识到自己所学的当代史是假的。她没脸再教这样的历史,于是放弃自己一直关注的十八九世纪俄国史,改修当代史。她说,不能让现在的年轻人像她一样,到四十岁才知道历史真相。

十几年来,纪念馆开研讨会,建纪念碑,办人权节,多次召集国际会议,名气越来越大。塔吉亚娜说,如果十年前知道彼尔姆-36的人不多的话,现在不知道的不多了。我们成了一个名牌。

这块名牌经常引起争议。支持者出钱出力,反对者指责他们抹黑历史,有人还放火烧了纪念馆的一处院子——关押重要政治犯的那座劳改营。我们去参观时,遭灾的劳改营还在修缮,里边空空荡荡。没有遭灾的劳改营,陈设着旧时的生活和劳动用具,还有古拉格的历史介绍。

彼尔姆-36纪念馆的经费,初期主要靠民间赞助,地方政府的资助大约占20%。后来,官方资助的比例逐步提高到80%。

塔吉亚娜说,普京总统和联邦议会都支持我们这个项目,普京还签署了一个纪念人权受害者的文件。促使总统签署文件的过程很艰难,是社会和民意推动他签署的,纪念协会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普京签署的文件涉及三个项目,准备拨款五亿卢布。塔吉亚娜说,这可是一大笔钱,大有油水。

这时候,彼尔姆州的州长出来了。他告诉馆长施米罗夫,纪念馆要收回,由政府主办。施米罗夫坚决反对。州长坚持收回,指定10月9日谈判收回的具体方案。于是,施米罗夫和塔吉亚娜飞往莫斯科,向国际记忆协会主席阿瑟尼·罗津斯基(Arseny Roginsky)求助。

政府掏钱政府办,究竟有什么不好?

塔吉亚娜说,2012年举办人权节,请俄罗斯和各国客人来彼尔姆-36,在旷野上搭帐篷,唱歌,朗诵诗歌,政府就大加限制,这个不许请,那个不许请,否则就不给经费。为难之际,德国的伯尔基金会表示愿意出钱,2012年的人权节才

办成了。2013年的人权节,政府在最后一分钟通知他们,经费砍掉一半,人权节就没办成。如果由地方政府主办,对项目来说是灾难性的。

2013年10月8日,在莫斯科“国际记忆协会”的会议室里,我们初次见到施米罗夫和塔吉亚娜。记忆协会执行主任叶莲娜·热姆科娃(Elena Zhemkova)简单介绍说,他们到莫斯科办事来了,过几天你们还会见到。“办事”这个词,还有两位馆长谨慎的外地人举止,让我想起中国那些到京城跑关系的人。

他们确实想跑关系,借助中央力量,对抗地方最高长官。

二、记忆版图上的竞争

在俄罗斯历史记忆的版图上,一直有不同力量竞争,记忆协会也是重要角色。

国际记忆协会的前身,是一个名为“记忆”的小组和非法出版物。

上世纪70年代,罗津斯基大学毕业,分配到乡村当中学教师。他发现教科书上的许多内容与当事人的记忆不符,就组织了“记忆”小组,约稿子,采访历史当事人,每年汇编出版,刊名也叫《记忆》。

《记忆》发表的文章,涉及一些敏感话题,例如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大罢工事件。当地工人因物价上涨和计件工资下降罢工,军队开枪镇压,23人死亡。消息被严密封锁,这个话题成为禁区。

记忆小组将文稿弄到巴黎,印刷后弄回国内传播,一年出一本。出到第四本,1981年,罗津斯基被捕,判刑四年,罪名是泄露秘密档案。

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罗津斯基出了劳改营,接着做《记忆》。苏联解体前,他已当选代表,进入最高苏维埃人权委员会。罗津斯基参与了有关平反和监狱管理法律的制订,1996年担任国际记忆协会主席。

国际记忆协会,又译国际纪念协会(International Memorial),全称是“国际记忆-历史、教育、人权和慈善协会”,响应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倡议,于1989年1月成立。现在俄国各地有60多个分会,还有80个国际分会。

罗津斯基说,协会是非政府组织,与官方组织无任何关系。我们遵守所有法律,此外不服从任何官方命令。这在俄罗斯很不寻常。很少有什么组织能够独立于官方。官方不喜欢我们,但也不敢对我们施加太大的压力,因为社会舆论不允许。社会舆论支持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和解释,支持我们维护今日人权。这些问题在当代俄罗斯非常重要。

罗津斯基向我们介绍了官方对恐怖记忆的控制及政策变迁。

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后,红色恐怖开始,数以百万计的人进了劳改营,他们的亲友也受到牵连。这些事实,当时不许公开谈论。

赫鲁晓夫时代开放了一些,但是半遮半掩。那时的口径是:恐怖是针对党的,党是正确的,坏事是斯大林干的。

实际上,罗津斯基说,恐怖是针对全体人民的,并不仅仅针对党。但民众的记忆被扭曲了。赫鲁晓夫的观点是,总体是好的,有个别错误。可是,我们认为,恐怖是这个国家的基础。没有恐怖,这个制度就不能存在。另一个虚假的说法是,恐怖只是短期的,很快就停止了。实际上,恐怖是长期的,大规模的,2000万人死于恐怖。(由布尔什维克革命导致的死亡人数,有1000万说,1200万说,2000万说。见《古拉格:一部历史》第639页)

赫鲁晓夫下台后,媒体连这些也不提了。在官方版本的历史记忆中,恐怖并不存在。

戈尔巴乔夫时代,人们有了谈论这些话题的自由。记忆协会成立了。我们要公开地把罪恶

说成罪恶,让人们了解我们的历史上有过长时间的血腥时期。我们要把受害者的名单公布于世。我们要把这些刻上纪念碑,写入教科书。这就是我们在80年代末期的工作。

进入90年代,一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开始追溯历史,以便为自己的合法性正名。罗津斯基在《斯大林主义的拥抱》一文中说,民众也渴望确认自己是谁,俄罗斯是谁。政府在90年代推出了历史上的光辉形象——斯托雷平、彼得大帝等等,但民众没有接受。他们太遥远了。

叶利钦时代之后,政府想打造一个伟大国家的形象:这个国家永远伟大,光荣地克服了重重考验。政府需要这种历史形象来团结民众,恢复国家权威的连续性。在这个背景之下,斯大林的伟大领袖形象再次凸现出来。

与政府的努力相反,国际记忆协会不断强调斯大林时期的恐怖历史,在集体记忆的版图上,强调那些侵犯人权的大规模罪行。

记忆协会的档案馆馆长阿廖莎带我们参观了她们搜集的史料。25年前,他们开始冒着风险搜集苏联时期的档案。现在,大房间里排满了档案柜,一些房间里还保存着古拉格时期的服装、信件、手工和绘画。档案和图书向社会开放。他们还搜集整理受害者名单,据她们介绍,苏联政治恐怖的牺牲者,估计有1200万人,(同上。)目前已经搜集到300多万,其中包括有名有姓的11900多个中国人。档案馆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叫“最后的见证者”,请古拉格受害者讲述亲身经历,他们搜集整理出来的470个小时的音像

资料已经放到网上。

为什么专门搜集这类资料?罗津斯基的说法是,恢复历史真相不是恢复所有的真相,而是核心部分的真相。然后,用立碑或挂牌的办法保存人们的记忆。

我们参观了记忆协会建立的纪念碑。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广场,当年的克格勃大厦旁边,放了一块从古拉格发源地索洛韦茨基群岛运来的岩石。虽然巨大而沉重,却是



中间是罗津斯基,右侧女士为记忆协会执行主任热姆科娃,左侧是伯尔基金会俄罗斯办公室主任殷兹。 (秦晖 摄)



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广场上,放着从古拉格发源地索洛韦茨基群岛运来的岩石。岩石右侧尖角指向百米外的前克格勃大厦。 (秦晖 摄)

倾斜的,让人感觉基础不稳。在比较偏远的顿斯科伊修道院公墓,我们看到了纪念雕像。很多在大清洗中被处决的人在顿斯科伊火葬场火化,雕像下边的池子里,就有成千上万受害者的骨灰。

罗津斯基说,现在的年轻人在莫斯科大街上走过,他们不知道,历史上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这里被捕。没人记得他们。街道两旁的建筑物上应该有标志牌——某某在此地被抓走,某某杂志在此处被查封。这些事应该做,可是我们做得不够。

罗津斯基所说的,是记忆协会推出不久的一个项目:“莫斯科,我们记忆的地方”。他们在一些历史地点挂上铁牌:“1938年,某某在此被抓走枪决。”他们并未寻求谁的批准,一批标志牌突然出现在大街上,吸引了许多人,有些地方还有人献花。

罗津斯基想做大的事,我们曾经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城市里看到。走在柏林或维也纳街头,经常可以发现某个建筑物门前镶嵌着铜制的地砖,上面刻着某人的名字和生卒日期,说他于某年月日在此被抓走,死于某地。德国人把这个活动称为绊脚石运动。这些标志将眼前的建筑与重要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在城市里营造出意味深长的历史时空。

这些工作对现在有什么意义呢?

罗津斯基说,过去和现在绝对有联系,这种联系就是人权。我们把历史真相与人权这两个

概念联系在一起。大规模的恐怖是什么?就是大规模地粗暴地践踏人权。这就是昨天。今天是什么?没有了大规模的践踏人权,但依然在破坏人权。今天破坏人权的原因,可以在昨天找到。

三、面向年轻人

伊琳娜·谢尔巴科娃(Irina Scherbakova)在记忆协会里负责高中生作文比赛项目。她说,协会成立的初衷是搜集保存史料,但成立十

年后,大家明白了,协会的意义在于面向年轻人。

通过中学教师,她们发动学生采访家里的长辈,记下家庭的历史记忆,参加作文比赛。如何不带偏见地聚焦人权受到损害的历史?她们选择了一个比较客观的题目:人的历史。伊琳娜说,苏联只讲权力的历史,不讲人的历史。人被看作一架机器上的零件。发动孩子访问家人,就是要补上人的历史。

作文比赛已经坚持了14年。获奖作文都放到了网上。伊琳娜说,我们每年会把最好的作文汇编起来,出一本书。例如,《我们祖辈的三十年代》、《围绕家庭圈子的历史》等等。

伊琳娜说,现在俄罗斯的多数孩子想学法律或经济。他们在访问长辈和查找档案时发现,案件中没有律师出场。他们用现代的眼光看历史,就会有更深刻的感受。

孩子们在采访中形成了对历史的认识,培养了自己的批判精神。一个小女孩在作文中引用了艾赫玛托娃的一句诗:在俄罗斯/人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被送进监狱/一部分把人送进监狱。小女孩写道:我不认为只有两部分。更大的一部分像小草一样被践踏。这些顽强的小草,只想自己生活下去,生存下来。

普京总统也非常重视青少年教育,但倾向不同。2012年9月12日,他向社会各界代表谈到对年轻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俄罗斯能否保存并且使自己得到增强,能否成为当代有

前景的和有效发展的国家,同时,在当代很不一般的形势下,能否不使自己迷失,不丧失独特性,这取决于我们如何教育青年。”(转引自张盛发:《普京重任总统后再次治理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问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3年第6期。以下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介绍和引文出处相同。)

普京认为,这个领域的竞争很激烈:“包括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文化自决性、精神和道德价值都证实,这是一个竞争残酷的领域,有时是公开的信息对抗的目标,不想说进攻性,但准确地说是对抗,这是精确策划的宣传进攻。”

普京总统在前两个任期内,多次发起攻势,试图统一历史教科书。

2003年11月和2007年6月,普京两次会见俄罗斯历史学家和全俄历史教师代表。他说,历史教科书应当培养青年人对自己祖国历史和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2003年讲话不久,多卢茨基编写的中学教科书《20世纪祖国史》便从俄罗斯联邦推荐书目中被剔除,理由是“对我们祖国历史的成见和对材料有偏见的阐述”。这引发了俄罗斯社会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争论。官方授意和资助的教学用书是菲利波夫主编的《俄国现代史(1945—2006年)》教师手册。在这本书里,斯大林以有效的管理者形象出现。这本书的内容和观点引起了俄罗斯各界的更大争论。

普京在第一个任期禁了多卢茨基的教科书,在第二个任期扶植了菲利波夫的教科书。2012年5月,普京第三次出任总统,干脆釜底抽薪,试图统一历史教科书,用政府中意的教科书统一课堂。

2012年12月,第三次就任总统不久,普京在国情咨文中阐述了他的整体目标:“俄罗斯应当成为一个主权的和有影响力的国家。我们不仅应当坚定不移地进行发展,而且要保持自己的民族和精神认同,作为一个民族不使自己迷失方向。”

四、记忆与身份的纠葛

俄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俄国人是谁?过去是谁,现在又是谁?这类身份认同问题与历史记忆关系密切,在俄国内部也有不同看法。

罗津斯基说,过去,我们是谁的答案很清楚,我们是苏维埃人。现在肯定不是了。现在是谁有争论。一种说法是,我们是东正教徒,这是我们的传统。但很多人不同意,我就不同意。传统信仰没那么强大。有人说我们是俄罗斯人,但这只是一个民族的概念,而且,俄国是多民族的,把俄国人称为俄罗斯人也不准确。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混乱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暂时没有答案。

听到苏维埃人这个词,我想起70年代读过的一本日本左派写的书:《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作者认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认为苏联是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当时对苏联社会的性质已有不同看法。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人,只是苏联官方的说法,相信的人多,一时便成为主流看法。现在,回顾历史,谈论那时社会的性质,罗津斯基用的词是“斯大林主义”。

罗津斯基在《斯大林主义的拥抱》一文中写道,斯大林主义是一套国家统治的体系,是斯大林时期的特定政治实践的总称。其一般特征是:将恐怖作为普遍手段来解决所有政治和社会问题。因为有国家暴力和恐怖,才可能实现统治的集中化,才可能强势地推介某种意识形态,才可能出现大批的奴隶劳工以及其他许多现象。

我不清楚这个概念的来历。西方政治学界描述斯大林时代的常用概念是“极权主义”,从斯大林死后到转型之前是“后极权主义”。可见,对苏联时代社会性质的看法和命名之乱。政治制度和社会性质,仅仅是整体文化的一个方面。对政治身份的看法如此杂乱,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就更混乱了。

俄国人对斯大林时代的记忆也是矛盾混乱的。

罗津斯基说,记忆告诉我们,那个时代是恐怖时代。谁是恐怖分子?国家。国家机器制造了恐怖。恐怖制度是这个国家的基础。可是,就说俄国的20世纪吧,修建了很多铁路,电站,放了卫星,造出了原子弹和氢弹,我们的历史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其中最大的胜利是战胜希特勒。我们是绝对的善。所有这些关于胜利的记忆,如何与关于恐怖的记忆联系起来?为俄罗斯骄傲?为俄罗斯羞耻?怎样把这两种东西放在

一个脑袋里,这就是我们的困难。

罗津斯基说,很多前苏联的共和国正在编写自己的历史,例如格鲁吉亚,他们的叙述是:“我们原来正常地生活,俄国人来了,给我们带来了恐怖,我们一直反抗,最后我们胜利了,自由了。我们是受害者,俄国是刽子手。”确实,我们没有被占领,我们自己建立了恐怖制度,杀了自己人。我们是刽子手,同时又是受害者。当然,也可以把党说成黑的,我们是白的。但也不好办。谁是党呢?我们自己就是党,党就是我们。

听到这里,我想到一对中国概念:官-民。官不是民众选的,造了孽怎能追究民众?那么,是否可以说官是黑的,民是白的?

我又问自己:难道民众真有那么白吗?官方固然要承担主要责任,但官来自哪里?执政前他们就是民间的一股势力。执政后,大量的官员也是从民间选拔的。如果民众方面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把自己说成单纯的受害者,如某些反右和文革积极分子那样,这种总结不会掩盖真相吗?

我知道,德国人总结历史教训并没有绕过民众。2005年1月25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讲话中表示,德国人民对于当时的大屠杀负有责任。他说,“纳粹意识形态的邪恶并非突然产生。思想上的野蛮残忍和缺乏道德上的自抑是有其历史的。事情十分清楚:纳粹意识形态是人民自愿接受并且予以执行的。”

德国总理在讨论责任时强调了意识形态。纳粹的意识形态包括消灭劣等民族,苏联的意识形态包括消灭阶级敌人。阶级敌人不是人,而是毒蛇猛兽。

契卡创建者捷尔任斯基1918年9月3日在《消息报》上号召:“让工人阶级用大规模的恐怖来压死反革命的多头毒蛇!让工人阶级的敌人知道,每个持有武器的人都要被当场枪毙,每个哪怕敢于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微小反抗的人都将立即被逮捕并关押到集中营去!”

契卡另一位主要领导人拉齐斯说:“革命之剑砍下时应该沉重和致命。被授予了这把剑的手要坚定地和充满信心地把锋利的剑刃插入反革命的多头毒蛇……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也不

可能有资产阶级为了压迫和剥削下层阶级而编造出来的旧的道德准则和‘人道’。我们的道德是新的,我们的人道是绝对的,因为它是以消灭任何剥削和暴力的崇高力量为基础的。”“我们可以无所不做,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批举起利剑不是为了奴役和压迫他人,而是为了将所有人从奴役和奴隶下解救出来的人……要流血?那就流血吧,只要能够把强盗的旧世界染成鲜艳的红色就行。”(闻一:《契卡的“十字军讨伐”》,《炎黄春秋》2014年,第2期)

我想,为了达到自己认定的目标,漠视他人的自由甚至生命,这不是许多民众认可的观念吗?退一步说,容忍这种观念,容忍对自由和生命的大规模残害,这不是很普遍的现象吗?如果是,自我反省,有所承担,吸取教训,警示未来,就应该成为全民性的道义责任。

回想起来,罗津斯基把党内党外干部群众混为一谈,还有一个理由:今天俄国民众手里的选票管用。从根本上说,未来掌握在他们手里。有一张选票,就有一分责任。民众的认识,民众的反省,民众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决定着他们对政府和政策的选择。

罗津斯基这一派人,真把自己当公民,希望俄国民众也成为合格的公民,而不是等待雨露阳光的臣民,于是就特别关注公民的素质,强调公民的承担。从这个角度回顾历史,便形成公民式的历史记忆。在公民式的记忆版图上,人权、公民权利、自由的边界,标志得最为醒目。至于铁路、电站和原子弹之类的物质成就,只是次要的东西。有了人权和自由的保障,这些东西就能创造出来。如果这些物质成就来自大规模的奴役劳动,它们在记忆版图上的重要性还会降低,对这些成就的评价也会让他们感到内心纠结。

对于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的关系,罗津斯基表述得很清楚。他在《斯大林主义的拥抱》一文中写道:“历史记忆是集体意识对过去的回顾。我们在过往之中选择我们认为重要的事实,它形成了我们的集体身份认同。历史记忆的素材,是真实的和想象的过去:历史记忆将事实分门别类并且系统化,只选择那些它愿意呈现的,符合身份认同的事实。”

这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便选择甚至想象什么

样的史实,建构什么样的历史记忆。反过来,什么样的记忆,又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两者相互促成。

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身份可以从不同角度区分。从信仰角度可以分成东正教徒或共产主义者,从社会分层角度有官民和士农工商,也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从政治权利角度有臣民有公民还有人民群众,从民族角度有俄罗斯人有乌克兰人、车臣人、鞑靼人,等等。人们认为自己是谁,不仅取决于他在这些分类体系中的位置,还取决于他特别在乎的那种身份,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身份。

苏维埃人是凝聚了巨大能量的综合性身份:信仰共产主义,属于劳动阶级(消灭了剥削者和寄生虫),享有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空前自由和权利,还带着俄罗斯的民族色彩。更重要的是,苏维埃人把自己想象为最伟大的历史运动的先锋,代表着人类的美好未来。

历史进程并不支持这种想象。

1999年12月,普京总统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回顾历史:“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看不见,甚至否认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而不认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的巨大代价,错误更大了。”“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经济的意识形态化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走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

如此说来,苏维埃人是谁?就是闯入死胡同的人。令人自豪的身份认同解体了。原来的次级认同逐鹿中原,各自在历史记忆中寻求支持。不同的看法,还包含着对俄国走向的主张,试图影响并塑造未来。

五、俄罗斯到底是什么国家?

今日俄罗斯到底是什么国家?仅仅从社会性质的角度说,也是众说纷纭。

俄罗斯官方早已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对



斯大林时代古拉格劳工修建白海运河

旗帜道路之类的话题不感兴趣。我请中国社科院俄国文学专家苏玲寻找官方说法,她找到的官方观点是:俄罗斯是联邦共和制的资本主义社会。

俄罗斯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

彼得堡独立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伊琳娜·泽沃米斯罗娃(Elena Zdravomyslova)教授对我们说:“在当代俄罗斯,政治资本的作用,大于财产或经济资本的作用。没有政治关系,很难得到保护。”她认为俄罗斯依然是专制制度,可以称之为“温和的威权主义”,或者叫“有选举的威权主义”。俄语和英语一样,专制主义与威权主义是同一个词。

莫斯科国立经济高等学院教授尼古拉·彼得罗夫(Nikolai Petrov)向我们介绍了俄罗斯的当代政治情况。会后我问他对当代俄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他用英语回答说:“裙带-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在中国被翻译为“权贵-资本主义”。

我质疑道:当代俄罗斯,资产阶级能主导或“主义”吗?叶利钦时代,资本寡头一度控制了金融和传媒,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政策和选举,那一段或许是权贵资本主义。普京上台后,收拾了几个资本寡头,重新控制了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现在,到底是官方说了算,还是资本说了算?他说,官方说了算。我说,如果是官方主导,权贵主导,那就应该叫权贵-资本主义,应该叫资本-权贵主义。我说中国也有这类争论,我提出的概念是:资本-官家主义。权贵主义就是官家主义。

彼得罗夫教授说,俄罗斯有一种说法,叫有选举的威权主义。我继续追问谁是主导者:到底

是选民说了算,还是威权说了算?如果选举是真的,选举真管用,就不应该叫威权主义,而应该叫民主主义,威权色彩浓重的民主主义,“威权-民主主义”。

实际上,彼得罗夫在会上介绍过俄罗斯民主的复杂情况,选举是真的,但是选举制度很不成熟。政党竞争很弱。在地方选举中,普京设定的规则让当权者更容易当选。不过,选民和官方之间存在一个隐性契约:民众认可这种统治,政府向民众提供好生活。本届政府的竞选口号就是“提高养老金!提高工资!”

彼得罗夫说,普京还承诺大国复兴,多数人支持他的强国梦。问题是,过去经济比较好,石油价格上涨,官民双方都被骗了:官方以为统治很容易,不用改革;民众以为不换政府也过得不错。后来经济危机了,需要经济政策了,而普京没有什么真正的经济政策,普京的班子就不那么受欢迎了。普京的爱国阵线党被称为强盗小偷党。一些民众重新走上街头。

彼得罗夫说,官方对付民众抗议的办法,让人想到专制时期。一是镇压,让抗议的人不再上街。2012年6月有群众抗议,40多人被抓,司法过程还在进行,有人已被判罪。二是让政治人物不再活跃,不反对克里姆林宫,最好拉拢过来。三是对公民社会进行限制。不过,官方也做出一些让步,出台了一些新法令,例如禁止官员财产转移出境。

彼得罗夫说,目前,除了普京无人能够左右俄国局面,如果他下台,对俄罗斯未必有利。

我对这几段话的理解是:普京当选是民众权衡的结果。民众需要他来维持稳定,即使专制一些,腐败一些,也比乱了好。俄国人见识过半无政府状态,那时黑帮横行,公共服务严重缺乏。既然威权人物是民众选择的,这个社会就不是威权社会,而是民主社会,“威权-民主主义”的说法可以成立。

那么,“强盗小偷党”又该如何理解呢?民众选择了威权人物,并没有选择强盗和小偷。可是,据伯尔基金会莫斯科办公室主任殷兹·西格特先生(Jens Siegert)介绍,这里几乎每个人都遭遇过政府要流氓的事。

记忆协会人权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切尔卡索

夫(Alexander Cherkasov)是著名记者,他介绍说,现在的某些官员,工作起来的方式,让人想到黑社会。有些地下组织暗中得到了秘密警察的支持。官方的某些组织部分地私人化了。一位观察者说:“同一帮人,管理着这个国家,也占有着这个国家。”

管理者是管家,拥有者是东家。占有者不讲谁有谁管,只说占着位置。如果用这些概念分析,那么,在今日俄国,到底谁是东家?

在名义上,官方当然不是东家,俄罗斯人民才是东家。官方只是人民委托的管家,选举或委托手续,每四年重复一次。当然,苏联时代的人民也是名义上的东家,但那时的选举太走过场了,从人民代表到最高领导人的委托链条多处断裂,不完整也不真实。现在的委托链条也有毛病,但大体真实完整。

当前的问题是,获得巨大授权的管家,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东家。管家管理着俄国,占有了俄国,部分拥有了俄国。发生这种转变的机理包括:

1. 民众授权过多,太信任铁腕人物,给他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容许管家近似东家。
2. 官员掌握的使用权扩张。内部人控制,代理人把持,代理权多跨一步,便侵入了所有者的领域,于是管家近似东家。
3. 国家机器和司法机构不健全,疏漏甚多,官员很容易在某个局部偷偷越界,将代理权部分地私人化,为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服务。
4. 民间经济和公民社会都比较弱,民间的独立性不强,对政府监督不力。政党政治不成熟,民众选择空间有限,替换麻烦,对越权的容忍度也被迫提高。还有很多民众习惯于不尊重人权的管理方式,对公民权利边界不敏感,忽视了代理人越权。

经过这一系列的跑冒滴漏,再说人民是今日俄罗斯的东家,肯定会有争议。但是,说管家或官家是东家,照样会有争议。

确切的定性,需要多方面的计算和比较:将管家的真实收入与名义收入比较,将管家的真实收入与国际市场行情比较,将管家与东家的收入比较。此外还需要职责比较,工作质量比较,行为特征比较。我不了解这些数据,无法准确判

断。我感觉,俄罗斯的社会性质,在威权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我更倾向于后者。

俄国社会性质的模糊和争议,决定了俄国人身份之不确定。

在俄罗斯和东欧的历史进程中,至少可以辨认出民众的三种权利身份。一是臣民,他们是政权的服从者。二是公民,他们是平等的国家主人,是政府的东家。三是人民群众,他们在名义上崇高伟大,在实际上服从追随。而且,人民与敌人之间的边界由最高领导人掌握,一旦沦为敌人就比臣民还惨,近乎奴隶。从历史角度看,人民群众是臣民和公民之间的过渡性身份。

如此看来,俄国人应该处于人民群众和公民之间。俄国的社会转型尚未完成,还在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身份也在转型和重建之中,所以,身份认同必定是变动的,模糊的,有争议的。

政治和社会身份方面的认同如此,文化身份也处于模糊和变动状态。例如宗教信仰,也需要转型,需要适应新时代,否则很难获得广泛深刻的认可。

六、阶段性的结果

最后,应该交待一下彼尔姆-36争夺战的结果了。

馆长施米罗夫和塔吉亚娜到了莫斯科,找到罗津斯基,又通过他找到了总统班子里边的人。

依照法规,总统签署纪念人权受害者的文件之后,有权组织一个委员会,负责项目的实施和款项的使用。这个委员会由许多民间人士组成,改革派的影响比较大。委员会之下还有普京总统任命的管理小组,协调项目间的拨款谈判。委员会和管理小组里都有记忆协会的朋友,委员会和小组的决定,州政府必须服从。

10月9日,预定谈判回收彼尔姆-36具体方案的日子,州长没有露面。他派来的代表也没提回收的事,相反,他说我们的想法与馆长一致。那天,所有与会者都赞扬民办+官方支持的模式,说这个模式可在各地推广。

在送别晚宴上,副馆长塔吉亚娜向我们介绍了上述情况。她说,俄国在政治上处于困难时期,但这一仗打赢了。馆长也累得心脏病发作。

她笑道,公民社会的组织者通常心脏不好。为他的健康干杯!

从记忆协会的角度看来,整个俄国都是这样:大局不容乐观,但苦斗之下,不时取得局部性胜利。

在维权领域,记忆协会人权中心一直在追究车臣的侵犯人权案件。车臣战争期间,未经法律程序,遭受私刑拷打或失踪的大约三千人。例如,一个俄国警察,绑架拷打了车臣平民。两个车臣警察,对一位车臣平民的失踪负有责任。在各方努力下,这三个人受到审判。但是,三千案件,只有三个小人物受到惩罚。并且,坚持追究的三个人,一位著名记者,一位年轻律师,一位记忆协会的工作人员,后来都被谋杀,可谓代价惨重。

记忆协会人权律师受理的车臣案件,包括失踪、私刑、针对居民的轰炸等。在国内打不赢,他们就诉到欧洲法院。欧洲法院如果判政府赔偿,俄国政府一概执行。但是,涉及责任追究便执行不力,有赔偿而无清算。

在历史问题领域同样如此。罗津斯基介绍说,受害者一般都平反了,还为有的人立了纪念碑,但是迫害者都没有受到追究。他的个人经历便是如此,释放了,平反了,但有关他的14卷档案已被销毁,他只拿到了销毁证明。从1990年到1991年,俄国政府,尤其是克格勃,销毁了大量档案,涉及跟踪窃听的,线人密报的,95%已被销毁。剩余部分也不开放,只有安全部门才有权查看。

事实上,整个苏联时期的官员犯罪,无论是侵犯人权还是贪污受贿,都没有受到追究清算。唯一的例外是,有人贪污了国际援助的钱,在国际法庭被起诉,于是被捕入狱。

在记忆领域,罗津斯基说,俄国人的记忆是关于受害者的记忆,却没有关于罪犯的记忆。国家恐怖没有受到追究。

确实,我们在城郊公墓看到了纪念受害者的雕塑,在涅瓦河畔看到了受害女诗人的雕像,但我们也在市中心区,在莫斯科安全局办公楼门前,看到了捷尔任斯基的雕像。俄国安全部门依然尊敬这位制造国家恐怖的前辈。

即使对受害者的记忆,也被挤到了边缘地

带。罗津斯基说,对受害者的纪念场所主要是墓地。城市中心那些与恐怖有关的建筑,并没有成为纪念场所,没有挂上纪念牌。

他说,在全国300家博物馆中,国家恐怖的主题经常以碎片方式呈现,呈现为个人的和短暂时期的记忆碎片。关于国家恐怖的专题纪念馆,各地不到十家,但没有国家级的。

关于斯大林主义记忆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收录了150多万受害者的名字。但是,这些书籍印数很少,而且是地方性的,不是国家层面的,对国家记忆几乎不起作用。

这种格局,在我看来正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平反了,赔偿了,这是受害者的胜利。无追究,无清算,这是迫害者的胜利。双方势均力敌,各有胜负,但人权边界大体得到了保护。

记忆协会的自由派认为自己是少数:他们在边缘,他们的胜利只是碎片化和边缘化的胜利。罗津斯基说,走向胜利的路还很漫长。现在是国家监督我们,并不是我们监督国家。我们正在追求达到这一点。应当是人在国家之上,而不是国家在人之上。

在记忆协会的工作中,我看到了俄罗斯的进步和自我完善的渴望。俄国现实的许多方面仍在延续历史,如果不追究侵犯人权的历史,不谴责对人权的漠视,现在的俄国仍是过去的俄国,未来的俄国人仍将是过去的俄国人。揭露和批判历史上的侵权,表现了一种不许重复的决心,一种改进现实和自我的努力。

我们这个访问团由德国伯尔基金会的博盟先生、朱易和夏澜女士组织安排,成员有张思之律师,秦晖、金雁、朱学勤和贺卫方教授,翻译是新华社前驻莫斯科记者陈启民先生。访问快结束的时候,金雁教授提醒我们,我们听到的批评,主要来自公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和政府打交道时受挫比较多。如果换作普通民众,批评就不会这么多。

陈启民先生也说,俄国人现在的生活,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都比20年前好多了,比十年前也好多了。穿着更时尚了,政治更宽松了,人们更敢讲话了。他说,他的俄国老朋友也这么认为。■

(责任编辑 黄 钟)

SIEMENS

西 门 子 助 听 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 010-84608877 400-610-0896

盒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 2012 第 2460530 号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 2012 第 2460710 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 2012 第 2460711 号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注: 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禁忌内容或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3120253号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书名

书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王明年谱	郭德宏	98.00	11.00
我这九十年	任均口述 王克明撰写	38.00	7.00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茅海建	68.00	9.00
儿子,你要活下去	[法]品雅特海	36.00	6.00
古拉格群岛第一岛	伍宇星编译	39.80	7.00
苏联的最后一年	罗伊·麦德维杰夫	39.00	7.00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吴庆彤	36.00	6.00
民国人物过眼录	杨奎松	58.00	9.00
改革都有红利吗	雪 珑	38.00	7.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顾	28.00	6.00
西路军	冯亚光	126.00	12.00
定西孤儿院纪事	杨显惠	25.00	7.00
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	杨银禄	46.00	7.00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杨 瀚	35.00	6.00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陈徒手	32.00	6.00
勃列日涅夫时代	[俄]列·姆列钦	56.00	9.00
蹉跎坡旧事	沈博爱	48.00	8.00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	冯筱才	38.00	7.00
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	[美]撒迪厄斯·拉塞尓	39.00	7.00
张发奎口述自传	夏莲瑛访谈及记录	56.00	9.00
南非的启示	秦 昕	78.00	9.00
思痛录	韦君宜	35.00	7.00
陈独秀全传	唐宝林	128.00	11.00
斯大林的战争	杰弗里·罗伯茨	69.00	10.00
国史札记(人物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晖	38.00	7.00
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	42.00	7.00
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	张泽石	23.50	6.00
1949 我不在清华园	张泽石	23.00	6.00
回忆与研究(上下)	李维汉	75.00	12.00
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	刘维开	48.00	8.00
蒋介石与国共合战:1945-1949	蒋永敬	48.00	8.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煜	49.00	8.00
难忘的非常岁月	陈瑞生	26.00	7.00
雾霭 俄罗斯百年忧思录(内部发行)	[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280.00	12.0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中、下)	陶菊隐	148.00	18.00
共同的底线	秦 昕	48.00	8.00
古拉格:一部历史	[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78.00	9.00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88.00	12.00
我眼中的改革	[德]汉斯·莫德罗	45.00	8.00
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	李慎明主编	59.00	9.00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沈志华	58.00	9.00
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	雷 顾	32.00	7.00
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	金冲及	32.00	7.00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	陈铁健	48.00	8.00
蒋介石初上台湾岛(1949-1953)	李庆	58.00	9.00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萧功秦	48.00	8.00
金正日与朝鲜	高秋福	36.00	6.00
陈布雷与陈伯达——历史转折点上的两个“秀才”	张希贤	56.00	8.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	148.00	18.00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译	58.00	8.00
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	45.00	7.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锐著	29.50	7.00
苏北利亚	于 疆	22.00	6.00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等	42.00	6.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19.00	12.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国家记忆(一)	章东磐	98.00	10.00
国家记忆(二)	晏 欢	88.00	9.00
可操作的民主	寇廷	28.00	7.00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奎松	48.00	8.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张 鸣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九册)	北京电视台卫视频道节目《档案》栏目组编	286.00	36.00
母亲杨沫	老 鬼	45.00	6.00
血色黄昏	老 鬼	39.00	6.00
血与铁	老 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 鬼	38.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60.00	8.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李冬君	29.8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雷 顾	8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杨奎松	58.00	8.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乔云华	49.0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I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图书介绍

《王明年谱》:这是一部国内外比较全面反映王明的一生以及围绕他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著作。

编者不仅查阅了中央档案馆和中央组织部档案馆中关于王明的档案材料,还曾到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查阅档案,此外,还有王明之子王丹之提供的由其母亲孟庆树据王明谈话编著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的书稿。这些宝贵史料和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资料和看法。

提到王明,我们总是会想到“两条路线”,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也是一条正确路线和多次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共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一位,就是毛泽东;错误路线的代表,到王明时期,已经有五位,从最开始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到张国焘再到王明。

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虽然《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王明及其代表的“左倾”路线有了定论,但王明所涉及许多历史问题特别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却被掩盖。

譬如:一:关于顾顺章叛变的问题;过去很多论著都说顾顺章被捕后,是李克农、钱壮飞最早报告中共中央的,但王明说不是他们,而是秘密党员“老鲍”首先通知特科的;二:关于向忠发被捕的详细经过;王明说向忠发被捕是由他家的女工小姨向敌人提供的线索。他被捕后,中共中央曾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让他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但是两小时后,杨度就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说杜月笙也没办法,因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向忠发被捕后立即叛变,把周恩来、王明和博古住的地方都告诉了敌人,并带敌人去捉人。幸而他们都搬了家,未遭逮捕。三: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和博古负总责问题;过去很多著作都说,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和由博古负总责,都是由王明指定的。但据王明说,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是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决定,请国际领导批准的,并不是他提议的。当时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共有五人,即平时已参加处理日常工作的博古、陈云、卢福坦、王稼祥、陈云四人,加上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卢福坦。当时周恩来和王明说明: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应轮流当主席。开始一个时期,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就是五人轮流当主席,以后才逐渐地由博古自己一人做起主席来,不再轮流了。

四:关于1938年王稼祥带回的支持毛泽东做领袖的口信问题;大家都知道,王稼祥在1938年回国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曾与他谈话,让他回国后告诉大家,要支持毛泽东做党的领袖。在这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个口信。这对于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据王明说:“季米特洛夫夫人——罗莎里奥夫娜说这不是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而是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他还说:1950年底他们到莫斯科后,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一个同志对他说:曼努伊尔斯基说好几次和王稼祥一起去见季米特洛夫谈这个问题,季米特洛夫都没有同意。后来王稼祥临走前又去见季米特洛夫时,曼努伊尔斯基当着王稼祥的面说:“要选毛泽东做总书记”。曼努伊尔斯基说这句话时看着季米特洛夫,意思是要他点点头。结果,季米特洛夫就点了一下头!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也对这个口信的真实性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王明年谱》用丰富的材料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人物的丰富性,还原了历史真相。这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炎黄春秋

上海富媒联合出品
移动数字阅读终端



扫描我直接下载哦

炎黄春秋手机版阅读方法

通过扫描二维码或App Store搜索"epubchina"即可开始您的数字阅读之旅。

您可以在官方App store电子市场搜索“炎黄春秋”下载终端即可开始您的数字阅读之旅。

去哪里下载？

只须 **4步** 立刻完成 轻松阅读。

- 1.点击  进入“炎黄春秋”客户端；
- 2.在上方搜索框输入杂志名称：炎黄春秋，进行搜索；
- 3.在杂志搜索结果页选择“炎黄春秋”；
- 4.进入杂志封面页，开始在线阅读或下载后阅读。



技术合作：

上海富媒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60533565

“李世农反党集团”冤案始末

我国法治之路的政党维度

保健护士谈江青（续）

汤用彤的矛盾心态

顾准《商城日记》的背后

随卫中央领导人的经历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10.00 元